

汪主席和平建國言論集

宣傳部編印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出版

MG  
D693.09  
710/2

# 汪主席和平建國言論集



3 1798 6852 0



汪 主 席 近 影

# 汪主席和平建國言論集 目錄

## 上卷

豔電	一	四
致中央常務委員會 國防最高會議書	五	六
答問	七	一〇
舉一個例	一一	二〇
覆華僑某君書	二一	二八
會仲鳴先生行狀	二九	三四
重要聲明	三五	三八
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	三九	四六
敬告海外僑胞	四七	五二
兩種懷疑心理之解釋	五三	五八
怎樣實現和平？	五九	六六

答問(一).....	六七	七〇
答問(二).....	七一	七四
對沈次高先生殉難在滬談話.....	七五	七六
致海內外諸同志東電.....	七七	八〇
歐戰與中國之前途.....	八一	八四
在上海招待外國記者談話.....	八五	九四
致重慶諸同志篠電.....	九五	九六
九月二十一日聲明.....	九七	九八
在南京接見中日記者談話.....	九九	一〇〇
中國與東亞.....	一〇一	一〇四
中華民國之新生命.....	一〇五	一〇八
所望於產業界諸君.....	一〇九	一一二
總理誕辰紀念日演講詞.....	一一三	一一六
三民主義之理論與實際.....	一一七	一三〇
中央陸軍軍官訓練團開學典禮訓詞.....	一三一	一三四

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之解釋	一三五	——	一四四
豔電書後	一四五	——	一五二
共同前進	一五三	——	一五六
和平運動之前途	一五七	——	一六六
建軍之目的	一六七	——	一八〇
銑電	一八一	——	一八二

## 下卷

在青島會談各次談話	一八三	——	一九〇
志深勇沉	一九一	——	一九八
「和平奮鬥救中國」的心理建設	一九九	——	二〇二
和平宣言	二〇三	——	二〇六
國民政府還都的重大使命	二〇七	——	二一六
國民政府還都對日廣播辭	二一七	——	二一八
和平反共	二一九	——	二二〇

和平反共建國運動之新階段	二二一	二二六
實現和平實施憲政	二二七	二二八
罪己的精神	二二九	二三四
蔣介石的磁鐵戰	二三五	二四〇
再呼籲於同胞之前	二四一	二四四
民族意識與建設東亞新秩序	二四五	二四六
對於事變三週年之感想及期望	二四七	二五〇
田雞與蝗蟲	二五一	二五六
中日文化協會成立大會訓辭	二五七	二五八
對政治訓練班訓辭	二五九	二六〇
民權主義前途之展望	二六一	二六六
對中央大學職員訓詞	二六七	二七〇
因紀念「八一三」而展望全面和平	二七一	二七四
沈次高先生行狀	二七五	二七八
向美記者闡明國府之施政綱要	二七九	二八二

紀念孔子的意義	二八三	二八六
憲政實施委員會成立大會致詞	二八七	二八八
調整中日國交會議閉幕後重要談話	二八九	二九〇
和平運動殉難同志追悼大會獻辭	二九一	二九八
對中央黨務訓練團訓詞	二九九	三〇四
關於團訓「誠明廉毅」的解釋	三〇五	三二二
國慶日感言	三二三	三二四

## 附錄

近衛聲明	三二五	三二六
------	-----	-----

汪主席和平建國言論集 目錄

上  
卷

## 豔電

重慶中央黨部，蔣總裁，暨中央執監委員諸同志均鑒：

今年四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明此次抗戰之原因，曰：『自塘沽協定以來，吾人所以忍辱負重與日本周旋，無非欲停止軍事行動，採用和平方法，先謀北方各省之保全，再進而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為最低限度，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為合作原則。』自去歲七月蘆溝橋事變突發，中國認為此種希望不能實現，始迫而出於抗戰。頃讀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關於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之闡明，第一點，為善鄰友好，並鄭重聲明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將仿明治維新前例，以允許內地營業之自由為條件，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俾中國能完成其獨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鄭重聲明，則吾人依於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則吾人遵照宣言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實為應有之決心與

步驟。第二點，爲共同防共。前此數年日本政府屢會提議，吾人願慮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國之軍事及內政。今日日本政府既已闡明，當以日德義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則此種顧慮，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產國際之擾亂的陰謀，對蘇邦交不生影響。中國共產黨人既聲明願爲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則應卽澈底拋棄其組織及宣傳，並取消其邊區政府及軍隊之特殊組織，完全遵守中華民國之法律制度。三民主義爲中華民國立國之最高原則，一切違背此最高原則之組織與宣傳，吾人必自動的積極的加以制裁，以盡其維護中華民國之責任。第三點，爲經濟提攜。此亦數年以來，日本政府屢會提議者，吾人以政治糾紛尙未解決，則經濟提攜無從說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鄭重闡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並闡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佔，亦非欲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則，以謀經濟提攜之實現，則對此主義應在原則上予以贊同，並應本此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方案。以上三點，兆銘經熟慮之後，以爲國民政府應卽以此爲根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日本政府十一月三日之聲明，已改變一月十六日聲明之態度，如國民政府根據以上三點，爲和平之談判，則交涉之途徑已開。中國抗戰之目的，在求國家之生存獨立；抗

戰年餘，創鉅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以上三點，爲和平之原則，至其條理，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適當。其尤要者，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所謂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爲限，此爲中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所關，必須如此，中國始能努力於戰後之休養，努力於現代國家之建設。中日兩國壤地相接，善鄰友好有其自然與必要，歷年以來，所以背道而馳，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瞭其責任。今後中國固應以善鄰友好爲教育方針，日本尤應令其國民放棄其侵華侮華之傳統思想，而在教育上確立親華之方針，以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爲吾人對於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同時吾人對於太平洋之安甯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須與關係各國一致努力，以維持增進其友誼及共同利益也。謹此提議，伏祈採納！汪兆銘，豔。

(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 致

中央常務委員會  
國防最高會議書

茲有上中央一電，除拍發外，謹再抄呈一紙，以備鑒督。本月九日，銘謁總裁蔣先生，曾力陳現在中國之困難在如何支持戰局，日本之困難在如何結束戰局，兩者皆有困難，兩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無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協助，蘇聯之不反對，德義之不作難，尤期待日本之覺悟；日本果能覺悟中國之不可屈服，東亞之不可獨霸，則和平終當到來。凡此披瀝，當日在座諸同志，所共聞也。今日方聲明，實不能謂無覺悟。猶憶去歲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際，德大使前赴南京謁蔣先生，所述日方條件，不如此明劃，且較此為苛，蔣先生體念大局，曾毅然許諾，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其後日方遷延，南京陷落之後，改提條件，範圍廣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覺悟，我方自應答以聲明，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而努力折衝，使具體方案得到相當解決，則結束戰事以奠定東亞相安之局，誠為不可再失之良機矣。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見其端倪，惟此等助力僅能用於調停，俾我比較有利，決不能用於解決戰事，俾我得因參戰

而獲得全勝，此爲盡人所能知，無待贅言。蘇聯不能脫離英法而單獨行動，德義見我肯從事和平談判，必欣然協助，國際情勢，大致可見。至於國內，除共產黨及惟恐中國不亡惟恐國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國國民黨不滅之少數人外，想當無不同情者。銘經過沉思熟慮之後，始敢向中央爲此提議；除已另函蔣先生陳述意見外，謹再披瀝以陳。伏望諸同志鑒其愚誠，俯賜贊同，幸甚，幸甚。專此，敬候公祺。

汪兆銘謹啓

(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 答 問

問 汪先生爲什麼首倡和議？

答 宣戰講和，是國家的大權。國家以保衛其生存獨立爲目的。戰而可達此目的則戰；和而可達此目的則和。今人一言主戰，即便附和，雖戰敗而不認敗。一聞議和，即便搖頭，縱可和亦不和。實在無從索解。

問 此時議和是否搖惑人心，撓動軍心？

答 我以為闡明目的，正所以鎮定人心，振奮軍心。例如今人說『抗日就是一切』，那麼，抗日是目的了，然則爲什麼抗日呢？是爲保衛國家之生存獨立。可見保衛國家之生存獨立是目的，抗日不過是手段。前年七月爲什麼主張抗戰呢？爲的是不如此不能保衛國家之生存獨立。如今爲什麼主張議和呢？爲的是如此才可以保衛國家之生存獨立。目的闡明之後，抗戰固有其理想而忠勇奮發，議和亦有其標準而審慎沈著。何至搖惑人心撓動軍心？反之，說『抗日就是一切』，纔真是搖惑與撓動。因爲如此說法，會使人不知道抗日之

目的是什麼。於是有人說『抗日爲的是統一』，所以要剷除異己的力量。又有人說，『抗日爲的是國共合作』，所以要肅清反共的派別。試問這種黨派紛爭的言行，是不是搖惑與撓動？

難道如豔電所說，無損於國家之生存獨立麼？

問 答 我認爲無損。

須知豔電所說，範圍廣漠。

問 答 豔電所說，只是原則。根據原則，進行談判，方纔能得到具體條件，不致廣漠。

問 答 共產黨人爲什麼反對呢？

共產黨人所以反對，第一因爲中日戰事一日不息，蘇聯一日安枕無憂。爲的使蘇聯安枕無憂，應該使中日戰事一直的打下去。第二因爲戰事延長，中國國民愈窮，財愈盡，共產黨人愈有所憑藉。

問 答 其他人的反對呢？

據我看來，其中有一理由，就是不相信日本。他們以爲日本除了滅亡中國沒有第二條路，所以我們除了抗戰沒有第二條路。他們有了這樣的肯定，所以

聽見議和，以爲危險。究竟日本是否除了滅亡中國沒有第二條路呢？這不只要看日本，並要看我們自己。一年零七個月的抗戰，我們自己已證明了中國不是可以滅亡。然而這還不够，我們還要指示出來日本除了滅亡中國，還有第二條路，並且必須走這第二條路。這第二條路是什麼？是中日合作。所謂中日合作，即以善鄰防共經濟合作爲基礎，彼此互相尊重，各自瞭解其所需要，而又互相瞭解其所需要，站在平等的地位，以謀互助。如能如此，則歷年以來之仇恨，始可掃除，而現在之懷疑亦可冰釋。這不但與東亞之和平有關，而且與世界之和平亦有關。這第二條路是中日雙方所應共同致力的，日本如果不選擇這第二條路，日本必陷於絕大的困難。中國如果不選擇這第二條路，中國將無以保其生存獨立而進爲現代的國家。

(二十八年一月三十日)



## 舉一個例

會仲鳴先生彌留的時候，有鄭重而簡單的兩句話：『國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沒有什麼不放心的』。會先生對於國事的主張，與我相同；因為主張相同，常在一處，所以此次不免於死。會先生之死，爲國而死，爲對於國事的主張而死。他臨死的時候，因爲對於國事尚有主張相同的我在，引爲放心。我一息尚存，爲着安慰我臨死的朋友，爲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他他所念念不忘我的朋友，我已經應該更盡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張的實現；何況這主張的實現，是國家民族生存所繫。

我因發表豔電，被目爲主和，主和是我對於國事的主張了；這是我一人的主張麼？不是，是最高機關，經過討論，而共同決定的主張。這話有證據沒有呢？證據何止千百！今日舉一個例罷。

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議

時間 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時

地點 漢口中央銀行

出席 于右任 居正 孔祥熙 何應欽

列席 陳果夫 陳布雷 徐堪 徐謨 翁文灝

邵力子 陳立夫 董顯光

主席 汪副主席

祕書長 張羣

祕書主任 曾仲鳴

徐次長謨報告

『德國註華大使陶德曼，於上月二十八號，接得德國政府訓令，來見孔院長，二十九號下午，又見王部長。據稱「彼奉政府訓令云：德國駐日大使在東京會與日本陸軍外務兩大臣談話，探詢日本是否想結束現在局勢，並問日本政府欲結束現在局勢，是在何種條件之下，方能結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條件數項，囑德國轉達於中國當局。其條件爲

(一)內蒙自治。

(二)華北不駐兵區域須擴大，但華北行政權仍全部屬於中央，惟希望將來

勿派仇日之人物爲華北之最高首領。現在能結束，便如此做法。若將來華北有新政權之成立，應任其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方尙無在華北設立新政權之意。至於目前正在談判中之鑛產開發，仍繼續辦理。

(二) 上海停戰區域須擴大；至於如何擴大，日本未提及。但上海行政權仍舊。

(四) 對於排日問題，此問題希望照去年張羣部長與川樾所表示之態度做去，詳細辦法係技術問題。

(五) 防共問題，日方希望對此問題有相當辦法。

(六) 關稅改善問題。

(七) 中國政府要尊重外人在中國之權利」云云。陶大使見孔院長王部長後，表示希望可以往見蔣委員長，遂卽去電請示。蔣委員長卽覆請陶大使前往一談。本人乃於三十日陪陶大使同往南京。在船中與陶大使私人談話：陶大使謂，中國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戰精神，如今已到結束的時機。歐戰時，德國本有幾次好機會可以講和，但終自信自己力量，不肯講和，直至維爾賽條約簽訂的時候，任人提出條件，德國不能不接受。陶大使又引希特勒意見，希望中國考慮

；並謂在彼看，日本之條件並不苛刻。十二月二日抵京，本人先見蔣委員長，蔣委員長對本人所述加以考慮後，謂要與在京各級將領一商。下午四時又去，在座者已有顧墨三、白健生、唐孟瀟、徐次辰。蔣委員長叫本人報告德大使來京的任務。本人報告後，各人就問有否旁的條件，有否限制我國的軍備。本人答稱，據德大使所說，只是現在所提出的條件，並無其他別的附件，如能答應，便可停戰。蔣委員長先問孟瀟的意見，唐未即答，又問健生有何意見，白謂只是如此條件，那麼爲何打仗？本人答：陶大使所提者只是此數項條件。蔣委員長又問次辰有何意見？徐答只是如此條件，可以答應。又問墨三，顧答可以答應。再問孟瀟，唐亦稱贊同各人意見。蔣委員長遂表示：

(一) 德之調停不應拒絕，並謂如此尚不算是亡國條件；  
(二) 華北政權要保存。

下午五時，德大使見蔣委員長，本人在旁擔任翻譯。德大使對蔣委員長所說，與在漢口對孔院長、王部長所說者相同，但加一句謂：如現在不答應，戰事再進行下去，將來之條件恐非如此。蔣委員長表示：

(一) 對日不敢相信；日本對條約可撕破，說話可以不算數；但對德是好友

，德如此出力調停，因為相信德國及感謝德國調停之好意，可以將各項條件作爲談判之基礎及範圍。但尚有兩點須請陶大使報告德國政府：

(一)關於我國與日談判中，德國要始終爲調停者；就是說，德國須任調人到底；

(二)華北行政主權須維持到底：在此範圍內，可以將此條件作爲談判之基礎。惟日本不可自視爲戰勝國，以爲此條件乃是哀的美敦書。德大使乃問：可否加一句？蔣委員長說：可以。德大使說：在談判中，中國政府宜採取忍讓態度。蔣委員長云：兩方是一樣的。蔣委員長又謂：在戰爭如此緊急中，無法調停，進行談判，希望德國向日本表示，先行停戰。陶大使稱：蔣委員長所提兩點，可以代爲轉達；如德國願居中調停，而日本亦願意者，可由希特勒元首提出中日兩方先行停戰。蔣委員長說：如日本自視爲戰勝國，並先作宣傳，以爲中國已承認各項條件，則不能再談判下去。在歸途中，陶大使表示，以爲此次之談話有希望。在京時，陶大使並對蔣委員長說：此項條件並非哀的美敦書。陶大使在船中即去電東京及柏林，但至今尚未有回覆，此後發展如何，尙不可知。

附註一 國防最高會議主席是蔣中正，副主席是汪兆銘，當時國府表面上由南京遷往重慶，實際上在武漢辦公，

蔣主席因軍事指揮，留在南京，故國防會議，由汪副主席代理主席。

附註二 外交部長王寵惠，亦爲常務委員之一，是日因感冒請假，故由次長徐謨列席，且徐次長新僱德大使由南京回，亦有列席報告之必要。

附註三 徐次長報告所說，墨三，是顧祝同；健生，是白崇禧；孟藩，是唐生智；次辰，是徐永昌。

看了以上的報告，則我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致國防最高會議函中所說：『猶憶去歲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際，德大使前赴南京，謁蔣先生，所述日方條件，不如此明劃，且較此爲苛，蔣先生體念大局，曾毅然許諾，以之爲和平談判之基礎』，其內容具如此。

此外還有證據沒有呢？何止千百，但其性質尙未過去，爲國家利害計，有嚴守祕密之必要；而德大使調停之事，則已成過去，故不妨舉出來作一個例。

於此便會發生以下三個疑問：

第一，德大使當時所說，與近衛內閣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聲明相比較，德大使所說，可以爲和平談判之基礎，何以近衛聲明，不可以爲談判之基礎？

第二，當德大使奔走調停時，南京尙未陷落，已經認爲和平談判可以進行，

何以當近衛聲明時，南京，濟南，徐州，開封，安慶，九江，廣州，武漢，均已相繼陷落，長沙則尚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燒燬個精光，和平談判，反不可以進行？

第三，當德大使奔走調停時，國防最高會議諸人，無論在南京或在武漢，主張均已相同；何以當近衛聲明時，又會主張不同，甚至必將主張不同的人，加以誣蔑，誣蔑不足，還要奪其生命，使之不能為國家効力？

對於以上三個疑問，我不欲答覆，但對於和戰大計，却不能不再為國民一言。

有人說道：『既已主戰，則不應又主和』。此話不通！國家之目的，在於生存獨立，和戰不過是達此目的之手段；到不得不戰時則戰，到可以和時則和；和之不可，視其條件而定；條件而妨及國家之生存獨立，則不可和，條件而不妨及國家之生存獨立則可和。『如此尚不算是亡國條件』，言猶在耳，試問主和有不可？

有人說道：『中國因抗戰而得到統一，如果主和，則統一之局又歸於分裂』。這話我絕對反對。從古到今，對國家負責任的人，只應該為攘外而安內，絕不應該為安內而攘外；對外戰爭，是何等事？却以之為對內統一之手段！中國是求

國家之生存獨立而抗戰，不是求對內統一而抗戰。以抗戰爲對內統一之手段，我絕反對。何況今日之事，主和不會妨害統一，而不主和也不會不分裂！

有人說：『如果主和，共產黨立刻搗亂』。我以爲共產黨是以搗亂爲天性的，主戰也搗亂，主和也搗亂。共產黨的搗亂，如果於主和時表面化，比現時操縱把持挑撥離間的局面，只有較好，沒有較壞。

有人說道：『國際並不盼望我們和』。我以爲和與戰是國家民族生存所繫，應該由我們自己決定，立於主動的地位，以運用外交，求國際形勢有利於我，決不應該俛仰隨人；何況現時除第三國際外，並沒有其他國家反對我們和。

如上所述，已經明瞭。還有鄭重聲明的：甲午戰敗之後，有屈辱的講和；庚子戰敗之後，有屈辱的講和；這是說起來就難過的，我不願這一次的講和是如此。普法戰爭之後，法國有屈辱的講和，直至大戰之後吐氣；大戰之後，德國有屈辱的講和，直至今日而後吐氣；這是說起來就得意的，我也不願這一次的講和是如此。因爲這樣的循環報復，無有已時，決非長治久安之道。我所誠心誠意以求的，是東亞百年大計。我看透了，並且斷定了：中日兩國，明明白白，戰爭則兩傷，和平則共存；兩國對於和平只要相與努力，必能奠定東亞百年長治久安之局。

；不然，只有兩敗俱傷，同歸於盡。這種看法，兩國人都懷疑的，然而也都有確信的。尤其二十個月的苦戰，日本的消耗，不爲不大；中國的犧牲，不爲不重。兩敗俱傷同歸於盡的一條路，與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又一條路，明明白白，擺在面前。兩國有志之士，難道慌於一時之禍福毀譽，而徘徊瞻顧，不敢顯然有所取舍嗎？我希望大家本着獨立不屈不撓的精神幹去。和平建議之第一個犧牲者會仲鳴先生，已將他自己的血，照耀着我們，往共同生存共同發達之大路而前進。

末了，我還有幾句話。當二月中旬，重慶會派中央委員某君來，給我護照，俾我出國；我託他轉致幾句話：其一，我不離重慶，豔電不能發出，然當此危難之時，離重慶已經很痛心的了，何況離國？我所以願意離國，是表明要主張得蒙採納，個人不成問題。其二，聞得國民政府正在努力促成國際調停；這是可以的。然而至少國際調停與直接交涉同時並行，如此，則我以在野之身，從旁協助，亦不爲無補。其三，如果國民政府，始終不下決心，任這局面僵下去，我雖離國，也會回來。以上幾句話，定然是構成三月二十一日事變之原因。所可惜的，會仲鳴先生比我年青，卻賞志以歿，先我而死！

我這篇文章發表之後，說不定在什麼時候，我會繼續會仲鳴先生而死；我所盼

望的，我死之後，國人能留心看看我這篇文字，明瞭我的主張，是中國生存獨立之要道，同時也是世界與東亞長治久安之要道。我的主張，雖暫時不能爲重慶方面所採納，終有一日，爲全國人民乃至中日兩國人民所採納，則我可以無憾。

（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 覆華僑某君書

某某老兄：

看了你三月十四日的信，感動極了！你的大意，對我的志事，十分相信；而對於我的決策，却不免懷疑。我感謝你的相信，因此我對於你的懷疑，願意和你說個明白。

如果日本定要滅亡中國，我們除了戰下去，更無他法。如今日本已將和平條件提出來，這些和平條件，既然不能說是亡國條件，那麼我們爲什麼不可以言和平？我們的老朋友陳嘉庚說：『言和平就是漢奸』，爲什麼言和平就是漢奸？如此說來，憲法上規定國家有講和的大權，是規定國家有做漢奸的大權了！『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匾子，其解釋應該是『忠孝仁愛信義漢奸』了！

這些話不必說了；如今且就你所懷疑的，說一下罷。你說：『歐洲快要戰起來了，我們何苦於此時和？』歐洲的局面，準備戰爭與避免戰爭兩個錘子，還在上下起落不定，連歐洲的政府當局，也不知道戰爭何時起來，你怎會知道？還有

一層，即使歐洲戰爭果然起來了，那麼，英法俄都在汲汲於歐洲戰爭，美國自然也是看得歐洲戰爭比中日戰爭關係更切，那麼，歐洲戰爭只有更分去各國對於中日戰爭的注意，你盼望他做甚？還有一層，近代戰爭，在當事者間莫不想速戰速決，然而兵連禍結，往往不如所期；難道歐洲戰爭延長下去，我們一定要陪着也延長下去？還有一層，即使歐洲戰爭能够速戰速決，但是勝利屬於何方面，你怎能斷定？還有一層，即使勝利屬於你所斷定的方面，以現在國際關係如此錯綜複雜，各國間的利害衝突，如此變化無常，動盪不定，你怎能斷定這一方面的勝利必然大有造於我？有些人說：歐洲戰爭起來，一定是英法俄和德義對壘，美國一定是加入英法俄方面，德義一定是失敗，那麼，英法俄美移得勝之前以向日本，日本一定是除了屈服，只有滅亡：這樣渺渺茫茫的樂觀論，你難道就要根據之以決定抗戰到底的策略嗎？

你又說：『現在我們抗戰一天比一天好，』你何所見而云然？自從抗戰開始以來，人民出錢出力，受盡流離顛沛，沒半句怨言，將士奮勇犧牲，前仆後繼，絕無反顧，這是中華民國的元氣，是中華民國生存獨立之所託。日本之所以提出和平條件，未嘗不是看重這一點，知道中國是不可以滅亡的。此次和平運動如果

成功，實實在在是拜一般抗戰民衆及將士之賜。但是，你須牢牢記著，我們對於抗戰的力量，及其可以得到的效果，固然不可估量過低，却也不可估量過高。如果估量過高，會把已經出了的力量，白白的糟蹋，會把可以得到的效果，白白的送掉。老實告訴你罷，如今抗戰實實在在一天比一天艱難了。如何可以說一天比一天好？你難道不知道自抗戰以來，所失去的地方，其幅員之多，時間之短，歷史上宋亡明亡的時候，都無其例麼？不過宋亡明亡的時候，每失一地，還知道痛心，朝廷是要下詔罪己的，將帥是要革職拿辦的。如今呢？却滿不在乎！有過一位監察委員說了一句：『失地不聞痛心，喪師乃曰豫定』，立刻將他撤職。從此以後，鴉雀無聲。許多重要城鎮，在失去的時候，加上些『轉移陣地』，『變更戰略』，等等字樣，更重要的，再加上些『已無戰略上之價值』，『已予敵以重創』，戰略上之目的已達，無固守之必要』等等字樣，說出來時，臉上沒有一點難過。你聽了，自然以爲抗戰一天比一天好了！還有一層，宋亡明亡的時候，還知道一個戰字，一個守字，不幸而戰敗守不住，無可如何而已。如今則換了兩個字，一個是丟，一個是燒。轉移陣地等等字樣，是丟的文章詞藻；至於燒的文章詞藻，却更多了。廣州是丟的最著之例，長沙是燒的最著之例，擴而充之，及於各

處，丟得越快越好，燒得越光越好。其所以能於這麼短的時間，失却這麼多的土地，全在於此。再加上共產黨的所謂游擊戰，凡是丟不了燒不了的地方，有了共產黨的所謂游擊戰，便不愁在地方上還會有一點子遺了。你讀過歷史，你知道共產黨所謂游擊戰，不過是流寇的別名，人民如禾，流寇則如蝗蟲，所過之處沒有不食盡燒光的。從前的人，聽見流寇二字，就會驚心，如今給共產黨加上些文章詞藻，卻被認為抗戰到底的祕訣了。只是文章詞藻是文章詞藻，事實是事實。你身在海外，所見到的，是文章詞藻，以為有了這樣抗戰到底的祕訣，自然抗戰一天比一天好，可是在內地所身受的人民，其痛苦是怎樣？還有許多真正可稱為民衆武力的游擊隊，能協助正規軍隊共同作戰的，被那些共產黨所謂游擊戰混在裏頭，攪得皂白不分，其痛苦又是怎樣？這豈是你所知道的？去年十一月間，我在重慶接連發表了幾篇『全面戰爭』等等文字，真是一字一淚，惹得共產黨破口叫罵。不知道你看見了沒有？總而言之，抗戰一天比一天艱難，是無可諱言，而且不必諱言的。知道抗戰一天比一天艱難，如果除了抗戰下去，別無他法，那就要將抗戰期間所發見的缺點，痛痛的舉發出來。當局之欺罔人民，是要舉發的；共產黨之趁火打劫，全無人心，是要舉發的。如不舉發，不止是諱疾忌醫，而且是

養癰貽患；抗戰到底，必致變成抗戰伊於胡底了。如果除了抗戰還有和的一條路，那麼，只要和的條件，不是亡國條件，我們就應該拿出抗戰的決心與勇氣來講和，不要使抗戰以來已經出了的力量，白白的糟蹋；不要使可以得到的結果，白白的送掉。

戰的時候，和之一字，是一般人所不願意聽的，因為講和的結果，自然沒有征服的結果，來得暢快。如今一般人因為恨日本侵略，恨不得將日本整個滅亡，然後痛快，聽見講和，自然滿肚皮的不舒服。一般人如此，是不足怪的；但是政府却不可為這一般人所轉移。一般人同仇敵愾的心，政府固然應該加以鼓舞，庶幾不致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然而政府更應該知道虛之憍足以誤事。一般人儘管高調，政府則必須握着現實，不得不戰則戰，可以和則和，時時刻刻小心在意為國家找出一條生路，纔是合理。如今不然，政府的高調比一般人來得更大大砲些。政府既然日日的瞞着良心，來說硬話，一般人何苦自討沒趣？何況話一出口，就被人指為漢奸，一般人心思想，亡國是大家有分的，漢奸的惡名却要我一個人承當，這更是何苦？這麼一來自然而然的，心雖知其危而口不敢言了。這是不說老實話的原因，也就是不負責任的原因，也就是亡國的原因！

老兄，我在重慶時候的處境，你是知道的。我租得一間房子，有幾十個衛士繞圍着，我的安全是無問題的。如果激機來呢？我會入地下室；如果重慶又像南京武漢呢，我會隨着機關遷移。我在中國國民黨是副總裁，在國防最高會議是副主席，我沒有最高權力，我言而聽則幸甚，言而不聽，則言者無罪，一旦不幸到了大崩潰的時候，我還有希望名正言順出來收拾，收拾不來，我以一死報國，生前甚逸，死後亦獲令名。你替我打算，我有了這樣的處境，如何會離開重慶？但是你知道我的，我從二十多歲投身革命以來，就不會替自己打算過，何況如今已經五十多歲了，眼看着國破家亡，我那裏還有這些閒心，來替自己打算？我自從抗戰開始以來，想到中國不得已而抗戰，時時刻刻想着抗戰怎樣可以持久，怎樣可以獲得勝利，同時也想着怎樣可以覓得和平。我對於覓得和平的意見，在會議裏，不知說過多少次了，到了廣州丟了，長沙燒了，我的意見，更加堅決，更加期其實現。我於去年十二月九日經過一番劇烈辯論之後，知道在會議裏無採納之望，纔於十八日離開重慶，二十九日以此意見公之國民，而促重慶諸人之反省。在這時候，難道不知道我自此以後處境的困難與危險麼？如果依然抗戰下去，對於我主和的意見自然是如水火之不相容，即使結局是和，但對於我主和的動機

定然不少惡意的或私意的揣測，我亦何能免於危險！但你須知道，這是我所不願的。我自從發表豔電以後，沒有說什麼話，只有一次答過答問。這一番問答之辭，曾登載在南華日報，此外再沒有說什麼話了。所以如此消極，無非待重慶諸人之反省。我並且對重慶來人鄭重的說，只要採納我的主張，至於我的個人，是準備隨時以在野資格從旁協助的。老兄，你想，我除此以外，還有其他表白的方法沒有呢？

以上的話，是關於我個人的，本來不必說，因你的信中，殷殷念及，所以帶說幾句，如今把關於個人的話攔起不說，再說說主張罷。我的主張，始終必被採納的，不但從客觀條件上，兩國有不得不和之勢，即在主觀條件上，兩國當局也都有和的要求。所以我之所憂，不在乎主張之不被採納，而在乎採納之不澈底，因為中日兩國國民間之仇恨，積之已非一日。抗戰開始以來，這種仇恨與日加深，欲其消除仇恨，開誠合作，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過二十個月的苦戰，中國人固然了解日本作戰能力之強，日本人亦了解中國不是可以隨便欺負的，為使將士之血，不致白流，人民之顛連困苦，不至於為無代價之犧牲，兩國的政府及人民，總應該有較為長遠的打算。我以爲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近衛內閣的聲明，

以及二十九日我的建議，都是着眼於此點的。可憐重慶諸人，對於近衛聲明，既加以忽略，對於我的建議，更是感情用事，除了謾罵之外，看不見一些理性的話頭。及至最近，雖然有期望和平的表示，但其進行的方法，仍然是九一八以來避免直接交涉的那一套，仍然是只顧面子，置國家的實際利害於不顧。那麼，還能希望他們對於兩國的將來，作較為長遠的打算嗎？我之所憂，莫過於此，我但願他們終有幡然覺悟的一日，那麼，真是國家之福。

以上所說，都是對於你的來信所發，自從三月二十一日之後，我有一篇文章，題為舉一個例，今隨函附上，不另說了。專此，並候起居。

汪兆銘啓（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

## 曾仲鳴先生行狀

嗚呼！余誠不意今日乃執筆爲仲鳴作行狀也！當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余在南京中央黨部爲兇徒所狙擊，坐血泊中，君來視余，感甚，余以語慰之，此狀今猶在目前，乃今則君臥血泊中，而以語慰我也。余當日雖瀕於死，而卒不死，乃今則君竟一瞑弗視也。國事至此，死者已矣，生者當以死繼之，其有濟於國與否，未可知也；卽幸而濟，茫茫後死之感，何時已乎！君以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歲次丙申二月二十八日，生於福建之閩縣，幼孤，母氏至賢，君於諸兄弟姊妹中，年最少，姊氏醒，適方氏，少孤，攜孤子賢偕與夫之女弟君瑛，及夫弟聲濤聲洞同留學於日本，先後加入中國同盟會，從孫先生致力革命。庚戌之歲，嘗與君瑛暨黎仲實，俞雲紀，黃復生，陳璧君及兆銘謀刺清攝政王，事敗，復生兆銘被執；復與君瑛等，參加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雲紀聲洞戰死。元年，與君瑛璧君等得官費留學於法國，各攜其弟妹偕行，節三四人所得，以資六七人之用。君於此時，年十五，君瑛之妹君璧，則少於君二歲，自幼時，備聞姊氏之教

，知以身許國之義。既入蒙達爾智中學，銳意力學，孜孜矻矻，又自以年幼，去國遠，每學校休假，則移游息之晷，以補習國學，兼程並進，學識日懋，而習於勤儉，志節堅定，他日爲國服務，廉潔之操，亦於此養成焉。元年以來，國事靡定，兆銘僕僕奔走，留學之願，有志未逮；君則沉潛專一，中學畢業，更入大學，初治化學，兼治文學，先後在法國波鐸大學獲化學士，在里昂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名實斐然。復在里昂中法大學任祕書長之職，於華法教育多所盡力，且留心國內政聞，其政治主張，亦確定於此時也。君與君璧幼同學，志趣相得，既成夫婦，伉儷尤篤，君璧致力繪事，有聲於中外；十四年，相將歸國，皆任教授於廣州中山大學，迨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成立，君被任爲祕書，是爲君盡瘁國事之始。自始以後，數年之間，中國之進步與紛亂，更迭起伏，君與兆銘，相從患難，識定而氣閒，然備嘗險阻，習知情僞，其恢弘之度，遂與日俱進。二十年十二月，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君被舉爲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廿一年一月廿八日，任行政院祕書長，旋調鐵道部次長。其時東北已喪，淞滬又被兵，舉國汲汲，以救亡圖存爲務；而共產黨則乘機益猖獗於江西，謀顛覆中華民國，中央於是決策，對內務根據三民主義，以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其尤要者：充實民力

，發展國力，以裕民生，以固國防，凡有障礙，悉掃除之；對外則務以和平正義，求得國際之同情與援助，且期待日本之最後覺悟。凡此決策，蓋深維本末之義，而確定救亡圖存之方針與步驟，大計既定，頒之全國，一致遵行。軍事委員長蔣中正，督師南昌，當剿匪之任，其他行政諸機關，亦皆同心協力，謀國是之實現。君在鐵道部，佐部長顧孟餘改進路政，雖庫帑奇絀，債務累積，而運籌布策，不遺餘力，先後舉辦京浦輪渡，延長隴海鐵道，復完成粵漢鐵道，此為前清末造以來，舉國所歧望而迄未能竣事者，至是始得由廣州直達武漢，與平漢鐵路相銜接，於國防民生，貢獻甚鉅，二十四年十一月，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復被舉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旋辭鐵道部次長職，於翌年二月偕兆銘出國，及十二月聞西安事變，遂歸。二十六年二月就任中央政治委員會副祕書長，八月，中央政治委員會以抗戰軍興，特設國防最高會議，以君為祕書主任。其時中央決策，悉全國之力，從事抗戰，而於和平斡旋，仍並行不悖，當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既作，中央仍宣言願採取一切國際調停和解諸手段，以息戰爭，當八月十三日以後，戰事蔓延淞滬，而九國公約國開會議於比京，提議調停。中央仍予接受。及十二月初，南京垂陷，德國大使奉其國政府之命，傳達日本和平條件，中央承

諾以爲和平談判之基礎。二十七年九月，國聯開會，中央復訓令代表，要求適用盟約第十七條，亦爲以和平方法解決糾紛。凡此事實，皆中外所昭見，而隱微曲折，君以參與機要，知之尤深且悉。夫和戰大計，爲國家生死安危所關，不得不戰則戰，可和則和，此爲謀國之常規。況中國自抗戰以來，全國被兵，失地延及九省，將士死傷百餘萬，人民肝腦塗地，其數不啻倍蓰，如和平條件無害於國家生存獨立，則結束戰事，以圖補救，尤忠於謀國者所宜出。惟共產黨人心中無祖國，其始欲藉淞滬戰事，牽制國軍，俾得以盤踞江西，及頻年被剿，由東南竄西北，窮蹙垂盡，則又藉西安事變，託名抗戰，轉移視聽。抗戰既起，乘舉國存亡呼吸之際，益擴張其政治組織及軍隊，以終遂其顛覆中華民國之謀，知和議若成，必不利於所圖，悉力破壞之，展轉勾引，所以挑撥離間，煽動中傷者無不至。兆銘旣痛國是之被撓動，又怵於國家大計爲宵人所挾持，將不免於覆亡，數數言於國防最高會議。十二月九日，軍事委員長蔣中正至重慶，復激切言之，卒不納；遂於十八日去重慶，十九日至河內，君偕行，二十九日以建議書公布於世。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晨丑時，天未明，兇徒數人，持械突入寓所，發彈數十，傷五人，君傷最重，是日申時卒；夫人君璧以奮身救君，亦中三彈，餘三人傷輕

重不等，兇手當場被捕者三人。越日，法文各報，皆以大字標明藍衣社所爲，且敘兇手供稱，謀殺目的實在兆銘云云。君生平文學著述甚多，而於政治則重實行，少言論，且自以處機要之地，益以縝密爲務；然亦正由其處機要之地，於中央決策之經過及其蹉跎變幻之所以然，瞭然於中，憂國之心既深，及其未亡，而思有以救之；積誠已久，一旦決然行其心之所安，凡悠悠之毀譽，及其一身之死生禍福，固所不計也。嗚呼！是可謂仁且勇矣！君自受傷至逝世，神志清明，語親友曰：『國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無不放心者！』夫人君璧，身受三傷，目睹君之臨命，茹痛言曰：『在此時代，抗戰可死，致力和平亦可死，吾人要當以一己之死，換取國家民族之生存』，君卒時，三子均幼，方會兩家，自前清末造參加革命，至於今日，或身死國事，或盡瘁未已；兆銘往還既密，以公義兼私交，於君之死，爲國痛，爲兩家痛，倉猝紀述，未足以盡君之生平，僅舉其志事之大者，告之同志，俾知所繼述云爾。

汪兆銘撰

（二十八年四月六日）



## 重要聲明

余讀本月五日路透電所傳余與日本首相締結五項條款，不獨不引爲駭異，且目爲重慶方面應有之宣傳。路透社消息之來源，乃根據重慶大公報所登載，而大公報久爲政府中個人之機關，失却報紙應有之職責，此又爲中外所深悉者也。余對於此種毫無根據之謠傳，本不屑置辯，但爲正中外之觀聽關係，用特鄭重舉余主張，以告國人。

余去年之離重慶而發豔電主和，已預料重慶方面之宣傳，將必目余爲漢奸，爲賣國。甚且有個人或團體不斷加以有組織有計劃之謀害。第今日不得不和已爲全國愛護中華民國者之共同心理。各人皆有和平之心，而皆不敢出之於口者，蓋恐遭不測之謀害，而又苦無一自由行使職權之民意機關以公開討論之也。余愛護孫先生所手創之中華民國，不忍滅亡於無識者之手中，故毅然排萬難冒萬險以主張之。但求條件非亡國之條件，使中國得以蘇息，得以復興，則余將堅持到底，雖犧牲生命亦所不惜。故今後絕不因被人加害，而放棄其主張；亦決不因造謠中

傷，而動搖其見地：此應爲國人聲明者一。

此次中日戰事，兩方均蒙歷史上未有之犧牲。而尤慘痛者，則爲吾國得不到政府保障之人民。其喪失生命財產於戰地者，無論矣，即能悉索以避難者，由沿海流亡而至武漢，更由武漢流亡而至滇黔，將來戰事再復延長，必將淪爲餓殍，轉乎溝壑。此種犧牲慘痛之責，兩方當國者，皆不能辭。在日本之估計，以爲中國可不戰而屈，甚或一戰而使中國淪亡。在中國之估計，以爲日本之經濟可以旦夕崩潰，甚或因戰事而起革命。今戰爭將已兩年，雙方皆知中國之最後勝利不可期，而日本欲達其吞併目的亦不可得。兩方皆知之，且洞知之，而猶以兩國之人民爲犧牲，匪特不智，抑且大悖人道。長此相持，東亞之文明可以全燬，而中日兩國人民將必相與枕藉，而兩皆淪胥。余確信戰則兩傷，和則共存。豔電之主張，蓋本諸良心之所驅，而爲全國人民之所共信：此應爲國人聲明者二。

蘆溝橋事變之前，中日兩國本充滿和平之機，屢次可以而終不能和者，兩方皆缺誠意及責任心也。在日本當局豈不能以中樞之力，抑制駐華軍人無厭之求？其所以不爲者，無誠意及責任心也。在中國當局豈不能體察國力，提出正當對案之主張，其所以不爲者，無誠意及責任心也。而尤痛心者，自西安事變，更閉

和平之門，是誰之咎？則主持事變者，與屈服於事變者，皆當尸其全責。余之反共，中外所知，余決不卸膺反共之名，而謀中日和平之實現。尤望日本當局，深察事實，推誠磋商，必使中國爲一領土主權完整之國家，始得對於世界與東亞之和平，有良好之貢獻：此應爲國人聲明者三。

余更應聲明者，余既發豔電，則此後一切行動，當根據豔電，而貫徹和平主張。余決不願中國再以戰事失敗，而再失地，而重苦人民；余更反對日本再以戰事勝利，而變其覺悟，改其條件。至於近日之各地軍事緊張，余尤引爲痛心。猶憶重慶軍事當局，曾指出日軍佔領武漢廣州之後，將必進取西安與南寧；知之而故意指謂余與日本當局締結條款之結果，豈禦侮無方，預料失敗，而希圖卸其責任耶？余更不屑關之矣！

（二十八年四月九日）



## 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

總理孫先生告訴我們：『中國革命之成功，有待於日本之諒解』，這句說話意義重大。日本是東亞一個強國，經濟軍事文化著著先進，最近幾十年，可以說無日本則無東亞。中國事事雖然落後，卻是東亞一個地大人衆歷史深長的國家，如果要強盛起來，日本必然要知道中國的強盛對於日本會發生什麼影響，於日本有利呢還是有害。如果有利，日本當然願意中國強盛，願意與中國爲友；如果有害，日本必然要將中國強盛的動機打消了去，決定以中國爲敵。以一個剛剛圖謀強盛的中國來與已經強盛的日本爲敵，勝負之數，不問可知。

因爲這樣，中國革命若要成功，必須使日本知道，中國革命之成功，於日本有利，這不是權謀策略的，而是誠意的。怎樣纔能於日本有利呢？中國與日本外交方針一致，軍事方針一致，更進而根據平等互惠之原則，以謀經濟合作，這樣中國的強盛，便於日本有利而無害。這是不是有損中國主權呢？絕對不是，因爲一個國家對於一個國家，因爲利害相同而相結合，絕對不是有損主權；這是不是

有損第三國正當權益呢？絕對不是，因為中日的結合，爲的是共同生存共同發達，並沒有排斥第三國正當權益的意味。

十三年間，孫先生在廣州手定國民政府建國大綱，那時候對於中日關係，是照著以上所述方針進行的。十四年間，孫先生逝世，我繼承遺志，主持國民政府，對於以上所述方針，兢兢業業，不敢少變。十七年間，便不然了，濟南事件爲中日關係惡轉的起頭，但是冤仇宜解不宜結，中國此時只宜竭力忍耐，竭力解釋，使中日關係由惡轉而復歸於好轉，不幸當時國民政府計不出此，遂使中日關係由惡轉而更惡轉，由此一直至於九一八事變發生。

我說這話，並非有意責難當時主持國民政府的人，我是一個國民黨員，是一個與國民政府有關係的人，對於這種錯誤，我當然應該分擔責任。不過我要求讀者知道，我在當時是一個亡命者，是一個被國民政府通緝而飄流海外的人，及至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我回到南京，担任行政院長，其後又兼外交部長，我提倡『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來矯正當時『反對直接交涉』的論調，在我手裏先後訂定淞滬停戰協定塘沽停戰協定。我當時的用意，仍是本於冤仇宜解不宜結的觀念，想從局部的暫時的安定，進而謀全國的永久的和平。我的主張，四年之間，

並未達到，我絕不諉咎於人，我只自認才力不逮，事與願違而已。

但是我必反對一種論調，這種論調就是當時所謂主戰派，試問以一個剛剛圖謀強盛的中國，來與已經強盛的日本爲敵，戰的結果會怎麼樣？這不是以國家及民族爲兒戲嗎？

我當初以爲蔣介石先生與我是同心的，我看了二十年十二月蔣辭國民政府主席職後一篇告誡國人的文字，認爲蔣與我同心，所以誠心誠意來與蔣合作，然而四年之間，我已漸漸的覺得不對了。及至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我於大病之後，又受了三傷，身體上支持不住，二十五年一年之內，我遠適異國，直至西安事變發生，方纔趕了回來，則情形更加大變了。我當時只能牢牢認定剿共事業決不可中止，因爲共產黨是只知有第三國際，不知有中國的，他受了第三國際的祕密命令，將階級鬥爭的招牌收起，將抗日的招牌掛起，利用中國幾年來的民族意識，挑動中日戰爭，這種大當斷斷乎上不得的，我當時的言論方針注意此點，讀者可隨時加以覆按。自從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我對於中日戰事，固然無法阻止，然而沒有一刻不想著轉圜；對於共產黨的陰謀，也沒有一刻不想著抵制他，揭破他。直至最後最後，方纔於十二月十八日離開重慶，二十九日發表和平建議。

我的和平建議，是贊同日本近衛內閣聲明的。我爲什麼贊同呢？我依然是向來一貫的觀念，對於日本冤仇宜解不宜結。打了一年半的仗，日本的國力，中國的民族意識，都已充分表現出來，日本既然聲明，對於中國沒有侵略的野心，而且伸出手來，要求在共同目的之下親密合作，中國爲什麼不也伸出手來，正如兄弟兩個廝打了一場之後，抱頭大哭，重歸於好？這是何等又悲痛而又歡喜的事？假使蔣能認識這是中日關係已到了一個新時期，毅然決然對於此聲明的大意，表示贊同，則中日和平途徑即可開展；更進而根據所謂三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條件，期於彼此交受其益，則東亞永久和平之基礎，即可確定；此後共同生存共同發達，不難循序而得。不幸蔣不出此，反而用深閉固拒的態度，對付日本的提議，更用極端壓迫摧殘的手段，對付國內黨內的一切和平建議。以此之故，蹉跎半年，大局日益敗壞，不可收拾，這是眞可痛惜的！

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項原則，固然在近衛聲明中，方纔輪廓明白，但是數年以前，日本已經有此提議了。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日本有吉大使與蔣會見，曾經提出以三原則爲改善中日關係之基礎，蔣表示贊同，并表示無對案。其後忽然翻覆：一則曰，那時是軍事委員長，不是行政院長，所說的話，不能

算數；二則曰，那時是以私人資格談話，不是以公式談話；三則曰，所謂贊成者，乃是贊成對於三原則之討論，不是贊成三原則；四則曰，所謂無對案者，乃對於三原則之實施而言，絕非無條件的贊同：這是二十五年整整一年中日交涉反覆停頓之原因，也是二十六年中日衝突終於爆發之原因。我們讀了當時的外交談話紀錄，只有浩歎。及至二十六年十二月至二十七年一月，德國陶德曼大使調停戰事，所述日本政府的和平條件，何嘗不也是三原則？我在『舉一個例』文中，已經說過，不必再述。至於近衛聲明，本其向來一貫的主張，爲系統的敘述，並且於我國顧慮之點，均已加以解釋，例如關於共同防共，因爲我國顧慮以此之故，干涉及於軍事內政，故聲明以日德義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關於經濟提攜，因爲我國顧慮政治糾紛尙未解決，故聲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并聲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佔，亦非欲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之利益；有了這樣鄭重而明白的聲明，則三原則之實行，決無害於中國之自由獨立。不但此也，所謂共同防共及經濟提攜，其主要目的在使共產擾亂與經濟侵略兩大毒害絕跡於東亞，這等責任非常重大，日本既屬望中國分担這等責任，則中國必須有充分之自由獨立，方能有分担此重大責任之能力，自無待言。然則我們贊同

此聲明，決不是苟求一日之安，而爲的是東亞的百年大計，然則我們爲何對於此聲明採取深閉固拒的態度？

在蔣統制下的宣傳，動不動說，日本正在以全力滅亡中國，所謂三原則，不過是一種托詞。這種宣傳，實在是不對的：第一，日本若要滅亡中國，則以全力繼續作戰便了，不必有所托詞；第二，三原則之提出，已歷數年，如上所述，自近衛聲明以來，更明顯的定爲國策，全國輿論，已趨一致，何以見得是托詞？第三，中日兩國如果沒有一個共同努力的目標，則因利害衝突之故，勢必至於水火不相容，反之，有了一個共同努力的目標，則利害一致，衝突自然無從發生，這樣的關係重大，如何可以說是托詞？第四，數年以來，中日關係所以不能改善，且日趨於惡劣，係誤於一種循環論。例如日本說：中國排日，是九一八事變的起源，中國說：日本侵略是排日的起源；日本說：中國要拋棄以夷制夷政策，纔能使中日關係好轉；中國說：日本要放棄對於中國爲野心，纔能使中日關係好轉。諸如此類，都是互相期待，互相責備，以致愈弄愈糟，如今有了一個共同努力的目標，以同時著力，先期待自己，然後期待他人，先責備自己，然後責備他人，則進步必然較快，成功必然較易，如此做去，不但使中日過去的糾紛得以解除，

現在之戰禍，得以結束及補償，而將來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大道，也可以從此踏上了。

然則爲什麼一定要拒絕和議而高調繼續抗戰呢？我們必須知道，抗戰以來，軍隊和人民都已充分的表示了民族意識，這是不可磨滅的；然而同時我們又必須知道，這種民族意識，如今已被共產黨完全利用了。利用民族意識，在民族意識的掩護之下，來做摧殘民族斷送國家的工作，在共產黨是以爲當然的，因爲他根本就不知道有所謂民族，有所謂國家。他只知道接受了第三國際的命令，要把中國來犧牲，犧牲的地方越大越好，犧牲的人數，越多越好，犧牲的時間越長越好。中國固然犧牲個精光，日本也不免要受多少創傷，這在第三國際看來，真個是一舉兩得。何況天從人願，抓著了蔣來做幌子，以盡情發洩十六年以來『剿共』的仇恨，等到盡情發洩之後，他自然會回到他的第三國際老家去，用不著一些留戀。因爲這樣，所以三番幾次得著了恢復和平的機會，偏要說抗戰到底，這就是說中國永遠得不著和平的，非替第三國際犧牲到底不可。總而言之，共產黨的罪惡，浮於義和拳，而爲共產黨利用的人，其罪惡又浮於剛毅諸人以上，雖然尚有忠勇的軍隊，忠勇的人民，至多不過如聶士成一般，只能盡自己報國的心事，決

不能挽回當前的劫運，不如學劉坤一張之洞之保障東南，李鴻章之挺身入京，在八國聯軍槍桿之下，成立和議，或者還可以補救一些。

我覺得今日有兩條路擺在面前：一條是跟著蔣高調繼續抗戰，以蔣現有的兵力，不但不足以抵抗日本，並且不足以控制共產黨，以蔣現有的環境，雖欲不跟著共產黨而不能，這樣下去，只有以整個國家民族跟著蔣爲共產黨的犧牲。另一條路是把總理孫先生的遺志重新的闡明起來，重新的實行起來，對於日本，本著冤仇宜解不宜結的根本意義，努力於轉敵爲友。第一步恢復中日和平，第二步確立東亞和平。這兩條路，前一條是國亡滅種的路，後一條是復興中國復興東亞的路。我決定向復興中國復興東亞的一條路走，我決定團結同志並團結全國各黨各派以及無黨無派有志之士，來共同走上這一條路。

(二十八年七月九日廣播)

## 敬告海外僑胞

海外僑胞：剛纔我廣播了一篇論文，題目是『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你們已經聽見了。如今想對你們再說幾句話。

我最奇怪的，是聽見有人說道：『當日既然主張抗戰，如今又主張和平，豈不是矛盾？』這句說話，真是奇怪！如此說來，兩個國家，既然打起來，就應該一直打到底，絕不應該再有和平的日子了。這句說話，在道理上如何說得過去？

甲午戰敗，是一件極不幸的事，然而當時的滿洲政府，還算是有愛國心的，戰敗了，就承認戰敗，講和的結果，雖然割地賠款，卻還保得住大部分未失的土地人民主權。如今呢，戰敗不承認戰敗，和一個賭鬼似的，越賭越輸，越輸越賭，寧可輸個精光，斷斷乎不肯收手。這不是比起當時的滿洲政府還沒有愛國心嗎？

如果『講和的結果，所得到的，不過是亡國條件』，那麼，講和自然沒有意義；但是如今日本所提出的條件，如睦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算得是亡

國條件麼？有人說道：『日本將藉共同防共經濟合作之名，將中國軍事經濟的獨立自由完全剝削了去，不割地甚於割地，不賠款甚於賠款。』這話不對。共同防共，經濟合作是有內容的，有範圍的。我們何以不可於講和的時候，將內容及範圍加以確定，卻憑空的說這些話？又有人說道『日本如果誠意以謀和平，爲何不先撤兵，至少回復到蘆溝橋事變以前狀態？不然，無論什麼和平條件，都是假的。』這話更不對。從來兩國交戰，都是由停戰而講和，由講和而撤兵；如今蔣既高調繼續抗戰，則交戰形勢仍然存在，撤兵從何說起？又有人說道：『日本不是說要在中國駐兵嗎？可見撤兵是不能見之事實的。』這話也不對。近衛聲明所謂『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期間地點都有限制，而且是經過雙方協定的；所以我的豔電，曾有『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爲限』的建議。這個問題，固然重要，但可以於停戰講和的時候，詳細訂定，與撤兵是兩件事。總而言之，日本所提的和平條件，縱然尚有討論之餘地，但決不能說是亡國條件。

反過來說，繼續抗戰下去，其結果會怎樣呢？今年二三月以來，所謂全面總反攻，其爲一種虛偽的宣傳，已經事實證明了。照這樣下去，繼續抗戰，極其能事，不過繼續游擊戰而已。游擊戰是流寇的別名，我早已說過。可是這些流寇，

正被蔣獎勵著，再加以共產黨之操縱著，把持著。別的地方不用說，廣東是海外僑胞的家鄉，想必早有所聞。去年十月，日本軍隊開入廣州，曾經公開的說，沿途並沒有遇着軍隊襲擊，只是遇着蚊子襲擊得很利害。當時所謂陣地戰，其作用不如蚊子，可是一變而為游擊戰，聲勢便不同了！能收復失地嗎？自然不能。能打仗嗎？自然不能。然則能做些什麼呢？能騷擾地方，能殺害百姓。鄉村地方，遇着兵燹，工業不用說了；說到商業，如果是坐店，游擊隊會來派捐，除此之外，還會來綁票，非將你弄光了，不肯住手；如果是行商呢，遇着游擊隊，美其名曰檢查，將你的衣服，通通剝去，換一套破爛的給你穿上，便算是很客氣的了；其理由是，怕衣服裏面有夾帶。兩三月前，有一個人，帶了七百銀子，想由石岐去澳門，剛剛出城，七百銀子便被游擊隊繳去了：這個人沒奈何，只得學學游擊隊的辦法，逢人便搶，一面搶，一面走，雖然遇着幾次游擊隊，却也搶了幾次其他旅客的東西，最後走到澳門，居然七百之外，還贏了三百。你們聽見，會羨慕嗎？至於農民，他靠着一塊地為生活，耕種刨鋤的時候，游擊隊當然不會來分勞，可是按畝派捐，是一文也不能少的；這樣的一面牛馬般的辛苦工作，一面還要籌款納捐，已經够受的了；及至收穫，可更當心，游擊隊來，搬得了的，都搬了。

去，搬不了的，放一把火，燒個精光。說這是焦土戰，這是最後勝利的最大把握！試問農工商都是生產分子，而農在人民中，爲數佔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他們現在處的是何等生活？如此下去，民安得而不窮？財安得而不盡？而民窮財盡的結果，只有國亡種滅。東晉南宋，雖不幸爲外族所侵凌，還能偏安至百餘年之久；明末則弘光永歷，并殘喘亦不能苟延。這是什麼原故？因爲東晉南宋時代，還沒有這麼多的流寇，卽有之，當時政府，還能加以撲滅，所以民力不至耗盡，國家也就賴以不亡。明末則流寇所至，赤地千里，民力盡了，國欲不亡，又安可得？如今呢，較之明末，更可怕了。以一個軍事委員長的蔣先生，跟着共產黨，提倡流寇主義。土匪呢，編做游擊隊；地方保安隊呢，編做游擊隊。正式軍隊不屬於自己直系的呢，也慢慢的都編做游擊隊。繼續抗戰靠此，最後勝利也靠此。簡單一句話：抗戰不足，國亡種滅有餘！

有人說道：『日本欲謀和平，何故不以蔣先生爲對手呢？譬如下象棋，先將或帥搬了去，這棋還能下嗎？』這話對的。然而如果蔣先生公開的說，只要日本所開條件，不致妨害中國之獨立自由，那麼，我個人進退不成問題。蔣先生如果說這麼一句話，其效果比誰說也好得多罷！然而你敢勸蔣先生說嗎？立刻就

藍衣社來找你！

海外僑胞，我知道你們有愛國心的，然而你們遠在海外，見聞不實。並且你們恕我說一句話，你們所站的是風涼地，自然易於說風涼話了。你們只要回到中國來，你們就會知道一切。你們知道一切之後，如果國已無可救呢，我和你們同死。如果還有可救呢，我和你們同負救國的責任。

(二十八年七月十日廣播)



## 兩種懷疑心理之解釋

和平是人人所希望的，但是和平如何纔能實現呢？似乎還有些人在懷疑著。第一個疑問是：如果最後勝利，豈不比和平更好？第二個疑問是：日本是否有誠意？我們是否會上當？

如今先解答第一個疑問。

以一個剛剛圖謀強盛的中國，來與已經強盛的日本爲敵，勝負之數，不問可知。但是既然打起來了，則爲鼓舞人心振作士氣計，說一些『最後勝利必屬於我』，也是望梅止渴的意思。然而說得過分，是有危險的；如果被利用了去，就更危險了。例如蘇聯參戰，在初開仗時候，是說得最響的；當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成立的時候，軍事最高當局會說，三個月內，蘇聯必然參戰；共產黨更是趾高氣揚，捧共產黨的人便狐假虎威的，對於明瞭國際情勢不肯隨便附和的人，加以種種壓迫。可是三個月以後，上海丟了，南京丟了，共產黨人却即刻變過口來，說凡是主張蘇聯參戰的人，都是托派漢奸了。哼！諸君注意，不但講和平的，共產

黨叫做漢奸，就是講蘇聯參戰的，共產黨也要叫做漢奸呢！因為共產黨所謂漢奸，是就蘇聯立場說，不是就中國立場說。共產黨的最大任務，在挑起中日戰爭，尤在挑起之後，一直的打下去，不要住手。所以你講和平，共產黨叫你做漢奸，你講蘇聯參戰，共產黨更叫你做漢奸。即使你只剩了一塊地，只剩了一個人，共產黨還是毫不動心的。聊齋有一段畫皮故事：一個書生被妖精迷住了，及至臨死，覺悟過來，想將妖精推開，那妖精却睜著眼冷笑道：『你還想活麼？』共產黨所謂反對中途妥協，所謂抗戰到底，便是這般面目，這般口氣。共產黨不足責，可怪的，軍事最高當局在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成立的時候，曾說三個月內聯蘇必然參戰。料事之錯，人所常有，但是既然知道錯了，就應該改正過來，不應該一直的錯下去，如果說三個月不來，等他三年，那麼也可以說等他三十年，三百年，三千年，那時候連吳稚暉的無政府主義也會實現了，何止蘇聯參戰？以上所舉，只是一例，但即此一例，可概其餘。總而言之，說得過分是有危險的；明知其說得過分，而還要這樣說下去，其危險更大了。至於被共產黨利用了去，則不是望梅止渴，而是飲鴆止渴了。其為危險，更不待言。懷著『最後勝利豈不比和平更好』的人，不可不猛省。

第一個疑問解答完了，再來解答第二個疑問。

日本是否有誠意呢？我們是否會上當呢？這自然是憂深慮遠所發出來的疑問。兩年以來，日本耗了許多兵力財力，得到了中國許多地方，肯輕輕放手嗎？中國向來有一句話，能戰然後能守，能守然後能和，不能戰而戰，其結果爲喪師失地。然而只剩了一個人，只剩了一塊地，這一個人這一塊地還是獨立自由的，如果不能和而和，只怕連這一個人一塊地也失了獨立自由啊！睦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說得好聽，然而威爾遜的十四條更說得好聽，德國人民因爲相信了他，方纔將威廉第二趕走，而其結果卻換得一部書似的凡爾賽條約，這種當我們可以上嗎？以上疑問，不但憂深慮遠，而且痛心疾首，比起阿Q式的最後勝利論實在明白得多了。我以十分同情來對於以上的疑問，我更以十分誠意來對於以上的疑問，加以解答。我以爲要解答這疑問，最好將中山全書裏頭大亞洲主義的演講重讀一過。這演講是孫先生於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神戶對商業會議所等五團體發表的，這是孫先生一生最後的演講，也是孫先生一生最大的抱負。讀了這演講之後，便可知道亞洲的危機如何重大，亞洲人的責任如何重大了。中日兩國爲什麼只可做朋友，不可做仇敵呢？因爲做朋友方能共同担负這重大的責任，對

付這重大的危機；做仇敵則彼此相消，其結果必致爲人所乘，而同歸於盡。中日兩國之只可做朋友不可做仇敵。是以此重大意義爲其基礎的。縱使一時烏烟瘴氣將這重大意義遮蔽住了，做起仇敵來，然而環境與認識，終必有使其回過頭來做朋友之一日。這是對於第二疑問的解答，同時對於第一疑問也就得到確切的解答。因爲中日兩國，如果從此眞真的做起朋友來，這便是最後勝利。須知道，一方勝利，一方失敗，決不是眞勝利；兩方都得到勝利，這纔是眞勝利。大凡國與國的交際，權謀術數沒有多大用處，最要緊的是有眞實的認識。如果明白了大亞洲主義的根本意義，明白了亞洲重大的危機，明白了亞洲人重大的責任，則對於中日兩國之只可做朋友，不可做仇敵，便有了眞實的認識；便不怕沒有誠意，不怕會上當了。於此附帶幾句話，大亞洲主義並沒有排斥他洲人的意味。我相信中日兩國做了朋友之後，亞洲必然得到和平，得到繁榮，他洲人住在裏頭，只有更加幸福。同時我相信中日兩國如果這樣的做仇敵，相持下去，則亞洲將非亞洲人之亞洲了。

去年四月，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頭會說：『吾人之本願在和平，吾人之最終希望仍在和平。惟吾人所謂和平，乃合於正義之和平。必如是，

然後對內得以自立，對外得以共存；必如是，始爲真正之和平，永久之和平』。又說：『以此之故，中國對於日本，既明示以抗戰之目的，更本必死之決心，盡可能之努力，以赴此目的；必使日本瞭然於中國之目的，知中國終不可以暴力屈服，幡然變計，放棄其侵略主義，更與中國謀合於正義之和平；然後中日共存之希望始達，太平洋之危機始息，世界和平始得到真實之保障』。由此可見中國對於和平之希望及其對於和平之基本條件，由此可知所謂『講和卽漢奸』，所謂『抗戰到底』，所謂『中途妥協卽是滅亡』，全然是共產黨人一方面的議論。現在和平之基本條件漸漸的得到了，和平之希望漸漸的有實現的可能了。我們本於向來的確信，及現在所得到的真實情形，我們對於和平前途，沒有懷疑，以滿腔的熱誠向前邁進！

（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 怎樣實現和平？

各位同胞：如今我在廣州向你們廣播，眼睛裏雖然看不見你們，心神早已和你們在一起的，如今身體也和你們在一起了，說不出的感動，說不出的興奮！

七月九日我會經廣播一次，題目是『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當時沒有將廣播地點說出來，有些自命高調的人，說我定然淪陷了的地方失了自由了。我如今告訴各位，我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發表和平建議之後，沒有離開河內一步，我當時實在盼望蔣介石肯替國家民族着想，接受我的建議。等了幾個月，知道這盼望是徒然的，可是國家民族不能不救，於是開始奔走。當奔走的時候，我沒有通知藍衣社的義務，自然只好把行蹤祕密起來，不但當時如此，以後如有必要也是如此。如今我第一句要問的：我爲什麼不可以走到淪陷了的地方？須知道在戰時一個人所能站着的地方。不外以下幾種：一是前方，一是後方，一是淪陷了的地方，一是外國。可是中國人呢。卻多了兩種：一是租界，如上海，天津等；一是外國的殖民地，如河內，香港等。我並沒有鄙夷住在這兩種

地方的人，我以為只要看他的目的和他的言論行動。如果他的目的和他的言論行動，時時刻刻是替前方後方及淪陷了的地方的民衆着想，時時刻刻想去解救，那麼他的努力，毫無分別。如果他以為現在托庇在外國帝國主義勢力之下，站在風涼地方來說風涼話，我自然鄙夷他。

在前方後方的民衆心事是怎樣的呢？如果和平沒有希望，同歸於盡，無可說的；如果和平有了希望，和平的條件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爲什麼不可以講和平。然而在蔣介石及共產黨壓迫之下，『講和平的是漢奸』，這些民衆，只有在壓迫之下，一聲不響，由他擺佈，至死爲止，我們想到這裏，只有用盡方法，把這些前方後方的民衆解放出來。

至於在淪陷了的地方的民衆呢？他們的心神，與前方後方的民衆，是不可分的，不但心神如此，身體也是如此，所謂生則同生，死則同死。如果和平沒有希望，同歸於盡，無可說的；如果和平有了希望，和平的條件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他們當然講和平，並且熱烈的追求着怎樣實現和平。

就廣州來說，在去年十月以前，民衆所聽到的是當局叫人民安心，日本軍隊斷斷不能來到，直至十月初旬，還是如此說。及至日本軍隊將要來了，當局帶

領軍隊先走，將民衆丟下，而臨走的時候，還要放一把火，把居民商店燒個精光，這是廣州民衆處在前方後方地位的時候所身受的。至於丟剩了燒剩了的，在當局看來，只有恨他死不盡，燒不光，還不斷的唆使土匪，用游擊的名義來繼續焚燒搶掠的工作；這是廣州民衆處在淪陷地位的時候所身受的。當局爲什麼如此呢？是奉蔣介石的命令。蔣介石爲什麼如此呢？是奉共產黨的教條。試問這些犧牲有得到一點代價沒有？當初燒的時候，日本軍隊不會因此不來；燒了之後，日本軍隊來了也不會因此站不住。試問這一場燒，除了燒死人民，燒絕了人民生命所寄託的財產，還有其他什麼意義？廣州燒了還不算，武漢臨去的時候，也照樣的一道命令要燒個精光，因爲奉令的人於心不忍，燒得不甚澈底，因此索性長沙於未丟以前，就澈底的燒個精光了！未來的重慶成都，也是如此。而且除了這樣的大燒特燒之外，還要帶着游擊隊零零碎碎的燒，要使全國都變成瓦礫，變成灰燼，如果和平沒有希望，同歸於盡，無可說的，如果和平有了希望，而且和平的條件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爲什麼一定要把民衆趕上了死絕的路上去？！這些呼聲，在前方後方的民衆被箝着口發不出來；可是在淪陷了的地方的民衆，卻已發出來了。我爲什麼走到淪陷了的地方來？我是爲這種呼聲所召喚，我是要將這種呼

聲與前方後方被箝着口發不出來的呼聲連結在一起！

我第二句要問的是：爲什麼我走到了淪陷的地方便會失了自由？無論現在日本方面，並沒有侵奪我的自由，我既然下了決心，走到這地方來，難道連『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道理也不懂得？我只會死，絕不會失却自由。不但此也，我時時刻刻準備着以我的生命，換取同胞的生命，以我的自由，換取同胞的自由。

以上兩句要問的已問完了；如今所要說的是怎樣實現和平。這似乎很繁複，其實很簡單。只要蔣介石看得國家民族比他個人重些，遵守孫先生大亞洲主義的遺教，接受日本關於和平的聲明，那麼全國停戰，立即可以實現，跟着和平談判，就可開始。在和平談判中商量各種問題，如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等，都根據原則以謀具體條件之折衷至當；於是全國所渴想的撤兵，必可以做到。試問這樣，豈不是一件極簡單的事？

但是蔣介石，既然看得他個人的利益大於國家民族的利益，寧可將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獻給受第三國際指揮的共產黨，以爲西安事變替他個人救苦救難之酬勞品。明明白白和平有了希望，而且這和平明明白白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

他偏要悍然不顧來加以反對。這樣一來，和平的實現。便遇着極大的阻礙了。

然而要除去這極大的阻礙也有方法，而且這方法並不繁複，實在簡單得很。只要在前方後方的行政當局，以及帶着軍隊的人，明白了和平有了希望，而且這和平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破除了蔣介石的欺騙宣傳，擺脫了蔣介石的箝制力量；第一步公開的贊成和平，在自己力量所及之地，肅清共產黨的一切陰謀罪惡，保衛地方的治安，保衛人民生命自由財產的安全；第二步將贊成和平的聯合起來，公開的要求蔣介石以國家民族為重，不再做和平的阻礙。這樣和平的實現，在短期間內，必然普遍全國，由和平實現而得回獨立自由，由得回獨立自由而奠定了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基礎。復興中國，復興東亞，必由於此。

或者有人會提出疑問道：假使我們有這樣的表示，而日本軍隊仍然進攻，那麼，不但和平會成泡影，而且徒然懈怠了軍心，散亂了人心，豈不為害甚大呢？我如今鄭重的明白的答覆道：如果在前方後方的行政當局，以及帶着軍隊的人，能有贊成和平的表示，反共的表示，則日本軍隊必不會進攻。因為日本政府，已有聲明在前，盼望中國有同憂具眼之士出而收拾時局，以復興中國，以進而分擔復興東亞的責任。因此，日本軍隊，決不會向着我們和平反共的地方及軍隊進攻

的。現在我在廣州與安藤最高指揮官會晤，關於怎樣實現和平，彼此互相披瀝誠意。其結果使我確信，如果廣東方面的軍隊，有和平反共的表示，安藤最高指揮官，必能以極友好的考慮實現以下幾件事，即是：不僅對於這種軍隊立刻停止攻擊，而且更進一步將日本軍隊已經佔據的地方，所有治安警備，以及行政經濟，都從日本軍隊手裏，次第交還中國。因此我今日敢公開約束：如果廣東方面的行政當局和軍隊，能贊成我的和平主張，則我必能得安藤最高指揮官的同意，先在廣東做起部分的停戰，而以及於全國，使全國和平得以完全恢復。尤其是對於廣州市民，我敢說在最短期間，必能以廣州市還之廣州市民之手，使廣州市成爲比較去年十月以前更有秩序，更有幸福的地方。

各位同胞，聽到了我這篇廣播之後，可以知道我所謂和平可以實現，而且和平的條件，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不是一種空想，而是早晚可以證明的事實。各位同胞，你們不是淪陷了的地方的民衆啊！你們從前曾經盡了前方後方的責任，忍受了許多的痛苦，許多的犧牲，及至蔣介石將你們丟了之後，還要加你們以種種惡名，恨你們死不盡，燒不光，加你們以種種惡名，好將你們繼續的燒，繼續的送往死路。蔣介石不是以日本爲敵，是以中華民國爲敵，是以中華民國的民

衆爲敵！蔣介石在今日已爲和平之唯一阻礙者，你們只有將這阻礙除去，你們必然能洗卻了種種惡名，而重新做中國復興之柱石，進而做東亞復興之柱石。

各位同胞：我知道我廣播了這一篇談話之後，蔣介石必然又逼迫各前方後方的行政當局，以及帶着軍隊的人發出聯名通電來攻擊我，但我知道這是無效的。只要和平的條件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而且可以爲復興之基礎，我相信沒有一個人能阻礙和平之實現！

（二十八年八月九日）



## 答 問（一）

本月九日我在廣州發表了一篇演說之後，接到了許多來信，其中有一個疑問是：『先生所說，似乎只注重停戰，未注重撤兵，是否撤兵難於實現？如果撤兵難於實現，則和平也難於實現了』。我記得我對於這一個疑問，曾經解答過，但既承來信殷殷問及，我願意再簡要的解答幾句。

大凡兩國交兵，其回復和平的程序，第一步是停戰，第二步是和平談判，第三步是撤兵。撤兵是和平的最後結果，不是和平的先決條件。有些在講和條約裏訂明，須某種條件履行完了，然後撤兵的；有些因為某種條件無意履行，而重新進兵的。以撤兵為和平的先決條件，只有陳嘉庚先生纔會作此想像。他曾對國民參政會第二次會議用電報提議：『在日本軍隊未完全退出中國境內以前不得談和平』。試問如果日本軍隊完全退出中國境內，則和平已經實現了，還用得著談嗎？不辦到撤兵，和平不能說得到結果，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道的；但是今日的問題是：如何纔能辦到撤兵？這等於說，如何纔能實現和平？如果說非撤兵不

得談和平，這等於說非和平不得談和平。這種說法，在文字上是不通，在事實上是不會有。這種說法的用意，不過想以之抵制和平，阻止和平之進行，眞所謂不值一駁的。我們還是注重事實以謀和平之實現罷。

如果注重事實以謀和平之實現，則第一步仍然是做到停戰，須知道兩國交戰的時候，往往不免一方是勝，一方是敗，因之停戰條件往往不免苛酷。其最著的，如歐戰時候，協商國對於德國的停戰條件，簡直是繳械。如今所說：『只要中國軍隊有和平反共的表示，則停戰即可做到』，這在日本是不以戰勝者自居，這一點應該提出以喚起國人注意的。至於所說：『更進一步，將日本軍隊已經佔據的地方，所有治安警備以及行政經濟，都從日本軍隊手裏次第交還中國』，這在日本是想以事實證明他所謂對於中國沒有領土野心以及尊重中國主權等等，不是空話，這一點尤其應該提出以喚起國人注意的。

我們平心靜氣來想一想，如果行政當局以及帶兵的人表示反共和平，則在其所轄地方，倒霉的只有共產黨，因爲他再不能假藉游擊名義來魚肉百姓了。除此之外，都是得到和平益處的，至少至少，不至於使地方爲淪陷之續；至於已經淪陷的地方，如果治安警備以及行政經濟都次第交還，也就得到了和平的基礎。自

然，和平的最後結果是撤兵，但是做到這第一步，便可循序而進的做到第二步，以至第三步。

如果蔣介石也贊成和平反共，那麼，全國以內，沒有交戰形勢存在，由全國停戰，而全國和平談判，而全國撤兵，自然容易得多。可是蔣介石既然無望，則先由部分做起，以次及於全國，實爲今日救國的唯一方法。

（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



## 答 問 (二)

本月九日，余發表『怎樣實現和平』之後，接到了許多來信，曾經對於其中一個疑問，予以解答，現在再解答另一個疑問。

這疑問的大意是說：『兩國由戰而和本是常事，但當初爲什麼戰？如今爲什麼和？這其間是否有一貫的理論，而不致使人陷於思想上的矛盾？』

我的解答是：當初以爲日本是要滅亡中國的，所以不得已而出於戰；如今知道日本不是要滅亡中國，而是要與中國在一個共同目的之下共存共榮的，所以要謀和平之實現。

當初以爲日本要滅亡中國，所以不得已而出於戰，最高目的自然想救中國於滅亡，最低限度不能救國，亦可殉國。如果當初的抗戰是由於這種純粹的不得已的動機，那麼，在今日必然以當初一樣的誠心誠意來謀和平之實現；因爲只要能使中國不致於滅亡，則最高目的已達，當初的戰，今日的和，完全是一貫的，沒有一些矛盾。

反之，當初的抗戰不是由於這種純粹的不得已的動機，或是由於個人的利害，或是由於第三國際的命令；那麼，個人的利害問題未得解決以前，第三國際的命令未有更改以前，自然只好不顧一切的主張抗戰到底。這也是一貫的，並沒有矛盾的，所差的不是爲中國着想，是爲自己個人或第三國際著想。

來信會舉出我在二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所演講的『最後關頭』來做個例。這個例好極了，全篇文字是因爲眼見得日本要滅亡中國了，既然不得已而出於戰，因戰之故，雖人與地皆成灰燼，亦所不辭。全篇文字其意義是如此的，所以對於不戰而使人與地皆成灰燼，安能不深惡痛絕。二十七年一月十二日所演講的『如何使用民力』，一月二十三日所演講的『抗戰期間我們所要注意的三要點』，十一月十二日所演講的『如何培養我們的勇氣』，十一月二十三日所演講的『爲什麼誤解焦土抗戰』，十一月二十四日所演講的『全面戰爭』，及同日所演講的『犧牲的代價』，皆一一可以覆按，並沒有一些矛盾。

至於豔電發表，是因爲日本已經提出和平條件了，已經可以證明日本不是要滅亡中國，而是要與中國在一個共同目的之下共存共榮了；那麼當初不得已而出於戰的動機已經消失，棄戰言和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我在覆華僑某君書內說

：『我們應該拿出抗戰的決心勇氣來講和』，就是這個理由。

在抗戰期間，我們同志，與其他的人不同的地方，是因為我們在抗戰開始以前，總是想盡方法來避免這場戰爭；及至不得已而出於戰，則又想盡方法不使和平的門終於關閉。我們不問方式，只問條件。只要條件無害於中國之獨立生存，則隨時準備討論，準備接受。這是我們同志與其他的人不同的地方。這種決心由於不忍中國之滅亡而來的。我們的思想始終一貫，並沒有有一些矛盾。

（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 對沈次高先生殉難在滬談話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八時半沈次高先生在港遇刺殉難，某君得訊，特向汪精衛先生致唁，談話紀錄如左：

某君致唁後，汪先生答稱：次高爲余外甥，余幼時受業於姊丈沈孝芬先生之門，其後次高復受業於余。其受知於總理孫先生，在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之役。當時余奉命赴天津，回至上海，有電至廣州，由次高轉呈孫先生，電至時，變已作。次高在城內，奔走於軍隊雜沓之中，爲哨兵刀傷其背數處，幾瀕於死，然卒能力疾赴永豐艦上，完其使命。孫先生極嘉其勇，撫其背，視其創，並口授密令，傳達於余。自是以來，屢任要職，果敢勇決，二十年中，始終如一。去歲十一月，次高在港寄書於余，謂吾舅在渝，若不能制止共產黨及其工具之繼續斷送國家民族，則不如舍去，別圖補救。其言切直，對於余之隱忍，深致不滿。及余發表豔電後，次高即隨余致力於和平運動，所志未就，遽以身殉！其遇難情形，同於柏生；死事之慘，同於仲鳴。救國殉國，爲吾人之素志，生死毀譽，久置度外。吾人惟有以未死之身，盡可能之努力，以繼死者之志而已。

某君復問對於最近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感想如何，汪先生答稱：國家間之結合，常因利害關係而生變化，德蘇之有此舉動，其可能性久已有人論及。只有陣線論者始逞其臆說，甚至主張中國應對於德義實行絕交，始可得蘇聯之援助。今日彼等所認爲反侵略陣線之主角，與所認爲侵略陣線之主角，忽有此結合，在彼等至少應愕然知所反省。乃不出此，猶造爲從此蘇聯得併力遠東，有利於吾國抗戰之說！彼等曾否觀察德蘇爲此結合，其動機如何？各國對此變化，其感覺如何？其對策如何？其影響所及如何？此等輕率論斷，出於言論界之口，已爲不慎，乃以政府之地位，亦靦顏言此！推彼個人獨裁之意，無非欲以此欺騙羣衆，但羣衆已非可以欺騙者，行見其益爲羣衆所唾棄而已。

（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 致海內外諸同志東電

海內外諸同志公鑒：讀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暨各種重要決議案，知數月以來，諸同志呼號奔走，函電交馳，鄭重之建議，熱烈之主張，均已獲豫期之效果，至深欣慰！對於中國前途應取之方針，及本黨應負之使命，有此明白之指示，吾人奮鬥得所正鵠，尤用感奮。兆銘無狀，忝受付託，惟當與諸同志一致努力，期使宣言暨各種重要決議案一字一句見之實施，謹掬至誠，貢其所見，以自策勵，並以相期勗，惟垂察焉。當本屆大會開會之際，正國際關係劇變之時。抗戰以來，人民陣線論者附和共產黨人，作爲種種臆說，本黨真實同志久已深斥其非。茲者德蘇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彼輩向來所持侵略反侵略兩大陣線對立之說，至此當亦啞然失措。乃猶不知反省，更造爲反共勢力已趨於妥協之說。須知既可以與共產勢力妥協責德，又何不可以與反共產勢力妥協責蘇？其爲支離，不值斥駁。尤有進者，國內反共與國際防共絕非同物。況吾人既欲建設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則共產思想尤在所必摒。本黨在十四五年間，雖會一度容共，然自十六年

分共以後，鑑於共禍之烈，將底於國亡種滅，不惜舉全國之兵力財力從事剿共，除極少數人因西安事變別有用心之外，無不以根絕赤禍爲職志。蓋社會合作爲和平之本，階級鬥爭則擾亂之源，兩者水火不能相容。由是以言，國際關係雖有劇變之時，而本黨之主義政策自有其一定不變者以應之。綜括宣言所示，非根絕赤禍，無以維持國內之和平；非與日本協力，無以維持東亞之和平；非與各國增進友誼，無以維持世界之和平。吾人目標既定，循此進行，以底於成，有斷然者。中國戰前，民力國力皆未充實，戰後疲敝，民不聊生，國靡所託。吾人所以於戰爭之中求和平，即欲於和平之中求完成三民主義之建設。『建國之首要在民生』，總理所諄諄爲吾人告者，在今日尤爲當務之急。民生疾苦如何解除，民生幸福如何增進，吾人惟有悉力以赴，庶幾和平可得代價，此則又當鄭重爲諸同志告者也。重慶方面，大多數之同志爲獨裁勢力及共產勢力所挾持，言論行動不能自由，對於本屆大會宣言暨各種重要決議案雖衷心接受，而倉猝之際尙不能形之事實，此中隱痛，兆銘知之最深，念之最切。惟有一比較簡易可行之方法，如前方之武裝同志能揭示和平反共建國之主張，則既可保其原有之兵力與未失之土地，又可外與吾人之和平運動相呼應，內以促獨裁勢力與共產勢力之沒落，爲效之捷

，莫踰於此。頗聞有人對於中日合作之前途，以有無誠意爲慮，須知誠意由於兩方努力而見，且由於兩方不斷之努力而有所增益，決非可以觀望得之者。兆銘六月間會赴東京，與日本當局交換意見。平沼首相爲兆銘言：凡爾賽條約爲勝敗之成見及功利思想所充塞，其結果釀成今日歐洲擾攘之局，并所手創之國際聯盟亦不能保；日本此次對於和平條件，則以道義觀念代功利思想，對於中國不惟無勝敗之成見，且具有同憂患共安樂之誠意；必如是，東亞永久之和平始能鞏固其基礎云云。其言至誠懇而真摯。自近衛聲明以來，內閣雖屢有更迭，而已定之國策不因之而變易，此實有其必然性。凡留心東亞局勢者不可不深求其故，得真實之認識，而繼之以勇猛精進之實行，以期成此至艱至鉅之事業。兆銘對於過去之事變，未能及早挽回；對於當前之難局，未能及早收拾；撫躬自問，午夜徬徨，惟責任所在，義無可辭。誓當竭其心力，以民主集權之精神團結黨內，以實行憲政之約束與全國各黨各派無黨無派有志之士攜手合作，以救國家，以救民族。生不負本屆大會之所託，不辜諸同志之所望，死有以對總理及諸先烈。臨電感奮，不盡欲言，汪兆銘，東。

(二十八年九月一日)



## 歐戰與中國之前途

數年以來，歐洲各國，準備戰爭，與避免戰爭，兩個錘子，總是動搖不定。到了最近，戰爭終於不能避免而爆發起來了。中國人民正受著戰禍，對於同受戰禍的歐洲各國人民，只有抱著十二分同情，而望其戰禍之早熄。

決定這回戰爭的最近最直接的原因，自然是德蘇協定。論起德蘇協定，在德國呢，對於反共軸心，不免背棄信義之嫌；但數月以來，英法蘇軍事同盟，大吹大擂，使德國觸目驚心，要打破包圍形勢，免得再蹈上次大戰的覆轍，所以出於這樣挺而走險的行爲，也還有些可以自解。在蘇聯呢，對於民主集團，也不免背棄信義之嫌；好在民主集團不過是這麼一個名詞，蘇聯其實也不是什麼民主。只是蘇聯這一次，如果事前不大吹大擂，在莫斯科開什麼英法蘇軍事同盟會議，則德國也不至走這險著；如果英法蘇軍事同盟會議開不成功，只要不締結什麼德蘇協定，德國也不至於走這險著。如此則歐戰仍然不致於爆發。蘇聯爲什麼如此做法，分明是要使歐戰爆發，這是毫無疑義的。歐戰爆發之後，依據上次大戰經驗

，戰敗的國家固然吃虧，戰勝的國家也沒便宜，惟有最後出來的國家纔操有決定一切命運之權，這是誰也羨慕的事。

只是這次與上次大戰不同。上次大戰，最後出來的，只有一個美國；而今呢，除了蘇聯之外，還有美國，還有日本，此其一。何況義大利是一個反共的國家，如果蘇聯最後出來決定歐洲命運，義大利何能坐視？此其二。英法這次被賣，已很够受了，難道眼睜睜的上當？此其三。德國也是一個反共的國家，走這險著，只是萬不得已，難道不知爲備？此其四。有此四者，則前途變化如何，此時尙難逆料。

各國都是爲自己打算。蘇聯之所以出此，自然也是爲自己打算，是非曲直，我不欲加以批評。我所注意的是各國如何對付共產黨。

共產黨人是不知有自己國家，不肯爲自己國家打算的。如今英法對德作戰，英法國內的共產黨人怎樣，德國內的共產黨人怎樣，英法德總不能不關心罷。拿我個人的經驗來說，自從抗戰以來，最使我痛苦的一件事，是有共產黨人夾雜在裏頭。他們的抗戰是爲第三國際而抗戰，不是爲中國而抗戰，他們只知有第三國際，不知有中國，只知爲第三國際打算，不知爲中國打算，一切言論，一切行事

，都是由此出發的。因此之故，我和他們無論怎樣不能在一塊。我之離開重慶，十之八九是爲有共產黨人夾雜在裏頭，弄得抗戰的空氣變了質了。這樣抗戰下去，敗則中國實受其禍，成則受其福者不是中國。這樣越抗戰下去，中國亡得越快。這是我離開重慶的原因。我願意英法德諸國人民知道這滋味不是好嚐的！自從歐戰消息到來之後，一般人未嘗不想著，日本大可趁英法在西方打仗的時候，毫不費力的將英法在東方的殖民地拿了過來。然而日本却對歐戰宣告中立，這是什麼緣故呢？日本知道如此做法，英法必然狼狽，其結果促成德的勝利，也就是促成蘇的勝利，不難一轉瞬間使整個歐洲成爲赤化。所以日本甯可宣告中立，不使英法東西不遑兼顧。日本看到這一層。英法定然也看到這一層，德也未嘗不看到這一層。所以這一場戰，或者會把英法與日本聯合起來；義本來反對共產的，也可聯合起來；美素來反對共產的，即不聯合起來，也必然不會加以反對。其結果德則廢然知返，蘇則落一場空，前途變化如何，縱未可知，但有這可能的。

所以中國在此時候，唯一方法，是與日本從速恢復和平。這在日本有其必要，而在中國尤有其必要。因爲日本在此時候，自然想得些從容的時間，保持著而且擴充著優越的國力，來應付世界無窮之變；而中國在此時候，也只有早一日結

東戰爭，早一日得從事於恢復，以完成建國的工作，纔不致在世界漩渦中被捲了進去。這是極平常而又極明顯的道理。有人以為中國在此時候，應該對日本抗戰到底，方纔可以得到最後勝利。這種說法，在從前是根據著一種茫昧的揣測，來下鹵莽的判斷，以為英法美蘇在一起，日德義在一起，前者是民主集團，反侵略陣線，後者是法西斯集團，侵略陣線，交戰起來，前者必勝，後者必敗，中國站在前者一方面，所以最後勝利必然可得。可是這種說法在今日已不值一駁了。集團已不成其為集團，陣線亦已不成其為陣線了。誰勝誰敗，縱未可知；而勝敗的結果其及於中國之影響，必然不是那麼簡單了。然則抗戰到底，最後勝利，其論據安在？如果說只是中國和日本抗戰到底，日本也必不得了，須知道，日本也許不得了，而中國必然更不得了。這又有什麼好處呢？我向來說，如果和平有了希望，如果和平的條件無害於中國之獨立自由，則和平早一日是一日。如今我還是這樣說，而且更堅決更肯定的這樣說，中國在此時候，只有和平，纔是出路。

(二十八年九月五日)

# 在上海招待外國記者談話

## 一 對日本記者談話

問 先生所領導之國民黨，今後對於國民黨員之留在重慶方面者之關係如何？尤其中央委員以及其他許多重要黨員尙留在重慶方面者，爲數頗多，其關係將若何？

答 以余所知，本黨同志在重慶方面者，大多數贊同余之和平主張。惟受蔣介石獨裁勢力之挾持，雖有意見，不能發表，行動尤不能自由。汽車路飛機場，皆有嚴密之檢查，非蔣允可，不能出行。故在表面上，惟有脅從現象。但此現象，依於和平運動之進展，可得解放。

問 對重慶政權之前途，尊見如何？又重慶政權國共合作之前途何如？

答 重慶政權日趨於國共合作。惟國共合作極不自然，且共產黨到達某程度時，必仍與國民黨分裂。今日吾人努力，即在援助此等不甘與共產黨合作之同志

，使之得有機會，打擊共產黨之勢力；並使重慶政權與共產黨分離，回復其本來面目，則和平阻礙可以掃除。

問 對於最近之國際情勢，尤其對於歐洲之危機，願聞感想。又對於與此有關之中國出路問題，尊見如何？

答 對此問題，中國國民黨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已經解答。要之，中國出路，在與日本誠意合作，鞏固東亞之和平。對於歐洲之危機，以同一步驟應付之。蓋吾人期望，在世界和平。吾人努力於增進各國之友誼，保障其在中國之合法權益；然對於各國關係之離合變遷，不願牽入。

問 先生對日本國民之期望，及對日本新聞記者之期望如何？

答 自近衛聲明以來，日本國民的表示，與國策完全一致，尤其輿論界之主張，如各大雜誌各大新聞，對於國策盡量發揮，鄙人實深敬佩。於此有披誠相告者：中國人民，並非不願和平，尤其並非不願與日本誠意合作。惟中國人民自知爲弱國之民，且現處軍事失敗地位，所顧慮者，在近衛聲明之能否完全實現；換言之，即中國之獨立自由，能否因和平而完全恢復。此種顧慮，如承日本人民之諒解，時時以事實祛其疑念，促其決心，則兩國之親密合作，

必可臻於圓滿。

問 三民主義之修改，日本國民最爲關心，其修改要點若何？

答 三民主義，尤其民生主義，爲共產黨人所曲解，實有說明之必要。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代表大會宣言，曾於此點詳加解釋，使知民生主義與馬克思之共產主義，絕對相反。蓋民生主義以社會合作爲骨幹，馬克思之共產主義以階級鬥爭爲骨幹，一爲和平，一爲擾亂，不能相容也。

問 先生示意，今後樹立統一政權，將羅致國民黨外之各黨各派，日本國民對此甚爲關心，未悉將以何種形式實現之？

答 中國國民黨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於此點亦已鄭重說明。連同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有志之士，協力一致，以担負收拾時局之責任，實爲本黨之最明確主張也。

問 先生最近康健否？日常有何保健方法？

答 謝謝。鄙人患有肝臟病，故起居飲食，不得不加意慎重，並輔以藥物，以保持健康，庶幾不致因病而誤事也。

問 返抵廣東時之印象如何？

答 返抵廣東時之印象，於八月九日廣播中已經披瀝。惟盼廣東人民，從此認識和平運動之真相，相與協力。以促其實現。

問 經過南京中山陵時之感懷如何？

答 經過南京中山陵時，見陵墓無恙，對於日本駐軍之好意，深致感謝。而念及孫先生之遺教，尙未能一一實行，孫先生所手創之中華民國，瀕於覆亡，孫先生所提倡之中日友好及大亞洲主義，尙有前途遼遠之感，實不禁做悵悲痛之至，因此而更增進和平運動之決心也。

## 二 對歐美記者演詞

諸位先生：今日光臨，至爲愉快。

鄙人於去年十二月間，鑑於重慶中央黨部國民政府爲共產黨所規持，對於時局，明知和平機會已經到來，仍不肯依據去年四月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所示方針，謀抗戰之結束，和平之實現，鄙人再三爭執無效，仰體民意，及順從多數同志之請求，離開重慶，俾鄙人之主張，得以公開發表，自是以後，鄙人暫居河內，並赴東京。回國以後，周歷淪陷各地，北平南京廣州皆會到過。其

所以赴東京者，在探明近衛聲明及鄙人豔電之主張能否實現。其所以到淪陷各地者，在謀重慶方面民衆及同志之意見與淪陷各地民衆及同志之意見之合一。其工作之第一步，在如何恢復中國國民黨之本來面目，及自由獨立之行動，第二步，在如何收拾時局，化戰爭爲和平，使中國終於得救也。今者中國國民黨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已經開會，以一致之議決，發表宣言及各種決議案，鄙人之第一步工作已經成功，故藉此機會與各位先生相見。

在與各位先生相見以前，鄙人會接到各位先生詢問之件凡數十條，有可以綜括答覆者，有可以逐一答覆者，有未能即刻答覆者，今分別敘述如左。

各位先生詢問中有云：鄙人係已被開除之黨員，乃以何權力仍用黨之名義活動？此種詢問，極爲率直，鄙人願率直答覆：其一，中國國民黨最高機關，係全國代表大會，如有違犯大會者，即爲違法。鄙人之和平建議，係依據大會宣言，而當時重慶中央黨部國民政府不依據大會宣言，則違法之責在重慶中央黨部國民政府，不在鄙人也。其二，中國國民黨係革命黨，平時辦事，固當沿用普通手續，如果有特別大故，則不得已而用特別手段，縱有些不合手續，亦爲革命黨精神所容許。以前如此之例甚多：十六年間，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在武漢，蔣介石在南

京，以武漢爲共產黨所劫持，宣布脫離，另行組織，從事清黨。當時武漢中央黨部予蔣介石以開除黨籍之處分，國民政府明令通緝，然其後武漢中央黨部國民政府發覺共產黨之陰謀，遂繼續清黨，而與南京合作。十八年間，鄙人以蔣介石在南京個人獨裁，激起內亂，動搖國本，倡言反對。當時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對於鄙人，予以開除黨籍及通緝之處分，鄙人先後在北平組織擴大會議，在廣州組織非常會議，與之對抗。及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事起，蔣介石派人至廣州，謀與鄙人等合作，遂由上海會議解決糾紛，復歸統一，而鄙人遂入南京長行政院。以上兩例最爲顯著。最近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各種議決案，對於此點已加以明白之闡述矣。

如今一述鄙人前赴東京之經過：去歲四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閉會之後，蔣介石會命外交部亞洲司長高宗武辭去本職，另畀以重要之任務，使駐香港，與日本接洽和議。外間所傳高宗武個人自由行動，絕非事實也。高宗武接洽和議，屢有接近之機會，而蔣介石因其個人位置問題，屢生反覆，以致和議久久無成。鄙人之赴東京，並非另有線索，不過使高宗武所已接洽者不致中斷而已。而赴東京與日本當局接洽之結果，使鄙人確信近衛聲明及鄙人建議可以實現。

如今再一述鄙人周歷淪陷各地之經過：當鄙人前赴各該地時，外間謠傳以爲鄙人將在各該地組織政權。及鄙人離去各該地時，則又以爲鄙人失敗而去。此非重慶之惡意宣傳，卽誤會耳。其實鄙人所抱之目的及所任之工作，係與各該地之同志及黨派不同而救國志趣相同之人士，開誠布公，共謀收拾時局之辦法，以期共負收拾時局之責任。並與駐在各該地之日軍當局爲誠意之協商，俾收拾時局之具體辦法，有實現之可能也。

現在工作之第一步，卽所謂恢復中國國民黨之本來面目及自由獨立之行動，已告成功。其第二步，卽所謂謀收拾時局之具體辦法的實現，亦將著手矣。然在目前，尙未到達組織中央政府之階段。故諸位先生有詢問中央政府成立以後之事項，如幣制關稅以及其他財政問題等等，恕未能奉答。

其可以奉答者：諸位先生關心撤兵問題。誠然，撤兵爲和平之結果。今者，重慶政府尙在高唱抗戰，撤兵固無從說起；然使重慶政府歸於消滅，則全國以內和平統一，撤兵必可做到。至於諸位先生所慮撤兵之後，中國方面有無軍力可以接收各地，此則鄙人可以奉答：其一，中國軍隊有奉行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爲和平反共建國之表示者，其兵力可以保存，卽有接收各地之能力。其二，各地

民衆苦於游擊隊之滋擾，已相與團結以武力自衛，此等民衆皆從根本上贊成和平反共建國之主張，用其武力即可保持地方之安寧秩序。

關於外交方針，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已經明白提示。中國當與日本協力以維持東亞之和平，當與各國增進友誼以維持世界之和平，各國在中國之合法權益必當尊重。此不但在外交方面看來是如此，在經濟合作方面看來亦如此也。諸位先生提及將來中央政府之承認問題，依鄙人意見，此問題無從發生。蓋將來之中央政府即現在之國民政府，不過從國民政府中除去共產黨人及爲共產黨劫持之人，而易以和平反共建國之分子。詳言之，人事更迭，政策變換而已，其國內法律上之地位與國際上之地位，依然如故也。抑鄙人尚有言者，即使各國之中，有倡爲不承認將來新中國政府之說者，鄙人亦認爲無關輕重。吾人於辛亥之役革去滿洲帝國之命，各國非至二年以後始承認中華民國乎？吾人又於十四年間建立國民政府於廣州，其後出師北伐，革去北洋軍閥之命，各國非至十七年以後始承認國民政府乎？此於吾人何傷者！反之，西班牙共和國政府固爲各國所承認者，及其相與亡命以法蘭西，則亦非承認所能挽而止之也。

要之，吾人目的在救中國於危亡，無損於各國；與日本協力共保東亞，亦無

損於各國；盼各國政府及賢達人士，相與明瞭吾人之目的而贊助之，則幸甚矣。

（二十八年九月七日）



## 致重慶諸同志篠電

重慶諸同志均鑒：以抗戰勝利之希望，寄託於國際援助，弟等久已痛言其非。歐戰既起，情勢愈顯。論者猶謂英法雖無暇東顧，蘇聯仍可恃；今則德蘇夾攻波蘭又見告矣。強國之風雲變幻，其不測既如彼；弱國之遠交近攻，其受禍又如此；瞻念前途，能不憬然！諸同志之意，或以爲和平本中國所願，惟日本所提和平條件，是否有誠意實行，不能無疑。弟等則以爲實行與否，視乎雙方之誠意與努力而已。誠使各自懷抱目的，一方以勝利而進不知止，一方以戰敗而苟且圖存，或隱忍以謀復仇，則和平之果未收，而戰爭之因復種，其無意義可以斷言。如彼此立共同之目的，以爲共同之努力，則共存共榮，不惟可能，抑且必要。東亞受經濟侵略主義之毒，於今百年矣；最近共產主義流毒，尤迅而且烈。中日兩國當此世界危疑震撼之時，宜深相結合，不以東亞納此漩渦之中，同時使經濟侵略主義及共產主義，絕跡於東亞之天地，自必事半功倍。且中日兩國若於此時結束戰事，開導和平，日本固可以舉足輕重之地位博取經濟上之繁榮，中國尤可因此

休養生息，謀工商業之發達，以恢復戰後疲敝，而完成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之建設。從此更可再進一步，本和平之素願，由東亞永久之和平，而蘄致世界之和平；此真中日兩國人民最大之事業，亦最重之責任也。要而言之，中日宜有共同之目的，以爲共同之努力，和平始可實現。盼諸同志認清前進路線，毅然改圖，悉力以赴之。救中國於垂亡，致東亞於長治久安，在此一舉。謹布腹心，惟共鑒之。汪兆銘篠

(二十八年九月十七日)

## 九月二十一日聲明

自蘆溝橋事變以來，國民政府因軍事失敗，先後放棄北平南京等處，政綱解組，民無所依。王叔魯梁衆異諸先生等挺身亂離之際，相繼組織政權，以與日本爲和平之周旋，使人民於流離顛沛之餘，得所喘息，苦心孤詣，世所共見。當時國民政府因主張繼續抗戰，對此舉措，自不免認爲牴觸。惟時至今日，和平運動，已爲刻不容緩之圖。最近中國國民黨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以『和平反共建國』昭示國人，並鄭重聲明，『本黨願以至誠聯合全國有志之士，不分派別，共同担負收拾時局之責任』。本黨爲完成此重大使命計，對於既成政權，消除成見，更謀羣策羣力，共濟艱難，實爲事理所當然。而既成政權，如王叔魯先生等，從前曾服官國民政府，投艱遺大，休戚相關，如梁衆異先生等，從前雖處於超然在野地位，然以段芝泉先生對於中華民國之勳勞，及對於國民政府之愛護，知必能繼其遺志，使國家民族得以轉危爲安。兆銘承大會授權『延請國內賢智之士，參加中央政治委員會』，旬日以來，迭與王梁諸先生披瀝誠意，對於收拾時局

九月二十一日聲明

九月二十一日聲明

九八

具體辦法，已得切實之了解與熱烈之贊同，深信從此必能相與致力於和平之實現，憲政之實施，此所引為欣慰者也。

汪兆銘（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 在南京接見中日記者談話

九月二十一日汪主席在南京接見中日記者，記者提出六項問題：

一、先生與王梁二先生會談之結果，有何感想？

二、此次中國國民黨六屆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曾宣布：延請國民黨外之各黨各派及同憂具眼之士，參加中央政治委員會，未審其實際情形如何？

三、先生所領導之和平運動，對中國民衆，尤其是重慶方面，已有重大之反應，先生對此觀察如何？

四、關於中央政府問題，尊見如何？

五、鑑於歐戰及重慶政府對歐戰之態度，中央政府似有早日成立之必要，尊見如何？

六、先生以中國國民黨主席之地位，對世界各國有何表示，可得而聞乎？

汪主席綜合答覆如下：

一、於戰爭之中獲得和平，於戰敗之後建設國家，爲空前之艱鉅事業，非得有全國各方面有力人士共同担負，不能完成，故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議決，以本黨爲中心，聯合各黨各派，組織中央政治委員會，共決大計。現在與在野各黨派，已有具體之接洽。本人特本於大會之授權，藉南北兩政府

負責諸先生聚首南京之便，交換意見，以爲中央政治委員會成立之準備。

二、本黨六全代表大會閉幕，現正竭全力於復黨，以繼續並擴大和平運動。和平運動之目的，在於全國之停戰復員，社會秩序之恢復與安定，使中國以獨立自由之國家，與日本分担東亞和平之責任。本黨方與各方面各黨派交換政見，俾能獲得全國一致之諒解，期於成立中政會。政府問題，有待於此會成立以後共決之。此時尙談不到。

三、歐洲之大戰，由俄德協定而促成，蘇俄不獨聯德以促成大戰，且更進一步，出兵以瓜分波蘭。吾人歷年來一貫主張，國際陣線毫無可恃，而遠交近攻政策尤爲弱國所不當取。此次歐洲之巨變，對於重慶之教訓，實至爲重大，尤足以促成和平運動之成功。然吾人之進行，本有一定之步驟，不因此而有所變更也。

四、本人關於其他問題之意見在九月一日通電及九月十七日通電暨其他論文已有發表，恕不複述。

## 中國與東亞

在中日戰事繼續進行中，日本輿論界有『東亞協同體』之揭示，日本政府，去歲十二月二十二日聲明，亦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爲言，雖其定義及其內容，尙未完全明確充實，然吾人從其論據可得二要點：其一爲排除侵略主義，其一爲排除共產主義也。侵略主義來自西方，以經濟侵略爲骨幹，以軍事侵略輔之。自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爲不平等條約所束縛，淪於『次殖民地』之地位，迄於今日已百年矣。共產主義，亦來自西方，其侵入中國雖不滿二十年，然其階級鬥爭之說，將使中國人類，相砍以盡。侵略主義，譬如多年痼疾，能使中國奄奄不振，以至於死。共產主義，譬如暴病，能使中國咄嗟致死。日本自維新以來，已以其國力遏抑侵略主義，使不得逞於國內，共產主義雖欲侵入，然社會組織，已臻健全，亦不能得間。惟中國若受侵略主義共產主義之禍，則東亞的一部分受其禍，從而東亞全體亦將受其禍，結局日本亦將不免。所謂『東亞協同體』，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實着眼於此，欲以自由獨立之精神，排除侵略主義

共產主義，使不得爲禍於東亞也。

然而中國輿論界，對於『東亞協同體』及『建設東亞新秩序』之二名詞，不但不感覺興趣，反有恐懼之意，甚至詛咒之惟恐不力，其故何耶？中國人不可不深自反省，同時亦不可不要求日本輿論界之注意。蓋中國人今日第一之大憂，在於日本要滅亡中國，侵略主義固可怖，共產主義固可怖，而日本欲滅亡中國尤可怖也。充其極，寧結合侵略主義共產主義之國家以反抗日本，明知爲飲鳩止渴，亦所不恤。蓋日本之排除共產主義，中國人雖知之，日本之排除侵略主義，中國人則未之知。中國人以爲日本亦一侵略主義者，其對於中國侵略最易亦最甚，不惟以暴易暴，且暴中之暴也。中國人持此見解，故對於『東亞協同體』對於『建設東亞新秩序』，直視爲滅亡中國之代名詞，其恐懼與詛咒，由於此也。

日本輿論界聞吾此言，必將愕然，以爲中國人太不注意日本輿論界之趨向。自中日戰事爆發以來，日本國民深念東亞前途，知中日兩國兵連禍結之結果，適足以助長侵略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焰，使東亞益陷於水深火熱之境遇，故毅然決策，更以『東亞協同體』，『建設東亞新秩序』爲號召，欲使中國人明白了解，相與同心協力，以改造東亞之天地，不圖中國人於此等趨向，忽焉不察，而若是之

誤會也。日本輿論界爲此責備，吾欲受之，然尚有欲爲日本輿論界一言者，古人有曰：『易地皆然』。日本今爲強國，日本人今爲強國之民，其欲進一步以改造東亞，誠當然之事，至於中國人今第憂其國亡之不暇，乃能憂及東亞乎？晉惠帝問侍臣曰：『何謂荒年？』侍臣曰：『無穀食也。』帝曰：『何不食肉糜？』中國人憂其國亡，猶之憂無穀食也，語以改造東亞，則肉糜而已。關於此點，願日本輿論界一念及之也。

日本在東亞爲先進國，改造東亞，日本有領導之權利及義務，此中國人所能知者。中國在東亞，爲地大人衆歷史悠久之國，改造東亞，中國有分擔責任之義務，此亦中國人所能知者。中國之所憂，乃在如何始能有分擔責任之能力，換言之，中國滅亡，固無分擔責任之可言，卽不滅亡，而主權牽制，獨立自由不能完全，其分擔責任之能力，亦必因而削弱。故中國之求生存，求獨立自由，爲中國計，亦爲東亞計也。關於此點，不能不望日本輿論界之深切了解。惟中國輿論界亦必須注意者，中國之生存及其獨立自由，必有待於侵略主義共產主義絕跡之後，始能完全無憾。中國欲達到此目的，當與日本協力，同時對於各國在中國之合法權益，固當尊重，對於各國之友誼固當維持，然對於侵略主義與共產主義則必

不當容其存在，尤不當有利用之意存於其間，必如是始能舉分擔責任之實而無愧也。要而言之，日本期望中國之分擔責任，則不可忘中國之獨立自由，爲不可侵，中國期待日本不妨害其獨立自由，則不可忘共同目的之不可忽視。如是各自努力，而有相互了解，改造東亞之大業，始可邁進，而底於成也。

中國國民黨總理 孫先生之大亞洲主義，暨最近中國國民黨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對於中國與東亞之關係，及中國人所當致力者，已有明確之指示，吾人以此自勉，以此相勉，並以此貢之於日本輿論界。

(二十八年十月一日載於日本中央公論第六百二十五號)

## 中華民國之新生命

在今年的國慶日，我有一句禱告是創造中華民國之新生命。爲什麼要創造中華民國之新生命呢？只看舊年這時候的現狀，便可以明白。

舊年國慶日前後，發生了以下三件事。第一件，舊年國慶日前幾天，正是日本軍隊準備向大亞灣登陸，中外報紙都已明白紀載了，而廣州軍政當局，却大張告示說日本決無此能力，無此胆量，來犯廣州，各界民衆萬勿輕信謠言，自相驚擾。及至聞得日本軍隊已經登陸，並且直向廣州進發了，軍政當局，立卽闔署遷移，臨行時候定下計策，將所有商店民居，放一把火燒個精光。

第二件，廣州失守了，軍事最高當局，已決定放棄武漢了，却偏要大發捷報，說在鄂贛之交，連戰連勝，殲滅日本軍隊在四個師團以上，日本遭此慘敗，不但武漢安如磐石，卽九江等處，亦可相繼克復。不但統制下的各報紙一律要這樣說，連軍事最高當局覆謝國民政府主席的獎勵電文內也這樣說。不多幾日，武漢放棄了，最傷心慘目的，重慶街市上，商店民居祝捷的大紅條子還簇新的貼在門

上，祝捷的爆竹紅衣還簇新的撒在地上。

第三件，武漢放棄了，當時軍事最高當局，聽從了俄國顧問的計劃，要將武漢燒燬精光，因奉行的人，於心不忍，沒有澈底做去，因此長沙便於日本軍隊還在數百公里以外的時候，已經放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了。這不但是一場空前的慘劇，並且是一場天大的笑話。

由今年今日，想起舊年今日，只是清清楚楚的三件事，已經足夠我們難過了。我們必須知道，這三件事不只表現出中國國力不能對外，尤其表現出中國內部的腐敗黑暗，不能立國。因為內部這樣腐敗黑暗，所以不但不能充實國力，並且還要浪費國力，尤其對於國力的泉源加以堵塞，至於枯竭。甚麼叫做國力的泉源呢？便是人民的意力。試以上述三件事為例：軍事最高當局，有把人民的生命財產，一點放在眼裏沒有？有把人民的自由，一點放在眼裏沒有？人民的生命財產，如此浪費，固然可痛，而人民的自由，真可說是細了手足，蒙了耳目。前方砲火連天，肝腦塗地，山川陸沉，生民邱墟；後方却要祝捷，貼大紅條子，放大紅爆仗！這和父母停尸在牀，却叫他的兒子演戲祝壽，有甚分別？這真是忍心害理，到了極點。

有人說道：『這是在抗戰的大前提之下，不得不然。』是的嗎？請看看英法等國，抗戰時的情形，是怎樣的？英國國會裏頭，路易喬治依然可以提出和平主張，其他議員，向來反戰的，依然可以提出反戰的意見。我呢，在重慶不能哼一聲，離開重慶纔能哼得一聲，立刻便要殺以滅口了。王寵惠呢，纔哼得半聲，立刻便要他改過口來，至於再，至於三，否則也要殺以滅口的。殺沒有什麼可怕，可怕的是哼不出聲來。一個副總裁，一個外交部長，尚且如此，其他可想。希特勒的演說，英法兩國人民，都清清楚楚的在廣播裏聽見，並且清清楚楚的登載全文在報紙上，讓人們自己去體認，去批評。近衛聲明呢，則至今重慶方面還沒有使人民看見。最近有前方出來的人對我說：『近衛聲明，我們在前方始終沒有看過；所看到的，只是蔣委員長的駁斥。至於你豔電以來的文字，我到了上海，方纔看見，原來如此。』各位思想：個人獨裁，即使其個人極開明，極能幹，已經不免有流弊；何況其個人如此腐敗，如此黑暗，而偏要如此獨裁，勢必至於個人的腐敗，擴而充之，為全國的腐敗；以個人的黑暗，擴而充之，為全國的黑暗，國安得不亡？種安得不滅？這樣腐敗黑暗，還能讓他苟延殘喘嗎？還能不能急起來，替中華民國創造出一條新生命嗎？

中華民國之新生命，內容是怎樣的呢？最近六全大會宣言裏頭，已經明白指出：『實現和平，實施憲政。』實現和平，對外而言；實施憲政，對內而言。實現和平，所以救國家於危亡；實施憲政，所以解人民之束縛。人民之束縛，如不能解，則國家之危亡，終不可救。換句話說，打倒個人獨裁，掃除政治上軍事上之一切腐敗黑暗，是今日最要之一著，亦是最根本之一著。全國同胞啊！快些起來，將今日以前一切舊污，洗刷乾淨；今日以後，重新創造出中華民國之新生命！

## 所望於產業界諸君

產業界諸君！這產業界三字，包括凡是致力於經濟建設的人，無論投資本的，用技術的，出勞力的，都在內。

自從戰事開始以來，數十年來日積月累的經濟建設，都成灰燼。諸君爲經濟建設所絞出來的一點一滴的血，一點一滴的汗，都成泡影。這不止是諸君的損失，是中國整個國家民族的損失。

如今的和平運動，最大目的，最大作用，是求怎樣復興產業，致中國於安定與繁榮；是怎樣根據平等互惠的原則，來謀中日的經濟提攜。

我過去承乏行政，正值國難日深，軍事方殷，生平懷抱的民主主義沒有半毫實現，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更是徒縈夢想，這是我所十分疚心的。但至今日，我還能和諸君說幾句話，就是因爲我在過去幾年，對於經濟建設沒有積下什麼罪惡，多多少少也曾出過些心血和熱汗；所以我覺得有和諸君談幾句話的必要，我就直說出來。

我今天說的話，還未能將復興產業的具體計劃以及中日根據平等互惠的原則所定出來的經濟提攜的具體條件，一一列舉我來。我只能表示我的決心和我所認為必要的前提。我在今年九月七日起，分幾次接見中外新聞記者，有一位日本新聞記者問我道：『你對於和平運動的決心在何時開始的？』我答道：『在近衛聲明以後』。因為近衛聲明在日本方面，有人解釋為日本自始即不是侵略主義的，有人解釋為日本經過反省之後，已放棄侵略主義。無論怎樣解釋，近衛聲明總可以說放棄侵略主義。日本既然放棄侵略主義，我們就開始和平運動。

現在一般人，尤其是產業界中人，心中有一共同的疑問：『中日經濟合作，是不是藉合作之名以行獨佔之實呢？』這種疑問，中國人都應該有的，中國人都應該對於此疑問予以回答的。換句話說，如果回答道：『不錯的，合作其名，獨佔其實』，那麼，和平運動便全然失卻意義；如果回答道：『不，中日雙方由合作而得到的利益遠過於獨佔』，那麼，和平運動便是最有價值的運動，不但是救國的關鍵，而且是復興中國，復興東亞的關鍵。我的回答屬於後者。

爲什麼呢？因為獨佔與合作之不相容，猶之侵略與和平之不相容；想在經濟上謀獨佔，和想在軍事上謀征服完全沒有異致。征服的結果，一方面完全壓制，

一方面完全受壓制；而獨佔的結果，一方面完全掙取，一方面完全受掙取；和平兩字何從說起？日本所謂放棄侵略主義，其所表現的，是在軍事上不謀征服，在經濟上不謀獨佔，必須如此，纔有和平可言。固然日本所謂經濟合作，直到現在，僅僅有近衛聲明所指出的應以平等互惠之原則為根據，還未曾有具體條件和事實的證明；然至少可以說，日本方面已經有提倡經濟合作的理論，和尋求經濟合作的方法之表示了。那麼，中國產業界諸君對之應該怎樣呢？九一八以來，對於日本不願合作，這是事實。七七以來，在軍事狀態之下，更只有將子遺的資本存在租界裏，對於一切產業不能過問，也不願過問，這也是事實。然在今日，日本已有放棄侵略主義的表示，已有根據平等互惠之原則以謀經濟合作的表示；那麼，對於理論之提倡，以及方法之尋求，下一番切實工夫，期於具體條件得以成立，事實得以推進，依我想來，這是必要的。

或者以為從經濟上看來，日本對於中國，除了獨佔，別無他法，無論用何種名目，究竟實際上還是獨佔的；因此對於所謂經濟合作，絲毫不會發生興趣。這是不然的。上頭說過，日本如果想在經濟上謀獨佔，則只有在軍事上謀征服，那麼，其結果只有兩敗俱傷，有何利益可言？經濟事情是以利益為主眼的，獨佔得

不著利益，合作纔得着利益，所以只能用合作的方法。須知道，兩個國家如果能從經濟上覓得共同基礎，有無相通，短長相補，則兩國的國民幸福因合作而得到繁榮，兩國的國家關係因合作而得到親密，較之因圖謀獨佔之故，至於相爭相奪，同歸於盡，其利害相去，何止萬里！中日永久和平，惟有經濟合作始能奠定其基礎，這是可以斷言的。

我以為爲產業界諸君對此時局，不必悲觀，惟有鼓起勇氣，打疊起全副精神，根據着近衛聲明所指出的以平等互惠爲原則，來指導經濟合作的理論，尋求經濟合作的方法，使具體條件得以成立，並且有事實表現出來。那麼，中日永久和平的基礎，從此可以奠定。

（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 總理誕辰紀念日演講詞

各位同志：

總理手創了中華民國之後，歷十四年，未及看見建設成功，便已長逝。長逝之後，於今又歷十四年了，不惟建設沒有成功，眼見得山河破碎，國家民族的命運，也保不住。我們在此時間，來紀念總理誕辰，眞真是萬感交集。總理在世時候，每逢誕辰，總是若無其事的，最多晚飯時候，約幾個同志，添幾樣菜，喝幾杯酒；這幾個同志，也仰體總理的意思，連祝詞也沒有，只舉杯默祝。總理長壽，永遠的領導着我們，向革命成功的前途邁進，如此而已。這種景象，每到今日，如在眼前。我們此時也只有默祝總理在天之靈，永遠的領導着我們，在這萬般艱難萬重痛苦的局面中悉力奮鬥，把國家民族救了出來，向着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前途，邁步前進！

我們每年紀念總理誕辰，都有演詞，演詞之中，略明一義，因爲總理的遺教博大精深，只就其中引申一義，已經令人尋繹不盡，我們今日所要提出的，

是總理生平說老實話。各位同志，說老實話是復興國家民族的根柢，不說老實話，是亡國的根本。總理民族主義第五講裏說到中國天天都可以亡，特別說到最近可以亡中國的是日本，並且說到『日本或者因為時機未至，暫不動手，如果要動手，便天天可以亡中國。從日本動員之日起，開到中國攻擊之日止，最多不過十天。所以中國假若和日本絕交，日本在十天以內，便可以亡中國』。各位同志，如果總理在時，日本要亡中國，總理將怎麼樣呢？無疑的，總理必然領導我們悉力抗戰，做到四萬五千萬人同心殉國為止，這是毫無疑義的。如果還以為有疑義，這定不是總理的信徒。然則總理為什麼說這樣話呢？因為這是老實話，什麼『最後勝利必在我們』，什麼『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這些話必然受總理叱責的。可是如今這些話卻成爲天經地義，而總理的話早已撇在九霄雲外了。甚至有人公然的說『如今抗戰已經兩年有餘，中國並沒有亡』，這種話可說是連文理也不通。所謂制人死命，是可致人於死，不是已致人於死。總理明明說道，『從日本動員之日起，開到中國攻擊之日止，最多不過十天』。這是說，在十天以內，形勢上已可以制中國之死命，並不是說，在十天以內便已將中國整個的併吞了去。如何可以誤解？其實這不是誤解，只是曲解。為什麼曲

解呢？因爲不肯說老實話，而要說不老實話，於是『最後勝利必在我們』，『積小勝爲大勝，以空閒換時間』的話便成爲天經地義了。其結果，使一般人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糊裏糊塗的打起來，糊裏糊塗的打下去，國便這樣的亡了，不說老實話的害處是如此的。

如果日本要亡中國，則戰亦亡，不戰亦亡，與其不戰而亡，不如戰而亡，我們何必說不老實的話？只老實的約齊四萬五千萬人同心殉國便了，這有何遲疑。有何留戀。反之，如果日本不是要亡中國，或者是日本本來不是要亡中國，或者是日本起先縱有亡中國之意，後來看見中國人人都有殉國的決心與勇氣，知道中國縱然亡在一時，而不亡在萬世，不如回心轉意與中國言歸於好，無論是那一種動機，總之日本如果沒有亡中國之意，則中國應該隨時準備收拾戰爭，回復和平。這也是老實話。如果先前不說什麼『最後勝利必在我們』，不說什麼『積小勝爲大勝，以空閒換時間』，則先前主戰說老實話，如今主和也是老實話，大心士氣必然清明得多，決不至於像今日那樣的烏烟瘴氣。

『日本天天可以亡中國』，這是 總理所慄慄危懼的，不憚大聲疾呼，告訴同志，告訴同胞。 總理絕不曉得假裝門面，絕不怕人說他『長他人志氣，滅自

已威風』。因爲這是事實，要認識得清楚，要老實的說出來。如果你也不老實說，我也不老實說，那麼事實便隱蔽住了。隱蔽的結果，只有不知己不知彼，糊裏糊塗的打起來，糊裏糊塗的打下去。

總理對於日本要亡中國有挽救的方法沒有呢？有。總理看清楚了日本若真要亡中國，不但是中國之禍，也是日本之禍，日本不但不可存一個亡中國的念頭，並且要援助中國在世界上得到自由平等，這樣纔是中國之福，也是日本之福。這些老實話，總理向中國人說，也向日本人說。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神戶講演大亞洲主義，這是總理一生最後的講演；十二月三日到了天津，便一病不起，賚志以沒了！

我們在今日萬般艱難萬重痛苦的局面中，紀念總理誕辰；我們有一致的決心，如其和平運動無可著手，我們約齊了去殉國；如果和平運動有可著手，我們約齊了向着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邁步前進！

（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 三民主義之理論與實際

各位先生：

今天有這個機會和各位講述三民主義，心裏非常高興。

三民主義的內容很廣，如今只能簡括的先說大概，再就其中一二要點，加以闡明。

### 三民主義的特質

孫先生的三民主義，博採歐美許多學說；然而它的本質，却是以中國固有的根本思想爲根據的，和歐美種種學說，都不盡同。

列如民族主義，與歐美的國家主義不同。國家主義是狹隘的，排外的，民族主義則產生在中國固有的和平思想上，根本就沒有排外的意思。

民權主義與歐美天賦人權說不同，與歐美社會民主主義也不同。天賦人權說所主張的是個人自由，而民權主義所主張的，則是全體自由，不是個人自由。社會民主主義在經濟上着想，而民權主義則在政治上着想，質而言之，民權主義的

目的，就是全民政治。

民生主義也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同。孫先生在民生主義第一講會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卽是大同主義』。這是泛就一般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終極的目的而言，並不是說民生主義就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孫先生在這一句話之後，緊緊的接着說：『欲明白這個主義。斷非幾句定義的話，可以講得清楚的，必須把民生主義的演講從頭看到尾，才可以明白了解。』從第一講以下，便將民生主義與馬克思共產主義不同的要點，很明白很詳細的指出來。馬克思共產主義主張階級鬥爭，孫先生的民生主義則主張階級合作，一個用暴力的方法，一個用和平的方法，這一點，完全不同。馬克思共產主義絕對廢止私有財產，孫先生的民生主義則在計劃經濟之下，一面發達國家資本，一面保護私人資本，這一點，又完全不同。

由此看來，孫先生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自有它的特質。和歐美的國家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共產主義，全然不同。

爲什麼孫先生要提倡三民主義？

孫先生爲什麼要提倡三民主義呢？用意在那裏呢？

孫先生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這就是說，孫先生的三民主義是以救國爲目的，從救國的立場出發。歐美的殖民主義侵略中國，壓迫中國，使中國不能獨立生存，使中國不能自由平等，已經一百年了。三民主義就是要喚起全中國的人民，反抗歐美殖民主義的侵略，反抗歐美殖民主義的壓迫，爭取中國的獨立生存，爭取中國的自由平等。孫先生自從提倡革命以來，畢生精力，盡瘁於此。

民國十三年以後，孫先生看到歐美殖民主義之外，還有共產主義。爲患於世。所以著述民生主義，使共產主義不能流毒於中國，不能流毒於東亞。民生主義是在十三年間講演的，可惜還未完畢，孫先生便與世長辭了。

十三年間正是容共的時候，然而孫先生當日對蘇聯的看法，和對共產黨的看法是不同的。對蘇聯認爲是友邦，對共產主義則始終認爲是國家社會禍亂之源，所以在民生主義的講演裏，特別指出馬克思共產主義的錯誤，使一般青年，信奉民生主義，不要信奉共產主義。

容共的本意就是要共產黨拋棄它的組織，服從中國國民黨的領導，拋棄共產

主義，信奉三民主義。

十六年間，共產黨背信棄義，逆跡昭彰，中國國民黨決心清黨，把共產黨徒，清除了去，且進而痛剿之，這決心正是表現：中國國民黨始終守着三民主義，而與共產主義奮鬥。從此以後，反共精神，普遍全國，至今不渝。只有蔣介石，因為西安事變，於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與共產黨訂了密約，便背叛 孫先生遺教，違反全黨公意，私行容共，可是，直到如今，除了蔣介石之外，凡是中國國民黨的忠實同志，沒有一個人不是永遠堅守着三民主義而與共產主義奮鬥。

怎樣實行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的目的在救國，救國的第一個要着，在使中國從歐美經濟侵略，經濟壓迫底下解放出來，人們常常以為中國只是一個半殖民地，但是，孫先生很痛心的說，中國簡直是一個次殖民地，不只是半殖民地。殖民地不過受一個國家的侵略和壓迫，中國却受着許多國家的侵略和壓迫，孫先生提倡革命，就是要使中國從次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來，做到自由平等。

怎樣纔能夠從次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來，做到中國的自由平等呢？

孫先生定下了兩個方案，第一是要中國自己努力，第二是要與先進國的日本共同協力。

孫先生生時，中日關係，有過惡轉的時候，但孫先生對於中日關係的根本觀念，始終不變。孫先生也有批評日本的時候，可是，他的批評，總是期望日本與中國攜手爲友，不要與中國相對爲敵，這在民族主義講演裏看得出來，在他與民族主義有關的遺教裏也都可以看得出來。試舉兩例以爲說明。

孫先生遺教中有一部『中國存亡問題』，是民國六年著述的。那時候，協約國勸中國和他們一起，參加歐戰，孫先生堅決反對，發爲此文，就中重要的一段說：

『中國今日欲求友邦，不可求之於美日以外。日本與中國之關係，實爲存亡安危兩相關聯者。無日本卽無中國，無中國亦無日本。爲兩國謀百年之安，必不可於其間稍設芥蒂。次之則爲美國。美國之地雖與我隔，而以其地勢，當然不侵我而友我。況兩國皆民主國，義尤可以相扶。中國而無發展之望則已，苟有其機會，必當借資於美國與日本，無論人才資本材料，皆當求之於此兩友邦。而日本以同文同種之故，其能助我開發之力尤多。必使兩國

能相調和，中國始蒙其福，兩國亦賴其安，即世界之文化，亦將因以大昌。中國於日本，以種族論，爲弟兄之國，於美國，以政治論，又爲師弟之邦；故中國實有調和日美之地位，且有其義務者也。妄人乖忤之計，詎可信耶？夫中國與日本，以亞洲主義，開發太平洋以西之富源，而美國亦以其門羅主義，統合太平洋以東之勢力，各遂其生長，百歲無衝突之虞，而於將來，更可以此三國之協力，銷兵解仇，謀世界永久之和平，不特中國蒙其福也。中國若循此道以爲外交，庶乎外交上召亡之因，可悉絕去也。」

孫先生之重視中日關係，其深切著明且如此。尤其要注意的，民國六年孫先生發表此文，正是民國四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款之後，此時中國人民對於日本，怨恨至深。所以贊成參戰，無非想在協約國勝利以後，藉其力量牽制日本。孫先生則不但反對參戰，並且說：『無日本即無中國。』我們知道，孫先生對於二十一條款，自然也是反對的，但是他認定冤仇宜解不宜結，所以始終期望日本和中國，彼此要作朋友，不要作敵人。對於當時反對論者，悠悠之口，概不介意，其所關切的，是趁着歐戰的機會，中日兩國，確立友好的關係，彼此合作，那麼，日本沒有對於中國之顧慮，發展更快，中國得到日本之援助，發展也易，

並且更可以中日兩國之協力將歐美經濟壓迫的勢力，從東亞排除出去。這是民族主義的精髓，也是民生主義的精髓。

孫先生所顧慮的是，日本的處境既孤，中國的國勢又弱，所以盼望由中日的友好關係，擴而充之，做到日美關係的好轉，以確立中日美間友好的關係，而以中日合作爲其前提。

孫先生抱定了這個信念，由民國六年到民國十二年，六年之久，在這期間，有時到上海，在租界上過着亡命的生活，醞釀革命，有時到廣州，在一塊小小的根據地上，策動革命，只因環境所限，沒有完成革命的力量，卒未能發展他的抱負。

十二年間，俄國越飛來華，孫先生在上海和越飛發表聯合宣言，俄國方面聲明非欲求中國共產化，只是幫助中國完成國民革命。不久，孫先生回到廣東，十三年春間召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改組中國國民黨，這是聯俄容共之始。

十三年冬，孫先生北上，由廣州至上海，於赴天津途中，特意道經神戶。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時，孫先生在神戶高等女學校對神戶商業會議

所五團體演講『大亞洲主義』，同日在神戶東方飯店對神戶各團體歡迎會演講『日本應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其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說話：

『不過中國這次革命所處的時機，和日本從前維新的時機，便大不相同。當日本維新的時候，歐美勢力還沒有完全東來，在東亞又沒有別的障礙，日本整軍經武，刷新政治，都不受牽制，都是很自由，所以日本維新，便能夠完全成功。當我們中國十三年前革命的時候，歐美大勢力老早已侵入了東亞，中國四圍都是強國，四圍都是障礙，要做一件事，便要經過種種困難，就是經過了困難之後，還不能達到目的，所以革命十三年至今沒有成功。』

『日本現在是東亞最强的獨立國家，也是全世界列強之一。如果日本真是知道了中國是十幾國的殖民地，用一個獨立國家要來和殖民地親善，我看這是做不到的。……若是日本真和誠意來和中日親善，便先要幫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爭回主人地位，讓中國人得到自由身分，中國才可以同日本來親善。照我們的口頭禪，中國同日本是同種同文的國家，是兄弟之邦，就幾千年的歷史和地位講起來，中國是兄，日本是弟，現在講到要兄弟聚會，一家和睦，便要你們日本做弟的人，知道你們的兄已經做了十幾年的奴隸了

，向來很痛苦，現在還是很痛苦，這種痛苦的原動力，便是不平等條約，還要你們做弟的人替兄擔憂，助兄奮鬥，廢除不平等條約，脫離奴隸的地位，然後中國同日本，才可以再來做兄弟。」

這一段說話，透澈極了，中日是兄弟之邦，亞洲是我們的家庭，我們應該怎樣的互相幫助，互相合作，來復興我們的家庭啊。

於此，又有須注意的，這兩篇演講的上面所引『中國存亡問題』許多人定然看過，但許多人都一樣的沒有注意到他的時代。這兩篇演講，正是孫先生聯俄容共的時候發表的。既然聯俄，爲什麼又和日本講大亞洲主義呢？因爲孫先生始終抱定了一個信念，以中日合作爲前提。中國要從次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來，便要聯合友邦，共同奮鬥。蘇俄既然願意與中國爲友，中國自然樂得與蘇俄爲友，但是，如果中國和日本不能提攜合作，則聯俄終是徒然。反之，中日既然合作，中俄又合作，則日俄也可以合作而不受其牽制。雖然中日蘇俄，國體不同，不過，外交是外交，國體是國體，民生主義的中國與共產主義的俄國，在外交上可以聯合，一樣的，日本與蘇俄，在外交上也未始不可以聯合。

然則 孫先生爲什麼不先聯日再聯俄呢？

這一點 孫先生早已打算過了，聯俄之前，孫先生好幾次對日本表示，希望中日合作，可是，都沒有具體的結果，所以聯俄之後，他便趁北上的機會，道經日本，對日本朝野宣傳大亞洲主義。

還記得當日 孫先生取道日本北上，命我由上海直接赴天津，臨別時，孫先生對我說『這一次到日本，如果得到日本的諒解，中日俄聯合起來，我們東方便有辦法』。

由此可見 孫先生的根本信念，前後是一貫的。民國六年，他所重視的是中日合作，以中日合作為基礎而期望中日兩國都得到美國的友誼結合；民國十三年，他所重視的也是中日合作，以中日合作為基礎，然後聯俄才有用處，然後中日俄三國才能聯合起來，謀東亞問題之解決。

國際關係，千變萬化，因之外交應付，也隨之而變，六年之主張聯美，十三年之主張聯俄，在外交應付上，本無足異，然而無論怎樣，孫先生自始至終，抱定了一個信念，永遠不變的這個信念便是以中日合作為解決東亞問題之核心。

孫先生說：『中國與日本之關係，實為存亡安危兩相關聯者，』這一句話，有着極深遠的意義，不是泛泛說的。爲了兩國的存亡安危，中日合作，不但於中

國有利，並且於日本有利，於東亞有利，在合作的原則之下，中國和日本，外交方針一致，國防方針一致，彼此之間，既然不會再有衝突，更可以攜手共進，以應付瞬息萬變錯綜複雜的國際局勢，對於其他國家，要聯合那個，便兩個國家一起與之爲友，要對抗那個，便兩個國家一起與之爲敵，只有這樣纔可以奠定東亞之永久和平，只有這樣纔可以謀大亞洲主義之實現。

中國今日不但要和日本分担東亞的責任，並且要有力量來分担這個責任，如果中國還不能夠從次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來，如果中國還不能夠得到自由平等，中國便沒有力量來分担安定東亞建設東亞的責任。明治維新，日本發奮圖強，走在前頭，中國呢，直到現在，還在爭取民族獨立的苦鬥中，在中國，爲本身着想，爲分担東亞的責任着想，固然要努力做到國家之自由平等，在日本，爲本身着想，爲謀中國與之分担東亞的責任着想，也要以先進國的地位，幫助中國做到國家之自由平等。

中國要努力做到國家之自由平等，第一要打破百年來歐美殖民主義的壓迫，這就是民族主義；第二要有强有力的政治機構來改造政治成爲一個現代的國家，這就是民權主義；第三要有健全的經濟制度來發達民力，充實國力，以抵抗歐美

殖民主義的經濟侵略，這就是民生主義。分而言之，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合而言之，便是三民主義，其精神是合一的，不可分割的。

本着三民主義做去，中國固然得到自由平等，同時也有了力量與日本分擔安定東亞，建設東亞的責任，所以就中國來說，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就東亞來說，三民主義也就是大亞洲主義。

### 三民主義與和平運動

如今就三民主義與最近的和平運動，再說幾句話。

這幾年來，中日關係日趨惡化，因為關係惡化，所以中國抗日，又因為中國抗日，所以關係愈見惡化，這樣下去，循環不已，沒有止境的。

到了去年十二月廿二日日本近衛首相發表聲明，中日關係才有了了一個轉機。近衛聲明提出三個原則：一是善鄰友好，一是共同防共，一是經濟提攜。

就第一個原則來說，善隣友好正是大亞洲主義的理想，也就是三民主義的 근본精神。

就第二個原則來說，共同防共，固然不是對俄，然而是要防止第三國際的擾

亂陰謀，使共產主義不能流毒於中國，不能流毒於東亞，這是大亞洲主義的理想，也就是三民主義的根本精神。

就第三個原則來說，經濟提攜，並不一定是對付那一個國家，而是以中日兩國的協力，發展中日兩國的經濟力量，抵抗殖民主義的經濟壓迫，經濟侵略，這是大亞洲主義的理想，也就是三民主義的根本精神。

質而言之，目前中日和平運動的基本原則和三民主義的根本精神是一致的，吻合的。

以上就理論來說，至於實行呢，我感覺過去數年，中日關係惡化，在外交上國防上，彼此方針，背道而馳，我個人也只能枝枝節節盡了一些努力，無補大局。我深深盼望這次和平運動，中日兩國能夠從根本上做起，為中日關係劃一新時代，為東亞創一新局面，本於平等合作的精神，確立兩國一致的外交方針，國防方針，方針一致，則陸隣友好，可以做到，共同防共，可以做到，經濟提攜也易於着手了。

說到經濟提攜，有些人抱着悲觀的論調，我個人則以為中日兩國，真能誠意相處，平等相待，經濟提攜，定然有樂觀的前途的。就中國來說，今後經濟建設

以民生主義爲中心，民生主義的具體實行，以孫先生的實業計劃爲根據，而其最大目的，一是發達中國的民族資本，一是掃除買辦資本對於歐美之依賴。就中日關係來說，經濟提攜也正是要以日本的協力發達中國的民族資本，掃除買辦資本對於歐美之依賴，而同時使中日兩國在經濟上有平等合作自由發展的機會。也許中國方面，有人疑懼，在經濟提攜條件之下，中國的民族資本，不能發展，這是錯誤的；在日本方面，又或有人以爲中國民族的資本發達，於日本不利，這也是錯誤的。我們必須知道東亞在歐美資本勢力支配之下，要不是聯合兩國的經濟力量，決不能與之對抗的。然而中國的民族資本一日不發達，即中國一日沒有力量協助日本與之對抗；經濟提攜，更無從說起。明白了這一層，便可以知道，本於民生主義施行實業計劃，一方面發達民族資本，一方面掃除買辦資本對歐美之依賴，並以謀中日之經濟提攜，是於中國有利，於日本有利，於整個東亞有利的。

今日將三民主義之理論與實際，以及三民主義與和平運動的關係，簡單說明，時間匆促，只能舉其大要，然而三民主義的真諦，也就於此可見了。

（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對日本軍宣傳主任蔭條會議列席官演講）

## 中央陸軍軍官訓練團開學典禮訓詞

中央陸軍軍官訓練團在這國家民族危急存亡的時候成立，是極有意義的。今年八月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揭出『和平反共建國』口號；所謂和平，不只是中國的和平，而是東亞的和平，不是一時的和平，而是永久的和平，不是屈辱的和平，而是合於正義的和平；所謂反共，是反對共產主義及其陰謀擾亂，不問國際形勢及外交政策如何，反共的意義永遠不變的，因為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絕不相容；所謂建國，詳細些說，是完成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之建設。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認定了時代的使命，揭出這個口號，由這個口號而聯合各黨各派，籌備成立中央政治會議，籌備成立中央政府，在這種工作進行中，成立中央陸軍軍官訓練團，是要集合武裝同志來共同負擔這個時代的使命。

各位武裝同志，必須知道，在這兩年有餘的中日戰爭中，中國是戰敗了，古人有言，『敗的時候，顯出將才』，因為有好的將官，才能臨敗不亂，擴而言之，不獨軍隊爲然，好的國民，才能臨敗不亂，第一要承認敗，第二要處敗。向來兩國戰爭，最不幸的是亡國，用盡了力量之後，只有再謀恢復，其次是割地賠款

，保全國家於將亡，然後再慢慢地復仇，這種做法，是循環不已的。日本看透了這一着，不以戰勝國自居，所以才有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近衛聲明，這是和平運動的嚆矢。今年六月，兄弟在東京晤見平沼首相，聽他說過，上次歐州大戰，因為凡爾塞條約，種下了第二次歐州大戰的原因，我們東方民族要擺脫這種功利思想，為東亞和平奠定穩固的基礎。現在阿部內閣，也是如此。不但政府中人為然，即朝野有志之士，相與談論，大都坦白的說，『做成中日兩國此次不幸的戰爭，中國也有錯處，日本也有錯處，中日兩方都應該同時認識，同時改正』。各位武裝同志想想，日本是戰勝國，他能認識錯處，改正錯處，他要在不損害中國獨立自由的基本原則之下，與中國成立和平，使中國能够分擔東亞和平與秩序之責任。日本是戰勝國，能够如此，我們應該怎樣？我們應該以十二分的勇氣來認識錯處，改正錯處。和平反共建國實現起來，不但中日以前的糾紛，可以消除，並且，以後可以在共同目的之下，共同前進，從此中日兩國不會再有戰爭了，從此中日兩國共同擔負東亞和平與秩序之責任，其目的何等光明正大。固然，進行的時候，不免有相當困難，相當阻礙，但我們要以十二分的勇氣，向着這共同的目的而共同前進。

以上是武裝同志當前的重大使命，爲達到這個重大使命，各位武裝同志不可不牢牢守着『智深勇沉』四個字。智勇是軍人所必要的，但是智欲其深，勇欲其沉，因爲國際的形勢，國家的環境，國民的需要，沒有深切的智識，是不能認識清楚的，而當國家民族危急存亡的時候，用得着古人所謂『操心危，慮患深，』決不是浮囂虛僞的人，所能擔得起責任的，各位武裝同志必須牢牢守着這四個字，因爲各位武裝同志目前的環境是很艱難的，肩上的責任是很重大的，必須牢牢守着『智深勇沉』四個字，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然後各位武裝同志才能完成這時代的使命。

末了，有一句話，中國整軍經武有幾十年了。我們知道，中國的老百姓是很苦的，由老百姓出來擔負軍人的責任的人，卽各位武裝同志，也是很苦的。然而爲什麼直到現在，中國的軍隊還不能成爲現代國家的軍隊，還不能脫離個人獨裁的支配呢？這是很可痛心的。我以十二分熱誠盼望中央陸軍軍官訓練團的成立，我更以十二分熱誠盼望中央陸軍軍官訓練團全人建立一個現代國家的軍隊之基礎，打破個人獨裁的支配，以擔負完成和平反共建國的使命。（二十八年十二月九日）



## 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之解釋

(在中央陸軍軍官訓練團講)

各位同志！

今天所要講的是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解釋。

中國國民黨前後共總有七次的全國代表大會，從第一次到第六次，中間還有一回是臨時的。每一次的代表大會都有宣言，兄弟可以老實告訴各位，這七次的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有四次是兄弟起草的，所以對於大會宣言的前後，兄弟比較可以說曉得清楚一點，當然並不是說起草的人的話就是對的，因為起草雖然由一個人起草，但是經過大會通過，就是大會公共的意思，而不是原起草人一個人的意思了，不過原起草人的意思解釋出來，總可以給各位同志作一個參考。

現在先說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民國十三年正月在廣州開的。那時候，總理孫先生親自指導，在大會以前，曾經指定四個起草的人，一個是胡漢民先生，一個是廖仲凱先生，一個是戴季陶先生，一個是兄弟，

四個人商量之後，是由兄弟起草的。那時候的精神在那裏呢？我們先看看環境好了。

我們大家都應該明瞭國民革命之目的，是始終如一，不能夠變更的，然而按着一時一時的環境，來定這一時一時前進的方針却是必要的。我們一定要明白那時候的環境，我們才能夠明白那時候的方針，爲什麼如此定法。民國十三年正月那時候的環境是怎麼樣呢？那時候國際上，就是華盛頓會議，在民國十年閉幕，大家總以爲世界上可以得一個暫時的安定，因此中國北洋的軍閥，以爲在這個國際環境之中，很可以苟延他們這種殘喘。同時，革命呢，革命的根據地，只剩了廣州這一塊，廣州之外，東江，是陳炯明的，南路，是陳炯明的部下鄧本殷的，北江，那時候北洋軍閥常常由江西來窺伺，可以說那時候革命根據地只在廣州這一小塊地方。因此那時候所注重的怎麼樣呢？就是團結革命的同志，提高革命的情緒，把革命的目的顯明，使大家曉得這種的國際環境，這種的國內環境，非打破不可。用全副精神，在那方面，來破除帝國主義的迷夢，破除北洋軍閥的惡勢力，伸張革命的勢力。拿廣州這個革命的基礎把革命的勢力擴張起來。這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方針，是在這裏的，這個宣言呢，就是根據這個方針，說明

白那時候的環境，說明白那時候的態度，說明白我們根據這小小一塊革命根據的廣州，要來打破全國的反革命，這就是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那時候最重要的意義。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呢，是在民國十五年正月開的，那時候起草的人呢？當時大會推定兄弟。那時候的環境，是怎麼樣呢？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總理孫先生去世了，跟着廣州就有討伐那些反革命，肅清廣州附近那些反革命的事實。在民國十四年的冬天，差不多廣東東江北江南路西江都平定了，同時，廣西的李宗仁黃紹雄白崇禧諸同志，也傾向過來了，湖南的唐生智同志，也傾向過來了，所以那時候的環境，比起十三年正月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時候，好得多了。經了兩年的醞釀，革命的目的，大家都曉得了，革命的宣傳，都比較擴展了，同時革命的根據地，已經由廣州一小塊地方，到了廣東廣西兩省這樣大了。那時候唯一的目的，是怎麼樣呢？就是要把革命的勢力伸張出去，北伐。

準備北伐。這就是民國十五年正月時候的環境，根據這個環境，決定我們應該做的工作，做我們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的基礎，由這個目的來起草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所以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是全部繼續第一次全國代

表大會的宣言，並沒有更改一點。因為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是總理親自指導我們的，總理逝世不過一年，所定的方針用不着改，只要照着這個方針繼續往前進就是了。現在各位試把當時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看一看，就可以明瞭了，那是繼續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把革命的勢力，由基礎堅固，而擴張到全國去，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的精神，是在這裏的。

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什麼時候開呢，是在民國十八年。我們知道那就是很危險了。爲什麼呢？你看十二年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兩年之後，十五年就開了第二次代表大會了，然則第三次代表大會，應該十七年就開了，爲什麼要遲到十八年呢？那是黨已經分裂了，分共以後，再來一個甯漢分裂，由甯漢分裂，弄到黨的分裂，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南京開的，在開之前，就已經醞釀黨內的分爭，在開以後，更不用說，立刻就打廣西啦，打湖北啦，打北方各省啦，各方面內亂的事情就發生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是誰起草的呢？兄弟不曉得，因爲那時候兄弟是反對南京這種非法召集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法律上的理由，現在不用說了。那時候，我反對的，是反對蔣介石拿個人獨裁的觀念，發出黨內的紛爭，現在請各位看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完全就是黨內分裂的一個現

象，這一點呢，因為本人自己並沒有參與，不願意多批評，不過我們就可以確定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是為黨內的紛爭而發生的。

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幾時開的呢？是在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底開的，也在南京開的，那時候，就是九一八以後，要講全國精誠團結的全黨的同志合作，所以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要把十八年以來，黨內紛爭的局面，給他做一個結束，大家精誠團結，來共赴國難。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是那一個起草的呢？兄弟不曉得，因為那時候兄弟還在上海，並沒有在南京，不過我們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曉得他是適應那時的環境的，那時是國難發生了，全國要講精誠團結了，全黨也得要講精誠團結了，所以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目的就是在這一點的。我們看那時候最重要是怎麼樣呢？大家還是忍辱負重，來應付國難，這種的精神，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很可以看得清楚的。

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就是到第五次了。

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二十四年十二月開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的時候，兄弟因為受傷，兄弟是在十一月一號受傷的，所以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兄弟沒有參加，不過兄弟曉得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起草人是誰呢？就是戴季

陶先生。他那篇宣言裏頭，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說；和平沒有到完全絕望的時候，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沒有到最後關頭的時候，決不輕言犧牲，有這幾句。這個意思從那裏來呢？我們要看清楚那時候的環境了，自從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國難發生到這時候，已經五年了，大家總是要想辦法本於忍辱負重的精神，來維持國家的生命。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的時候，正是冀東獨立，全國非常危急的時候，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還是跟着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精神，不願意隨便就同日本決裂，這個是什麼原故呢？就是看見國本還沒有鞏固，國力還沒有充實，不能夠隨便把國家來做孤注，所以才有那幾句說話，這個就是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最大的用意，也就是適合當時的環境的。二十四年十一月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二十五年一年還是跟着這方針走的。看了二十五年所開的許多次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便可以知道了。

到二十六年七月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二十七年四月在武漢開一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爲什麼叫做臨時呢？並不是說不應該開，因爲我們是兩年開一次大會的，二十四年年底開了，到二十七年年頭當然應該再開，但是當時因爲打仗的原故，召集得很匆促，所以就是開一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這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

會開會的時候，兄弟所起草的大會的宣言，是怎麼樣呢？就是根據二十四年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方針來做的，我們把爲什麼抗戰的原因說出來，我們把我們對於和平的希望，及和平的條件也說出來，說明白如果達到這個和平的希望，我們就恢復和平，達不到我們就繼續抗戰，在這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頭一段到第三段，說得很清楚的。以下就是關乎內政外交關乎教育各種問題都有說。那時候的環境是怎麼樣的呢？二十六年十二月南京已經陷落了，二十七年四月的時候，徐州也很緊急，大家曉得這個局面是很危急的時候，在武漢大家要做一个拚命來支持，不過自家曉得國力及各種的關係，去年蘆溝橋的打仗，真是一個不得已的，所以不能不把這個抗戰的目的來申明，再不能不把和平的條件來申明，說明白那些是我們堅持不能讓步的，那些是非讓步不可的，我們都已經明說了。各位看一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頭的話，就可以明白當時的宣言，爲的是適應了當時的環境，來定這個方針的。

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呢，就是今年八月在上海開的，爲什麼可以在上海開呢，不是黨章規定非在首都所在地不可嗎？這個平時是如此，非常時期就不能以此爲例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開，而首都是在重慶，因爲二十六年十二月，

國民政府搬去重慶的時候，說明白，這不是遷都，這是一個換地方辦公，因為打仗的時候，國家的首都，在什麼地方，不能夠同平常一樣，所以這一點，在法理上沒有問題。我們再來看看這宣言內容是怎麼樣呢？內容跟着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來的，就是剛才所說的話，如果和平條件達不到，我們還是抗戰，如果和平條件達得到，我們就恢復和平，這是同去年的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一綫相沿的，各位看看，這宣言裏頭，先後銜接，沒有中斷，等於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一樣。各位看看，連體裁都是一樣的，最先說明白抗戰的目的，後來說到和平條件的達到，後來列舉三民主義以及內政外交教育，說話完全是一貫的。這爲什麼？這也是根據環境來的。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還沒有得到和平的條件，當然還是講抗戰，希望和平，到現在，和平條件已經得到了，我們就要實現和平。這就是說兩次代表大會的宣言，不只沒有矛盾，並且沒有不聯結的。然則現在是那一個違背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所定的方針呢？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是跟着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而來的，各位如果把兩次的宣言，從頭到底看一遍就可以明白了。

我綜括說一句話，中國國民黨有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除了第三次兄弟不願說

話之外，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都是一貫的，都是因時代，因環境，來定進行的方針，而這個方針，却是本於國民革命原有的目的，前後是一致的，是連絡的，是因著時代的需要環境的需要而定出來的。我們大家同志，應該遵照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以一致的努力，本着一貫的方針，猛向前進。

(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豔電書後

去年今日，我發表豔電，於今整整一年了。我爲紀念去年今日起見，將豔電重讀一過，豔電的著重點，在末後幾句；「中日兩國壤地相接，善鄰友好，有其自然與必要。歷年以來，所以背道而馳，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瞭其責任。」中日兩國，所以有幾十年來的糾紛，以至於今日的戰爭，如果中國一方面，只是說由於日本之侵略主義，日本一方面，只是說由於中國之遠交近攻之政策，那麼過去的原因不明，自然對於現在的問題，不能解決，而將來的方案，更無從談起。如果能「深求其故而各自明瞭其責任。」則可知道這種糾紛，戰爭，對於「東亞幸福」，對於「太平洋之安寧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都有害無利，那麼，回過頭來，消釋前嫌，向着「東亞幸福」「太平洋之安寧秩序」，「世界之和平保障」，而共同努力，這纔是中日兩國的百年大計。凡是從事和平運動的，必須對於這一點有深切認識，不然，必不能從事和平運動。

和平運動的意義如上所述，我們看看這一年來的中日雙方的輿論。在日本方

面，一年以前，早就有對於中日關係須加以重新檢討重新確定之主張。自從近衛聲明以後，全國輿論，更趨一致。所謂東亞協同體，其定義及其條理，固然還沒有十分確定，但如近衛聲明中所說；「日本盼望中國分擔建設東亞新秩序之任務」中國要有能力，纔能分擔此任務，所以對於中國尊重其主權並援助其完成獨立，俾使有分擔此任務的能力，這種基本意義，日本輿論與日本政府聲明是一致的。雖然我們有時也會從日本雜誌上或報紙上看見一些相反的話頭，但在大體上是一致的。日本輿論能够這樣，是和平運動的一大進展。在中國方面，雖然仍有一部份高唱抗戰到底，最後勝利，但這是假的，這是受着壓力而不得不然的，所以凡是壓力所不及的地方，真輿論便出來了，已知道從根本上重新研究孫先生大亞洲主義之真精神真面目之所在了，知道中國必須與日本攜手，纔能內則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外則同負保障東亞之責任了，這也不能不說是和平運動的一大進展。

根據了以上事實，我們相信，我們熱烈相信，和平運動的理論，已經成熟。和平運動的成功，必然到來。目前所餘的問題，只是和平原則如何纔能具體實現？和平方案如何纔能完成？這些問題固然重要，但是我們如果本着十二分自信和

互信的決心，提出十二分的勇氣來進行，則一切困難必可衝破，一切荆棘必可掃除。

我如今還有幾句話，對主張抗戰到底，最後勝利的諸君說。諸君這些話，不是老實話，最後勝利是渺茫的，諸君自己心裏知道。先就國際形勢來說，諸君以前聽了陣線論的話，以為反侵略陣線必然決戰，決戰的結果，反侵略陣線必然勝利，勝利的結果，必然援助中國制裁日本，所以中國只要抗戰到底，必然最後勝利。這種渺茫的論據，我們在一年以前不知把他駁過多少次了。至於歐戰發生，則事實證明，再用不着我們來駁了。被諸君認為反侵略陣線領袖的蘇聯，已經和被諸君認為侵略陣線領袖的德國，聯合起來，夾攻波蘭，並且由蘇聯單獨向芬蘭進攻了。諸君所假定的侵略陣線反侵略陣線，已經因粉碎而空虛了。在這時候，歐洲的交戰國家，都是為着自己着想，談不到援助別人。其對於中日戰事，將看日本對於歐戰的態度如何。如果日本傾向自己方面呢！自然盼望中日早早和好，俾日本得以全力來幫助他戰勝他的敵人，如果日本還沒有決定呢！則最好中日兵連禍結，無解無休，至少予日本以牽制，使之沒有餘力，傾向到他的敵人方面去。這種心事，是顯然的，所謂各為其國，本來不足為奇。然則諸君所假定的援

助，豈不又陷於空虛嗎？還有一層，現在歌洲的交戰國家，誰是將來的戰勝者？誰是將來的戰敗者？目前雖然有種種揣測，但是那裏說得定呢？就軍事說，或者以爲某方面海軍力優，某方面潛艇力優，空軍力優，就經濟說，或者以爲某方面能持久，某方面不能持久，這些在目前雖可以揣測，而在將來則不可以揣測的。例如上次歐戰，俄國的革命，德國的革命，雖然可以從歷史的趨勢上，斷定其可能，然而是否必然發生，及何時發生，則誰人也不能斷定，然則諸君所假定的戰勝者豈不又是渺茫嗎？即使如諸君所假定，將來的戰勝者屬於諸君所盼望的方面了，然而那便斷得定援助中國嗎？而且這援助便斷得定有效嗎？例如上次歐戰結果，巴黎和會，中國是何等的失望！而華盛頓會議，也不過替九一八事變種下一個根子便了？試問於中國有何益處？然則諸君所假定的援助，又是渺茫了。諸君只要把以上層層想過一遍，便可知將抗戰到底最後勝利寄託於國際援助，是如何的渺茫，這是不是忠於謀國者所宜出呢？再就國內形勢來說，這一年來，又喪了多少師，失了多少地，說起來固然傷心，而最可傷心者，還莫過於鋪張小勝，掩飾大敗，小勝不是決定的勝利，用不着鋪張的，何況鋪張起來，以圖欺騙人民，其心更不可問呢！大規模的反攻，不用了，而焦土戰游擊戰、極其作用，不過

騷擾。須知騷擾事小，消耗事大，國力源於民力，民力耗盡，國力隨之，這豈是抗戰到底的辦法？最後勝利更不可待言了。共匪惡毒心腸，不必與言，諸君之中，定然有一部分懷着民族自殺政策的，認定國將亡了，不如舉其一切，同歸於盡。如果國之亡無可救，我也和諸君一樣，如果國有可救，難道不應該以救國爲先嗎？我們今日要爲救國而死，不要只爲殉國而死！

以上國際形勢，國內形勢，我在豔電中，已經指出，到了今日，更加證實。中國現在除了和平，沒有出路，所餘的只是和平原則能否實現，和平方案能否完成的問題了。我知道有許多人，對於和平是盼望的，但是懷疑着和平原則能實現嗎？和平方案能完成嗎？於是存了一種念頭，以爲目前姑且不說，等到和平原則已經實現，和平方案已經完成，那時候再來贊成和平，亦還未遲。全國裏頭存着這種念頭的人，可以說最多了，做個比方，辛亥以前，有許多人以爲等到革命成功，再來贊成革命，亦爲未遲，其結果，等到革命成功，再來贊成革命的人，十分之九是破壞革命的。如今又說等到和平成功，再來贊成和平，則其將來爲和平的破壞者，可以預決。爲什麼呢？因爲他對於革命，對於和平，根本沒有認識，所以其結果必然如此。辛亥革命，還只是國內的改革：如今的和平運動，如上所

述，中國必須與日本攜手，纔能內則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外則同負保障東亞之責任，這比之辛亥革命關係更大，工作更鉅。我們只要認定這是必要的，我們便要顧一切的向前奮鬥，即使一時蹉跌，一時失敗，今日的蹉跌與失敗，即是他日成功的基礎，我們何所用其徘徊瞻顧？有人告訴我道：「你須要得到具體的和平條件，方纔可以做和平運動。」這句話，我只承認一半的對，因為具體的和平條件，誠然是必要的，然而具體的和平條件之獲得，有待於和平運動。不但此也，獲得之後，期其實現，也有待於和平運動。具體的和平條件，不會突然發生出來的。總而言之，我對於和平運動，是勇往直前的，如果眼見其成功，固然是國家之福，即不幸失敗，亦必為和平前途留下一些種子，因為中日兩國如果要共存共榮，終不能不向這條路走的，何妨由我來做這條路上的一顆石子，一粒泥沙。有人說道：「為抗戰而死不失為民族英雄，為和平運動而死，死了還受種種惡名。」哼！請你看看蘆溝橋事變以來，幾千百萬同胞的死骸堆在這裏，你還能有閒心替你自己打算嗎？

末了，我記得一件舊事，我於庚戌三月在北京被捕的時候，警察在我身上搜出「革命的決心」幾篇文字，問我道：「帶這些文字做什麼？」我答道：「沒有

什麼，這些文字，從前以墨寫出來的，如今想以血寫出來。」我今日想起當初和我一同坐飛機出重慶的曾仲鳴同志，及首先勸我離開重慶的沈崧同志，我慚愧我到今日尚在人間！我誓以我所餘的熱血貢獻於和平運動！（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 共 同 前 進

和平運動所要求的，不是一時的和平，是永久的和平。如何纔能得永久的和平呢？中日兩國不但要把兩年有餘以來的戰爭現象，從根本上消滅了，所以中日兩國有把過去嫌疑猜忌的心理，完全肅清，從頭幹起，向着一個共同目標而共同前進的必要。

所謂共同目標是什麼呢？我在「中國與東亞」文中，已經說過，一是廓清百年以來流毒於東亞的殖民地主義，一是要拒絕二十年以來在世界猖獗者尤其在東亞猖獗者的共產主義，這不是指那一個國家，而是指那一種主義。這兩種主義，向思想上組織上比較弱點的民族國家進攻。中國因為積弱，所以被進攻的最利害。日本雖然能自強，但是東亞有一塊地方被進攻，無異日本被進攻。所謂共同防共，即是對於共產主義的拒絕，所謂經濟提攜，即是對於殖民地主義的廓清。這是中日兩國的共同目標，為中國，為日本，也為東亞。

中日兩國有了共同目標，便有了共存共榮的基礎了。可是如何纔可以向這

共同目標而共同前進呢？

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是國家民族之獨立生存自由平等，這是毫無疑義的，中國的國家民族有了獨立生存自由平等，纔能和日本分担東亞安定與和平的責任，這也是毫無疑義的。然而中國必須注意到一個根本問題，即是中國必須時時刻刻自覺爲東亞之一員，中國的安定與和平，必須於東亞的安定與和平求之。因此中國必須在外交上，在國防上，與日本採取同一方針，在經濟上，與日本根據著平等互惠的原則，實行有無相通，短長相補，這樣，東亞的安定與和平纔可獲得，而中國的安定與和平也隨之獲得。所以中國的建國事業。與東亞復興事業，是要一致的，如果分離，中國的建國事業不會成功，如果背道而馳，更只有自投於失敗之途。

以上是中國必須注意的，同時日本所必須注意的，也想略略的說幾句。

日本既然屬望中國分担東亞安定與和平的責任，則不可不使中國能充分自由發揮其能力，以期能够分担此責任。日本是東亞的先進國，對於後進國的援助，是日本應有的責任。可是援助與干涉是有極大分別的。援助是培養其能力之發達，干涉則是摧殘其能力之發達。日本如果採取干涉主義，不但不能啓發中國，自

動的願與日本一致分担東亞安定與和平的責任，並且會驅使中國與日本分離，甚至背道而馳，日本如屬望中國分担東亞安定與和平的責任，則關於這一點必須注意。

中國的建國事業能與東亞復興事業相一致，日本能援助中國，俾之能完成其建國事業，並俾之能分担東亞復興的責任，這樣中日兩國便可以向於共同目標而共同前進了。共產主義雖然猖獗，但是這種絕對的功利思想，與東方的道德精神，終是格格不入的，只要中國能根據三民主義，以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則民生主義實現之日，亦即共產主義在中國完全消滅之日。因為共產主義以階級鬥爭爲主旨，民生主義以社會合作爲主旨，這是在根本上的不同，共產主義以絕對的排斥私有財產爲目的，民生主義則以根據實業計劃發展國家資本保護私人資本爲目的，這是在辦法上的不同，所以中國如能得到時間以實行民生主義，則共產主義必然絕跡。至於殖民地主義侵入中國，已及百年，根深蒂固，似非一朝一夕所能廓清，然而最近數十年來，尤其二十餘年來，中國的民族資本已經萌芽，這種民族資本，固然還是很幼稚的，却是培養起來，必然的成爲中國經濟社會的基幹。日本如能與中國的民族資本互相提攜，以先進國的資格，隨時加以援助，則從此

廓清殖民地主義的勢力，亦並非不可能的事。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都著眼於此的。於此有附帶說明的，所謂廓清殖民地主義的勢力，並沒有排斥第三國正當權益的意味，含在裏頭。中國實業計劃的完成，有待於外國資本及技術，這是極顯然的事。這與中日經濟提攜並沒有矛盾。因為中日經濟提攜的結果，中日之間，並無衝突，在這種關係上，歡迎第三國的資本與技術，自然沒有矛盾，而且第三國的正當權益必然因此而得到合理的保障與發達。東亞的安定與和平，是世界的安定與和平之一部份，由東亞安定與和平，進而為世界的安定與和平，更是世界人類所渴望的事。

(二十九年元旦)

## 和平運動之前途

二十九年這一年，無疑的是和平運動由開始而到達於成功。前幾日我在「豔電書後」中，已經有所說明了，如今再說幾句話，加以引申，作爲二十九年獻歲發新的頌辭。

或者有人會問我道：「和平運動的意義，我們已經知道了，但是我們的實力如何呢？如果我們沒有實力，如何能擔負和平呢？」這種問法，我是很高興解答的。因爲「不量力」，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我們最應該時時刻刻提心吊膽，不可忘却「量力」兩個字，方纔能够立國於東亞，立國於世界。

我對於所謂實力，想分析爲兩部份：第一是軍事力量，第二是經濟力量。如今先說軍事力量。

如果說我們的軍事力量，够不上做和平運動。那麼，够得上抗戰嗎？這真所謂不值一駁的。在蘆溝橋事變以前，我們如果知道量力，則應該誠意的努力的調整中日關係，並且把軍事方針確定於防共這一點，那麼，我們的軍事力量可以保

存而且可以發達。即在蘆溝橋事變以後，我們如果知道力量，在德國出來斡旋的時候，誠意的努力的謀和平之實現。那麼，軍事力量還不至過於消耗。即在近衛聲明以後，我們如果知道力量，誠意的努力的以謀實現全面的和，那麼，軍事力量雖然消耗，也還可以想法子來恢復。可是一誤再誤，以至於今。連所謂全面的和也在不可知之數了。軍事力量，這樣的消耗下去，只怕恢復無期了。然而沒有軍事力量，就不能做和平運動，也未必然的。普法之戰，法國的軍事力量，已經被普國擊破，爲什麼法國還能恢復和平？上次歐洲大戰，德國的軍事力量，在停戰時候。幾乎可以說是全被繳械。爲什麼德國還能恢復和平？天下祇有相類的事，沒有相同的事，我不是以法德例中國，我也不想中國蹈法德循環報復的覆轍。但是我想說明，一個國家，在軍事力量不幸而被擊破之後，這個國家，還有一種力量，可以存在，這一種力量是什麼？是民族意識。普法之戰，法國軍事力量，被擊破了，然而民族意識，仍然存在，所以於割地賠款之後，仍能保有法國。上次歐洲大戰，德國軍事力量被擊破了，然而民族意識，仍然存在，所以於割地賠款之外，再加以種種不平等的束縛，仍能保有德國。至於中國民族意識的存在，已經數千多年，尤其數十年來，特別發達，不但我們自己知道，便是日本也知道

的。不過我們對於民族意識的力量要估計清楚。我們不可妄自菲薄，以立國纔二十多年的捷克斯洛夏爲比，我們尤不可妄自期許，以爲只憑民族意識，便能得到最後勝利。我們要於估計清楚民族意識的力量之後，隨時隨地而善用之，用之於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用之於分擔東亞永久和平的責任。這是我們所能做的，也是我們所應做的。我們必須明瞭所謂軍事力量是什麼，除了專門的軍事學識和技能之外，一切物質都是取給於人民的，一切精神，也都是由民族意識而來的。卽所謂專門的軍事學識和技能，也莫非是由人民培養而成。決不是如小說書所謂，一位金甲神，從天下降。所以軍事力量，不能包括民族意識，而民族意識，却可以包括軍事力量。可憐的中國人，幾十年來，前誤於軍閥，後誤於個人獨裁，把軍事力量，看得如同從天下降金甲神一樣。於是，開口實力，閉口實力，把實力與軍事力量看成一物。從前以爲沒有軍事力量，不能抗戰，如今以爲沒有軍事力量，不能講和。這不是把軍事力量看得太重，却是把民族意識的力量看得太輕了。自然，我們將來還是要建軍，還是要鞏固國防，還是要綏靖地方，保衛人民，我們並沒有一刻忘記軍事力量。不過我們只要說明，決不是有了軍事力量，纔可以做和平運動！如今再說經濟力量。

說到經濟力量，日本是先進國家，最近已駸駸然進於重工業發達的階段，中國是經濟落後國家，重工業還沒有萌芽，輕工業剛剛開始，還在幼稚時代，便遭着摧殘了，甚至號爲以農立國，而糧食一項，無論米麥，都不能自給自足。因此有許多人，對於中日經濟提攜，抱着絕對的悲觀！以爲兩個幼稚的國家，可以說提攜，兩個強盛國家，也可以說提攜，一個幼稚國家和一個強盛國家，却如何可以說提攜呢？這不是狼與羊提攜一樣嗎？這種論調，戰前已經普遍，在戰後尤其深刻，以爲中國已經是一個落後國家了，如今再加上一個戰敗國家，所謂經濟提攜，還堪問嗎？無論如何，都是合作其名，獨佔其實，這是勢所必至無可逃避的。這種絕對的悲觀論調，浸淫起來，便成了以下的判斷：中國和歐美講提攜，還可，和日本講提攜則絕對不可。因爲歐美離中國遠，來的人不多，來的貨色也不多，所以中國人還可以在歐美指縫裏過生活，日本離中國近，來的人多，來的貨色，各樣齊全，精粗美惡，應有盡有，所以中國人休想日本人手下留情，除了做苦力外，只有做叫化子了。總而言之，中國和歐美講提攜，美人嚼牛肉排，中國人還可以吃鹹菜飯，中國和日本講提攜，日本人吃「沙斯美」，中國人連湯也沒得喝了。由於這種判斷，便只能有以下的兩個希望：其一，日本火山爆發了，其

二，歐美合起夥來將日本打倒。但這兩個希望，不是等於望天打卦嗎？根本就不會成立的。至於枝節呢，幾十年來，中國往往發生抵制日貨的事情，這固然由於政治的理由，然而在經濟的理由看來，却成了一種變相的保護政策。因爲一方面正堂堂的以政治的理由來抵制日貨，一方面却正好偷偷摸摸的，以經濟的理由來提倡國貨，於是許多國貨在抵制日貨的環境之下，便應時而興了。但這是好辦法嗎？恐怕無論何人，都不會承認爲好辦法的。十年以前，我曾經在香港一間客棧裏住過，和茶房談談天，我問他道：「近來生意好嗎？」他嘆口氣道：「噯！廣東沒有亂，這裏生意怎樣好呢？」我聽了真是哭笑不得。靠抵制日貨來提倡國貨，可不是和這種見識一樣？不用說根本，連枝節也不應該這樣的啊！然則中日經濟提攜，真個的是這樣絕對的悲觀嗎？如果是的，和平運動自然無從做起。但是我的看法，却不是如此絕對的悲觀。我以爲日本對於中國，本來有兩條路：一條在軍事上謀征服，在經濟上謀獨佔。那噯，那是以中國爲殖民地，第一期，榨取原料，銷售商品，同時並行，第二期，中國人的購買力盡了，無所謂銷售商品了，就只有於榨取原料之外，更榨取其勞力，使中國人以苦力始以叫化終了。這條路行得通嗎？行不通的。強行起來，必然遇着中國民族意識之激烈反抗。民族

意識不是槍砲所能擊破的，其結果必致徒勞而無功。所以這一條路，是斷斷乎行不通的。另一條路呢，便是近衛聲明所謂按照平等互惠之原則，以謀經濟提攜了。這條路行得通嗎？行得通的。上頭說過，中國號爲以農立國，而糧食一項，無論米麥，都不能自給自足，這不是中國地利之咎，而是人工之咎。如果以人工發達地利，使之科學化，現代化，則中國的農業，不但能充分的自給自足，並且能充分的供給日本之所需。如棉花，如羊毛皆是。這些在農業知識上，已有定論，用不着多說。至於輕工業呢，中國在戰後，必須從事於恢復，這是不待言的。那麼會和日本的銷售商品發生衝突不會呢？普通看來，似乎必然衝突，不是日本商品布滿了中國市場，使中國的工業製造品，無從銷售，因之，工業無從發達，便是中國的工業製造品，將日本商品，從中國市場驅逐出去。方纔所說絕對的悲觀論，即是從此出發的。但是中日兩國，難道不能適用有無相通長短相補的原則嗎？難道不能分別部門，以各顯所長嗎？難道不能於同一部門之中分別精製品的粗製品，以各盡所能嗎？難道不能於同一部門，同一質量之中，更從事於數量的分配，以使之各如其量嗎？那見得就這樣絕對的悲觀呢？中國的民族資本，本來有限，以有限的資本，來經營各種工業，勢必至因分散而薄弱，對外不能競爭，

而且資本愈少，則歸本及贏利之心愈急，內部因此亦時時發生破裂。這實在是幾十年來中國工業不振之最大原因。如果認定幾個部門，集中力量，從事經營，對外既不至因重複而惹起衝突，而內部亦不致左支右絀，使事業中途停頓。有許多人恐懼日本貨品的廉價，以爲必然獨佔市場，殊不知中國若能用避免重複的辦法，對於自己所經營的部門，專心致力，則對於所放任的部門，正可利用日本貨品的廉價，減輕買價的負擔，而增加購買力，增加消費力，則豈不是較好的辦法嗎？不特此也，即使同一部門，也可從質量上數量上，想出平均發展的辦法的。舉一個例來說，二十六年的上半年日本在中國所辦的紗廠，以及中國自辦的紗廠，都獲厚利，其原因在什麼？在於二十五年之豐收，中國農民得到豐收，過年的時候，替自己或替子女多買一塊布，各紗廠就覺得銷路大暢了，說起來，真傷心，中國號爲以農立國，號爲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農民，但是農民所過的生活，是人的生活麼，不用說別的，衣不蔽體的現象，鄉村間觸目皆是。自然在上海跳舞場的人們不是會看見的，可知道陝甘一帶有些十七八歲的姑娘們，因爲衣不蔽體，見了人就躲在土坑內啊！如果政治能修明，共匪能肅清，一切不必要的政費軍費能減少，則政府可以拿出大批的錢來，從事於農業之改良發達與輕工業之恢

復，那麼一般農民收入自然增加了，購買力自然也因之增加了，照現時的紗廠，再添十倍，乃至數十倍，也不怕沒有銷路。那裏見得便衝突呢？「不患寡而患不均」這是一偏之見，均不均是分配問題，寡不寡是生產問題。生產則欲其多，分配則欲其均，纔是正理。中國今日可謂寡到極處了，提高人民的生產力，即是提高人民的購買力，即是提高人民的消費力，商品不愁不暢銷，市場不愁不推廣的。絕對的悲觀論者，請放心罷。以上所說，農業輕工業是如此。

重工業在發達程序上自然較後，但是中國如果要興辦重工業，如鋼鐵廠等等，則歡迎投資，歡迎技術人才，是必然的。因之經濟提攜，也是必然的。所以絕對的悲觀論者，以爲經濟上若沒有同等的力量，則不能提攜，這話是沒有根據的。此於和平運動，關係極大，明白了經濟提攜之可能性與必要性，便可明白和平運動之可能性與必要性了。

以上所說，是「量力」不是「不量力」。我們不但應該擔任和平運動，我們並且能够擔任和平運動以努力於具體的和平條件之獲得，並努力於實現。末了，還有幾句話，日本輿論，大體上都盼望中國能有愛國者出來擔任和平運動，這是重視中國民族意識之表示，我們十分感謝。但是還有一小部份責備中國，不應只

知愛國，應知興亞尤大於建國。我想答道，日本人如不愛日本能愛東亞麼？然則中國人如不愛中國，又安能愛東亞？至於中國人呢，應該記着孟子所說，不要「自暴自棄」，尤應該記着韓文公所說，不要成爲一個「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的人。那麼，於創鉅痛深之後，同心協力，必能將建國興亞兩重責任，擔負起來。

(二十九年元旦廣播)



# 建軍之目的

(檢閱中央陸軍軍訓團開操典禮訓詞)

各位武裝同志：

今天所講的，是建軍之目的。

凡是建立一個軍隊，總要有一定之目的，以所有的精神氣力，向着這目的，勇猛前進，纔能夠達到我們的理想。

我們建軍之目的在那裏呢？爲什麼要建軍呢？爲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建軍呢？總理遺囑第一句話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這是革命之目的，建國之目的，也就是建軍之目的。革命之目的很大，而革命之途程卻是很長遠的。我們在這長遠的途程上，一步一步的邁進，第一要明白認識最終的目的，不可迷失了方向，第二要明白認識每個階段的任務，不可錯亂了步驟。革命目的，只有一個，而其途程，却要經過無數的階段。這就是說，每個階段，任務雖不盡同，而其根本目的，則前後相承，始終如一。

十四五年間是本黨改組後策動革命的第一個階段，那時候，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而其最迫切需要的任務，則莫過於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中國陷於次殖民地的境遇，不自由，不平等，已經百年了。誰使中國不自由不平等？誰陷中國於次殖民地的地位？是帝國主義者。誰爲革命作梗，使中國人不能悉力以求自由平等？是軍閥。軍閥是革命的障礙，而帝國主義者則是軍閥靠山。所以第一次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昭示國人的指導口號，一是打倒軍閥，一是打倒帝國主義。

十六七年間，革命勢力逐漸伸張，及於全國，眼見着統一快要告成，軍閥快要崩潰了，無如一方面有帝國主義者之兵艦示威，從外面壓迫革命。以言對外，則實力決戰，勢所未能，以言對內，則分共清黨，實有必要。尤可痛心的，因獨裁者之暴戾恣肆，黨基動搖，政綱解組，內戰綿互，竟成分崩離析之局。直至二十年秋，九一八之變，本黨同志知非精誠團結，無以共赴國難，纔有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復合。從那時起，國民革命到了另一階段，革命之目的，一樣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而其最迫切需要的任務，則治標莫急於清除共匪，治本莫要於經濟建設。和第一個階段比較，指導口號雖然改變了，革命精神却是一貫的。

爲什麼要清除共匪呢？共匪肆虐，患在腹心，他們之破壞革命與軍閥之阻撓革命，沒有不同，他們之糜爛地方，摧殘民生，與軍閥之擁兵自衛，食民而肥，也沒有不同。所以清除共匪的工作，正是打倒軍閥的工作之延續。爲什麼要經濟建設呢？國力源於民力，國力不振，由於民力不充。所謂國力，分而言之，爲軍事的力量，經濟的力量，合而言之，則軍事的力量，實以經濟的力量爲其基礎。經濟不發達，而欲強求軍事建設之現代化，科學化，必不可得。民力不充，國力不振，對內尙且不能鞏固統一，對外又怎能抵抗侵略呢？所以『打倒帝國主義』與『經濟建設』，兩個口號，也是相聯貫的。以前，我們要使人人知道，非打倒帝國主義，不能完成國民革命，如今我們更要使人人知道，非充實民力，發達國力，不能與帝國主義者作殊死戰。根本方針，沒有不同，所不同的，前者是目的，後者則是方法，前者重在宣傳，後者則重在實行。

由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間，中樞當局，本既定之國策，忍辱負重，艱苦撐柱。

內政統一，外謀和平，所以完成國家建設，亦即所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正當冀東事件華北情勢極度危急之際，大會宣言猶明白告國

人，『和平未至絕望時候，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那裏知道，剛剛一年，西安事件，獨裁者屈服了，根本國策搖動了，和平建國的機緣也就隨之而中斷了。

二十六年蘆溝橋事變，不得已而奮起抗戰。在戰事中，一般民衆，冒着絕大的犧牲，忍受絕大的痛苦，爲的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一般將士，前仆後繼，視死如歸，爲的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一般民衆，能够如此，一般將士能够如此，實在是中國人民民族意識之最大表現。民族意識是立國之本，必須善爲誘導，善爲培養，使之發揚光大，萬萬不容誤用濫用，促其頹喪的。戰爭既爲不得已之舉，則覓取時機，結束戰禍，恢復和平，實爲忠於謀國者應有之決心和責任，負最高軍事之責者，應該時時刻刻熟察大勢，統籌全局，不得不戰則戰，可和則和，有什麼理由任令戰禍拖延，置國家存亡人民痛苦於不顧？二十七年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以中國維護和平之本來目的，昭告世人，一則曰，『蓋自塘沽協定以來，吾人所以忍辱負重，以與日本周旋，無非欲停止軍事行動，採用和平方法，先謀北方各省之保全，再進而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爲最低限度，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爲合作原則。』再則曰『吾人

之本願在和平，吾人之最終希望仍在和平，惟吾人所謂和平，乃合於正義之和平，必如是，然後對內得以自立，對外得以共存。』其言之深切著明俱如此。獨裁者有什麼理由背棄歷年既定之國策蔑視本黨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代表大會所一致議決之方針！有什麼理由使一般民衆一般將士爲中國之自由平等而犧牲的血，徒然白流！

我們今日，必須大步的踏入國民革命的新階段，這新階段的指導方針，是去年八月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所示，『和平，反共，建國。』這方針與國民革命之最終目的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是一貫的，爲達到這最終目的在現階段中，要本著這方針而努力，我們爲什麼要建軍，爲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建軍，便是要在現階段中，本著這方針，努力奮鬥，完成現階段的使命，以達到最終目的。由上面所說，可以知道，這方針完全是循著歷次大會宣言，而決定出來的。前後相承，始終如一。

『和平』，『反共』，『建國』三個口號，六全大會宣言已就其一般的意義，說得明白清楚了，如今所要說的是：『和平反共建國』與建軍之關係，及我們武裝同志應有的認識。

一，『和平』。和平是人類的最高理想。被侵略的國家固然要尊重和平，就是侵略的國家，也不敢明目張膽，反對和平。只知戰爭，不知和平，那是十分可恥的事，除非野獸，不會這樣。有人說道，既然和平了，爲什麼要建軍呢？這種說法，真是誤解了和平的真義，誤解了建軍的真義。須知道，和平不是空言可致的，必須有實力爲之支持，然後真正之和平方能確立。建軍之最大目的，就是以實力來支持和平，維護和平，保障和平。有了力量，不但和平可致，並且有時候，戰禍可免。例如此次歐洲大戰，牽動英法德三個大國，在十幾年整軍經武，加之以戰爭科學突飛猛進之後，大家總以爲戰端一啓，爲狀之慘，必非前次大戰所可同日而語。但是直到現在，海戰之外，雙方空軍陸軍，還是取着守勢，大規模之惡戰，迄未開始。爲什麼呢？因爲雙方知己知彼，各有顧慮。空軍呢，大規模的轟炸，必至循環報復，同歸於盡；陸軍呢，德國要攻入馬奇諾陣綫，要冒絕大的犧牲，法國要突破齊格非陣綫，也要冒絕大的犧牲，所以互相守望，不敢輕舉妄動。有些政論家軍論家倡爲科學昌明促進和平之說，以爲戰爭技術愈進步，則大家對於戰爭之恐怖愈大，因而對於避戰謀和之心事也愈迫切。此種觀察，雖未可視爲定論，而且歐戰前途，亦未易遽加以判斷，然而要維護和平，必須有力

量，這是無論何人，不能否認的。固然他日或者有較好的方法，以保障和平，用不着拿軍事力量來做保障，然在今日則沒有軍事力量，不能保障和平，情勢顯然。所以和平與建軍，不惟沒有矛盾，而且相依爲用。明白了軍事力量，是要來擁護和平，不是要來破壞和平，則建軍之目的明，而軍人之道德精神，亦於此可見了。以上是就一般而言，再就現狀來說，我們所謂和平，自然是指中日和平，了無疑義。中日兩國，經過了這一場血戰，彼此自知，而又互知，中國不能滅亡日本，日本也不能滅亡中國，戰則兩敗俱傷的，和則共存共榮。此實爲中日和平之基點。我們知道，和平是雙方面的，雙方有了需要，還要有誠意，有決心，有勇氣，纔能够見之於實行。前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近衛首相發表聲明，已以最大之勇氣表示其和平的誠意和決心了。總理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的奮鬥。』所謂『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語意明白，那一個民族，能以平等待我，便是指那一個。近衛聲明，『無領土之要求』，『無軍費賠償之要求』，『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進而考慮交還租界，廢除中國完成其獨立所必需之治外法權』，明白表示日本不但無滅亡中國的

心事，且願以平等待我了，爲什麼我們不努力在和平之中，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爲什麼我們不遵奉 總理遺教，聯合願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呢？中日和平之大義明白如此，無可懷疑，中日和平如果實現，則中國建軍之目的，其非爲對付日本，自無待言，然則中國建軍作何用呢？就原則上說，中國是一個自由獨立的國家，自然要有軍事力量，來維持國家之自由獨立，這也是無待言的，就應用來說，則中國目前有一個重要的任務，是反共。

二，『反共』。關於此點，打算撇開理論，側重事實。有兩層先要明白的。其一，所謂反共，不是反對蘇俄，而是反對第三國際擾亂陰謀，姑勿論蘇俄與第三國際，名實關係，判別如何，但我們始終認定，對俄邦交是一件事，對第三國際的擾亂陰謀又是一件事。其二，從前顧慮，日本提議共同防共，或將因此而干涉及於我國之軍事及內政，然近衛聲明，已經指出以日德義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這種顧慮，也可以消除了。論起反共，有國內的反共，有國防上的反攻。先就國內的反共來說。我們的反共，自十六年武漢清黨以來，始終一貫，我們並沒有因爲西安事變，而出賣了十幾年剿共的人民血汗與將士血汗，所以我們的反共，不待煩言，是一直做下去的。我還要明白告訴各位武裝同志，我們

不但要拿軍事力量來反共，並且要和各種力量合作來反共，所以我們今日，不但要樹立反共的軍事力量，尤其要樹立反共的民主力量。只是軍事反共，是不夠的，軍事的反共力量，必須與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種種反共力量配合起來，纔能夠清除共匪，絕其根株。剿共之役，用兵不爲不多，爲時不爲不久，而卒未能根絕共禍，其最大原因，即在於只知軍事剿共，而不知從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同時着手。反觀歐洲各國，共產黨在德意，沒有立足之餘地，不用說了，即在英法，也不能任意煽亂，爲所欲爲。戰前法國共產黨扮演其所謂人民陣綫，鬧得震天價響，及至戰事發生，一經政府取締，便銷聲匿跡了。至於英國，雖然還有共產黨，却始終守着民主政治的常軌。總沒有像我們中國的共匪，割據西北，四出煽動，那麼猖獗的。其原因是：英法是民主政治的國家，民主力量有了基礎，所以共匪的一切擾亂陰謀，便無從發作。所以我們對於軍事建設，政治建設，經濟建設，必須同時並進，本於民權主義以改造政治，本於民生主義以發達經濟，使反共的軍事力量，和一切反共的民主力量結合起來，纔能夠貫徹反共目的。次就國防上的反共來說。去年六月，我在東京，與平沼首相晤談，平沼首相於表示反共決心之後，對兄弟說：『日本不但不能容許共產勢力侵入日本，並且不能

坐視共產勢力爲患於東亞。日本社會組織有了基礎，共產勢力不易侵入。所引爲深憂的，中國社會組織不健全，經濟制度未確立，最易爲共產勢力所乘，長期則共，尙不免有西安之變，死灰復燃，可爲殷鑒。中日兩國，同是東亞之一部份，中國有了共禍，與日本有了共禍無異，甚望中國今後爲根本之計，與日本攜手，站在一條戰綫之上，共同防共，庶幾禍亂之原因可去，和平之基礎可立。』後來板垣陸相對兄弟說：『蔣介石以爲日本無力再戰，那是錯誤的，爲了剷除共產勢力，莫說五年，就算十年，十五年，亦所不辭。』後來近衛公爵與兄弟筆談，更懇切的說：『和平之後，願中國爲自己打算，且爲東亞打算，努力防共，日本之所期望於中國的，絕非藉此以控制中國之軍事，惟欲求中國充實防共之力量，分擔防共之責任，使日本無兼顧之憂而已。此在華北沿綫，至爲迫切，日本之意，亦非欲陷中國於對俄戰爭，反之，正惟恐中國爲共產國際擾亂勢力之所乘，以致戰禍重起，故不能不相與協力，爲之預防。』其所言日本反共，決心既如彼，其所以期望中國共同防共，理由又如此。頗聞有人說道：『和平目的，在於消弭戰禍，如今和了之後，又要防共，那不是東面講和，北面打仗嗎？』觀於近衛所言，可以了然。我們並且要明白認識，所謂防共，是防衛，不是侵略，決不會由防

共本身發生戰事，即使退一步說，由防衛而惹起外來的侵略，以至於發生戰爭，則在那時候中國是協同作戰，較之今日單獨作戰，有把握得多了。中國單獨作戰，到如今已是第四年頭，什麼國際援助國際同情，不過臨時的嗎啡針，及死後的花圈，中國要這等來有何用處？如今將中日兩國，結成同生共患難的關係，自然比較前此之獨力支持，安全得多，這是不煩言而自解的。於此，尚有須注意的，所謂共同防共，必須中日兩國，都有防共的力量，纔做得到。從前看過一幅描寫協力的漫畫，三個人踏雪上山，用繩子纏在身上，互相聯着，然後協力上去，到了半途，忽然的有一個人，力量不支，看看要倒了，前面兩個，只好拔出腰刀，把繩子割斷，讓他自己滾了下去，不受其累。由此可知自己沒有力量，雖然共同協力，也是徒然。我們既然要分擔共同防共的責任，就要有分擔共同防共的力量。建軍目的，即在於此。總而言之，國際的反共，要有力量，國防上的反共，也要有力量，不但要有反共的軍事力量，並且要有反共的民主力量，反共的軍事力量與反共的民主力量聯合起來，纔能夠對內完成反共的工作，對外分擔防共的責任。

三、『建國』。建軍是建國的手段，建國是建軍的目的。為建國而建軍，有

極深遠的意義，不是隨隨便便，可以做到的。我們第一，要把軍隊造成國家的軍隊，把以前軍閥及個人獨裁的形迹，掃除得乾乾淨淨。個人獨裁，是以個人為中心而建立軍隊的，所以他的軍隊，有一層一層的親疎厚薄，總之有無數的猜疑嫌隙，阻不安；國家的軍隊則是以國家為中心，軍人視國家為家庭，國家視軍人為子女，人民與軍隊相處如骨肉，着了軍服是軍隊，脫了軍服是人民，沒有一毫歧異，一毫扞格，一切親疏厚薄的分別，是無從發生的，一切猜疑嫌隙，是無從有的，換句話說，一切軍閥及個人獨裁的形迹，掃除乾淨，方纔能够成為國家的軍隊。第二軍隊要現代化。所謂現代化，物質設備，固然重要，精神力，組織力，尤為重要。沒有精神力組織力的軍隊，就算有了新式武器也是徒然。我知道有許多同志慨歎於中國軍隊之不能現代化，這是對的，然以為軍隊有了物質設備，便是現代化，這却只有一半的對，物質設備，誠然必要，我們因此提倡科學化，提倡經濟建設，但是物質設備，不過工具，如果沒有精神力組織力來運用他，則只是死的工具，精神力由修養而來，組織力除了個人內部修養之外，還要注意到團體的共同動作，這些都是極緊要。總而言之，軍隊要成為國家的軍隊，現代化的軍隊，方能擔負建國之任務，我們因為要建國，所以要建軍。

總括以上所說，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每個階段，革命任務雖有不同，而其目的則一。我們爲什麼要建軍呢？爲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我們爲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建軍呢？爲的是要打破個人獨裁的軍事制度。建立國家化現代化的軍事力量。來擔負現階段的革命任務：和平，反共，建國。武裝同志們，你的責任是很重大的，你們的前途是很光明的，你們必須以所有精神氣力，獻之於黨，獻之於國，在和平反共建國的奮鬥中，完成國民革命，得到中國之自由平等。

（二十九年一月五日）



## 銑電

重慶蔣介石先生勳鑒：兆銘於前歲十二月二十九日建議，主張根據日本近衛聲明，調整中日關係，奠定東亞之永久和平，不幸未承採納；然兆銘與諸同志仍不避艱險不惜犧牲，前仆後繼，以致力於和平運動，並與日本朝野開誠布公，討論和平方案。一年以來，殫盡心力，謀掃除過去之糾紛，實現將來之光明。因知在此環境中，欲和平方案能滿人意，良非易事，所幸中日兩方，各以東亞前途爲重，互相諒解，互相讓步。和平方案基礎已具，中國所可得到者，不惟非亡國條件，且循此力行中國之獨立自由可保，三民主義之建設可以完成。爲此更竭誠盡慮，向先生再進一言，以今日之國內情形，國際環境，抗戰到底必無最後勝利之望，先生所知，無待贅言；全國人民側向和平，亦先生所知，更無待贅言。惟和平之實現，必須全國一致，乃能迅速普遍。卽以撤兵言之，中國人民固日望日本早日撤兵，卽日本亦何嘗欲長此勞師於外。惟先生若繼續主張抗戰，則撤兵之舉，從何說起。更以經濟建設言之，今日民困窮，財困盡，然及今停戰言和，國力

民力恢復尙易；若長此耗竭，則民力凋盡，國力隨之，經濟建設亦將無從說起。兆銘決不能以此有所顧慮，勢必先以全力，從事於局部的和。惟先生苟能以國計民生爲重，及今毅然決定大計，聲明願與日本停戰言和，根據近衛聲明之原則，以求其具體的實現，則兆銘與諸同志，必能與先生同心戮力，使全國和平早日實現。質而言之，國家民族之存亡禍福，繫於此舉。現在先生在重慶，集大權於一身，和戰大計，惟先生一言可決，所責於先生者重，故所望於先生者厚。不避冒瀆，佈此腹心，惟垂察之，幸甚。汪兆銘銑。

（二十九年一月十六日）

下  
卷

## 在青島會談各次談話

### 一、和平運動之真義

汪主席抵青島後，於二十二日下午五時接見中外記者，發表談話，對於和平運動，有以下幾種見解。

其一，和平運動，乃是從東亞大局着想，確有見於中日兩國非和平不能共存共榮，並非以戰敗之故，避難苟安也。

其二，和平運動，乃中日兩國百年大計，應從共存共榮之見地，深植其基礎，並非求一時之寧息也。

其三，和平運動乃是從一種主義，一種信仰出發，確有見於中日兩國，戰爭則兩敗俱傷，和平則共存共榮，故不避艱難，不恤犧牲以赴之，並非出於權謀術數之觀念也。

余抱有此種見解多年。自近衛聲明以後，知日本朝野已有共同主張。日本以保障東亞責任，並屬望中國分担此責任，余知此種理想已有實現之可能，故與同

志共致力於和平運動。余深知中國當戰敗之後，武力及其他勢力，皆不可恃；但余確信欲實現真實永久之和平，必須有正大之主義與熱烈之信仰，由此主義與信仰而發生之勢力，始為真正之勢力，始為和平運動堅實之基礎，此須仰賴於全國民衆，尤其青年有志之士，共同認識，共同負荷。和平運動必須得此基礎，乃能遂其發展而不虞其中途變質，而武力及其他勢力，不過此基礎之附屬物而已。必如是，和平運動始有其價值，而不致流為權謀術數之末也。余深信此種主義及信仰必因和平運動逐漸進展而逐漸深入人心，以完全達到吾人所負之使命，所抱之目的也。

## 二、法統問題

汪主席於二十四日第一次會談終了後，發表法統問題之談話如下。

中日事變，漸趨鎮靜，吾人當集中全國力量，以樹立中央政府，而樹立中央政府所首應考慮者，即為法統問題。

蓋中國如欲樹立全國統一之中央政府，其方法有二：其一廢棄舊法統而另建新法統。此法似近乎革命方式，實行雖並非不可能，但我人認為不必要；蓋無論

如何，此次事變，由於過去國民政府政策之失當，並非由於政制之不良。故目下收拾時局之目的，在對外求和平，並非對內求革命，政策有所失當，自當充分加以修改，政制卽有未盡善之處，亦只須適當改正而已足，因吾人並無根本推翻原來法統，徒使惹起混亂之必要也。其二卽承襲舊法統而略事修正之。過去國民政府法制之所以被人非難者，乃由於推動全國政治之中央政治委員會之構成分子，祇限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並無黨外人士之參加，致招外界謂爲一黨專政之嫌。去年中國國民黨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有鑒於斯，對斯制度，特議決加以改善，在大會宣言中，已表明此旨。由是今後中央政治委員會，已非國民黨一黨獨占；凡各合法政黨及全國賢能之士，均能依法參加，協力商議政治。此卽實施憲政之初步，同時矯正過去政制缺點者也。重慶政權，現遭共黨壓迫，已喪失自由行使職權之能力。基於中央政治會議之決議，將依法加以改組，如能照舊執行政務，完成和議，則對於法統政策，已屬毫無缺憾，一方預定於最短期內，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如能實施憲政，正如輕車之就熟路，當能順適前進，比諸改革政制，徒惹糾紛，豈非計之得乎？

### 三、三民主義之真諦

一月二十四日第一次青島會談席上汪主席講述三民主義之真諦，大意如左。

三民主義爲救國主義，蓋欲使中國以次殖民地之地位解放出來，以得到國家之自由平等也。以民族解放言之，則爲民族主義；以政治解放言之，則爲民權主義；以經濟解放言之，則爲民生主義。三民主義爲救國主義者如此，然與東亞主義世界主義並不相違。蓋其基本精神，以中國固有道德出發，以和平爲信條，不以侵略爲能事，故謂之王道，而非霸道。中國必得到自己之自由平等，乃能爲東亞之一員，及世界之一員，此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義也。孫先生逝世後，卽其黨徒，對於三民主義之見解，已不一致。此殆不獨三民主義爲然，凡一種主義流行之後，鮮不發生如此之現象也，至於黨外人之誤解，亦固有之，而共產黨人之曲解，則爲弊尤烈，所以三民主義之解釋，實爲必要也。民族主義非狹隘之國家主義，民權主義非個人自由主義，民生主義與馬克斯共產主義不相同且不相容，此爲三民主義之信徒所當努力解釋者，故余於此次會談中，曾根據所信，加以關解。

#### 四、高陶事件

二十四日下午汪主席接見路透社合衆社記者，對高陶在香港發表所謂文件，發表如次之談話，斥其謬錯。

陶希聖，高宗武皆爲最早參加和平運動之人，惟自去年三月廿一日，曾仲鳴同志在河內被刺之後，此二人卽呈怯懦之狀。余在河內曾屢電高宗武往晤，皆不敢往，同志間已不齒其爲人。陶希聖優柔寡斷，搖動失志，與高相同。余因其爲最早參加之同志，故仍曲予優容。及至去年十一月間，余發覺其跡可疑，故關於重要之折衝，已不使其參預。今此二人，竟竊取去年十一月五日，日方在華一部分人士之試擬方案，居爲奇貨，與渝方勾結。是不止怯懦怕死，且易受各種誘惑，自喪人格，實屬卑鄙，殊堪痛恨。惟任何運動中，此等敗類，本不可免，其結果不過淘汰自己而已，於大局無損。余從事和平運動，乃在中國戰敗之際，又在渝方受共匪劫持之際。余愛中國，余堅信中國今日，除和平別無自救之日，且和平運動，已由發展而趨於成功。卽退一步言之，在此國破家亡之時，欲圖挽救，不可不存自己犧牲之決心，抗戰而失敗，則負抗戰失敗之責任；和平運動而失敗，則負和平運動之責任。決無所容其首鼠兩端，徘徊歧路。余及余之同志，皆決心猛力前進，對於此等中途變節之徒，固極痛心，然只有益堅其負責之念；且

此等變節分子，懷貳已久，一旦引去，將益見和平運動之純潔而光明也。至於和平方案，最近因中日雙方皆為兩國百年大計，及東亞前途着想，互相諒解，互相讓步。其結果可使中國得到復興基礎，並可以其能力，分担東亞和平與秩序之責任，與高陶所發表及附加捏造之文件，大不相同，將來可以事實證明之。

### 五、青島會談之意義

廿六日為青島會談之第三日，會談畢後，汪主席發表談話，說明此次會談之意義及此後之希望。談話原文如次：

去歲九月杪，鄙人會赴南京，與王委員長，梁院長，會談關於收拾時局之辦法，均趨重於實現和平，實施憲政。第一次之會談，已略具端倪，今進而為第二次之會談，所得結果，更為圓滿，蓋中央政治會議之組織，已經彼此同意，此中央政治會議，將由中國國民黨聯合各已成政黨暨全國賢智之士，共同組織，一掃過去參差隔閡之弊，同心協力，以肩負收拾時局之責任，並對於實現和平實施憲政之原則予以決定，俾由此生產之中央政府得以根據進行。深信自此以後，全國人民，必能一心一意向此共同目標而共同前進，對外則努力於樹立中日親善關係

，並與各友邦敦睦邦交；對內則努力於戰後建設，修明政治，解除人民痛苦，則此次青島會談，實可稱爲和平運動之一大進步與發展也。



## 志 深 勇 沉

(二月二十日在中央陸軍軍官訓練團學員畢業典禮訓詞)

各位武裝同志：今天是中央陸軍軍官訓練團學員畢業典禮，兄弟有幾句話，對各位說一說。各位在這裏，從事訓練，從事研究，已經有好幾個月了，現在已經畢業了。在這個時候來修學，已經很不容易，在這個時候來畢業，更不容易。而且畢業之後，各位就有許多的任務，放在自家肩上，所以我們感覺到今天是一個很可紀念的日子。所謂任務是什麼呢？是和平反共建國，這個任務，非常之重大，亦可以說是非常之困難，各位今天是要擔負這個很重大的任務，而且是很困難的任務。我想到這裏，臨別贈言，實有無限的話要說。如今我只能把校訓「智深勇沉」這四個字說一說，作爲今天畢業時對各位的一種懇切的祝賀與勗勉。「智深勇沉」這四個字，我們一定要從對像看一看。「智深勇沉」這四個字的對像是在那裏呢？深字的對像，就是淺薄。沉字的對像，就是浮囂。淺薄浮囂，可以說是現在中國國民一個很普通的毛病，尤其是中國軍隊以及同軍隊有關係的人一

個最重大的毛病。我們承認現在的國民，比從前二十年或者幾十年前，是比較已有愛國心的，這句話我們承認的。但是我們要知道，這個愛國心還是很淺薄的，並且還是很浮囂的。一個淺薄而浮囂的愛國心，是不能支持得長久的。勉強支持下去，恐怕也不能把國家救回來的。我們因為感覺到淺薄兩個字不够救國的，所以我們要智深，浮囂兩個字不够救國的，所以我們要勇沉。我們知道我們救國的工作，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們因為經濟落後，各種的落後，在最近一百年來，已經讓歐美各國往前，而且也讓日本往前了，我們是落後了，這一點，大家都知道，這個落後，是個很大的危險。今年是一千九百四十年，我們想一想，一千八百四十年，是剛好一百年。那時候，中國是怎麼樣呢？各位：正是鴉片戰爭大敗的時候，這回鴉片戰爭是中國第一次和歐洲各國戰爭的一個大失敗，到現在，剛好一百年了。在這一百年之中，我們軍事經濟政治文化，樣樣趕不上歐洲，弄到變成歐洲的半殖民地，總理說是次殖民地。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的國家，要救回來，很不容易。爲什麼呢？拿一個落後的國家，和一個先進的國家來競爭，自然是很不容易的。偏在這個時候，又來東方的日本，他也先進了，他和我們離得很近的，在這樣的時候呢，中國當然除了做歐洲次殖民地之外，還有另外一

種危險，這種危險，是避不了的。我們如果是說同日本戰爭，這也試過了，甲午那年，還不是一個大失敗，這是爭不過來的事實，政治軍事文化經濟，樣樣落後，爲什麼不大失敗呢？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已經淪爲次殖民地，甲午戰爭之後，中國又添了另外一種危險。在這個時候，要把國家救回來，是很不容易的。大家應該曉得，在這樣的環境，這樣危險的環境裏頭，是不是憑一點淺薄的愛國心，憑一點浮囂的愛國心，就可以挽回來呢？因爲不能，所以有今天，我們承認中國已經有了愛國心，但是我們同時承認，這種愛國心，還是很淺薄，還是很浮囂，這樣的淺薄浮囂不能夠把國家救回來的。爲什麼說是浮囂呢淺薄呢？我們舉一個例，各位試把甲午年的中國人那時候大概的說話，同現在的大概的說話，來比一比，看有多大的分別，有多大的進步。甲午年那時候，我十一歲，算到現在，已經有四十多年了。這四十多年之中，我們不承認愛國心有進步，不能夠。但是浮囂淺薄的程度，究竟差多少呢？我們看看那時候的出版品：什麼黑旗兵，掃平台灣，掃平東京，種種的話。我們再看看：九一八以後，尤其一二八以後，那時候的出版物，究竟差多少？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古直先生，他的文章，刊在廣州中山大學的叢書裏頭，一篇文章，是說十九路軍的事，他說：十九路軍在上海，戰

無不勝，攻無不克，如果那時候，中央政府添上三師兩師的兵去接應，十九路軍就可以打到東京了。各位試想想，這種說話，同甲午年有什麼分別？同所謂黑旗兵究竟差多少？各位試想想，十九路軍，是陸軍，他怎麼會打到東京？他坐飛機去嗎？我們算算，那時候我們有多少飛機？他坐兵船去嗎？我們算算，那時候我們有多少兵船？試問憑什麼打到東京去呢？但是這種的文章，是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做出來的，放在廣州中山大學叢書裏頭的。我不是批評古直先生一個人，也不是批評一個廣州中山大學，我是說，在這樣淺薄浮囂的愛國心之下，你有什麼方法，把國家救回來？然而這種的論調，是最受歡迎的，是社會上最喜歡聽，而且聽完之後必大拍掌的。所以從一二八以後，國家的危險，一天比一天深，而這種論調却一天比一天的高。

到七七事變以後，這種論調，更把人重壓到至於窒息了。游擊隊可以得到最後勝利，焦土戰可以得到最後勝利，這又同一二八那時候有什麼分別呢？同甲午那時候有什麼分別呢？還是一樣的淺薄，還是一樣的浮囂。為什麼這樣子淺薄呢？因為浮囂。為什麼這樣子浮囂呢？因為淺薄。因為這樣，有個愛國心，反而把國家害到不可救回。我們感覺到除非我們不重新救國則已，若要重新救國，一定

要把淺薄浮囂這四個字打破了去，我們才能够把國家救回來。所以我們用智深勇沉四個字來自己勉勵並互相勉勵。智同勇凡是軍人都曉得的，不過有智不夠的，智要深，有勇不夠的，勇要沉。先把深字來說，孟子有句話，說得最好，「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操心危，慮患深，才配做孤臣孽子，要不然連孤臣孽子都不配做。操心安，慮患淺，就配做孤臣孽子了嗎？現在我們中國，那一個不是孤臣，那一個不是孽子啊！如果慮患慮得這樣淺，你就能在歐洲各國這樣子強盛的時候，日本在東方這樣子強盛的時候，把國家救回來，有這樣容易的事！各位，孤臣孽子啊，操心危慮患深呀，各位，這是智深勇沉四個字裏頭，深字的意思。沉字呢，是沉着。各位你們將來的困難，是很多的，你們如果不沉着，你們就會很輕易的，便受了激動，你們就會很輕易便灰了心，餒了氣。各位，不怕死是勇，不怕難尤其是勇。中國歷史上，宋亡明亡的時候，不怕死的男子是有了，不怕難的男子却少了。說一個簡單的譬喻罷，一個人受了非刑拷打的時候，捱不住，便想一死了事，這一死了事，對自己是合算的，可是自己身上，如果有責任在，那就知道自己不是一死可以塞責了，便只有咬定牙根，忍耐得一分是一分了。各位，我是過來人，坦白的對各位說罷！我從前在北京獄裏

，受不住苦，想自殺多少次，但我只念一句咒，這句咒是「中國之將來」我就立刻鎮定起來，依然受苦。各位，我更坦白的對各位說，我現在的受苦，比在獄裏更利害，抬頭一看，滿中國還是浮囂淺薄的空氣，最純潔的，不過以死殉國便了，全不打算以死救國。我受着這樣浮囂淺薄的空氣，真個比在獄中求死不得更爲利害，但是我還念着一句咒「中國之將來」，我依然鎮定依然受苦。我勉強，要做到一個沉字，能沉着，纔能堅定，能堅定，纔能忍受一切困難，打破一切困難。各位，這是智深勇沉四個字裏頭，沉字的意思。自從九一八以來中國的輿論，自從甲午戰爭以來中國的輿論，自從百年前的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輿論，浮囂淺薄這四個字，足以盡之。我們要克除他，我們要救國，先要救自己，先要把自己從浮囂淺薄這四個字解放出來。

各位，今天舉行畢業典禮的時候，我不必再把和平反共建國的原理向各位說，因爲各位早已都聽見過了。我只想各位現在要把和平反共建國這樣子重大的任務放在肩上，而且各位必然會碰到許多困難，各位的困難，我想各位必須把智深勇沉這四個字確確實實的做到，各位纔能擔負這重大的任務，克服許多困難，而完成其使命。各位，終有一天，看見國家救回來，這個中華民國，是由各位手上

救回來的，是由各位智深勇沉的修養救回來的。（二十九年二月二十日）

智  
深  
勇  
沉

一九七



## 『和平奮鬥救中國』的心理建設

### ——總理逝世十五週年紀念辭——

『和平，奮鬥，救中國！』這是 總理孫先生逝世時的呼聲。這個呼聲，永遠震盪着我們的耳朶，而在紀念逝世週年的時候，震盪得尤其真切。

孫先生逝世時的環境，是怎樣的呢？我們先看一看那時候的國際環境：國際聯盟成立於民國九年，九國公約成立於民國十一年，一般人以為世界和平已有保障，東亞和平尤其得所憑依，孫先生則不但不認為滿意，而且認為絕對不可靠。孫先生大聲疾呼，說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指出中國現在次殖民地之地位，標出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為最大急務，孫先生為達到此目的，採取聯俄的政策，而且認定聯俄還不够，必須聯合日本共同努力。孫先生於北上的時候，特意繞道日本，講述大亞洲主義，盼望日本國民一致起來，担負團結亞洲民族共圖復興的重大責任。

我們再看一看那時候的國內環境：全國都在軍閥勢力支配之下，廣東號為革

命根據地，然東西北三江及南路，都是反革命勢力的地盤，即以廣州一隅而論，反側及動搖諸分子，亦已與反革命勢力相呼應，真是危如累卵，然而孫先生則於此時挺身北上，以開國民會議爲號召，不恤與一切軍閥勢力反革命勢力挑戰，務要達到民主主義之目的。

『和平，奮鬥，救中國！』這臨終的呼聲，表示出孫先生一生的抱負以及無窮無盡的熱誠與勇氣。凡是要做一個同志的不可不注意到這種心理建設。

如今中國的國際環境國內環境，更非孫先生逝世時可比了，眞所謂神州陸沉生民邱墟。孫先生在天之靈有知，不知如何悲痛，如何憤慨！有人說道：『孫先生如在今日，斷乎不會再和日本講大亞洲主義。』甚至有人說道：『現在中日兩國正在拚個你死我活的時候，却來講大亞洲主義，眞是說夢。』我細細尋繹孫先生全部遺教，覺得大亞洲主義，是不可磨滅的眞理。日本在東亞是先進國，無日本便無東亞；中國雖落後，但以其國家的地位，及其民族性而論，無中國便無東亞。這兩個國家，和平則共存共榮，戰爭則兩敗俱傷，這是不可磨滅的眞理。沒有戰爭時，應該如此提倡，有戰爭時，更應該如此提倡，這絕不是出於一時便宜的權謀術數，而是不可磨滅的眞理，我們惟有服從眞理，纔能發出無窮無盡

的熱誠與勇氣來擔當這責任。

我們在今日，固然無可安慰，然而還有一些安慰的，便是日本方面，了解孫先生主義的人比較十三年十一月孫先生繞道日本神戶講述大亞洲主義時，多得多了。『援助中國完成其獨立自由的國家之建設，』『復興東亞，』等口號，在戰爭中，從日本方面先喊了出來。有人說道：『這是權謀術數，這是包糖衣的毒藥』。我以為不然，這是從戰爭中經過反省而體認出來的真知灼見。日本方面，既然有了這樣的喊聲，我們中國方面，應該共鳴應該共同努力，攜手前進，掃除戰爭則兩敗俱傷之苦運，而達到和平共存共榮之樂境。

橫在這真理之前途的，有障礙沒有呢？有的。我們要以孫先生當日提倡國民會議的精神來驅除他，因為在這樣黑暗否塞的環境，只有用這種光明正大的手段，纔能將他驅除。

我們紀念總理孫先生，要繼承總理孫先生的心理建設：『和平，奮鬥，救中國』！

（二十九年三月十二日）



## 和平宣言

『中日兩國無論從何方面着想，均宜攜手協力進行，共謀兩國前途的發展』；『中日兩國當爲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原動力。』此爲手創中華民國 孫先生之言，同胞同志，皆當共喻，不幸中日兩國關係，歷年以來，未獲調整，終至戰禍勃發，擾攘連年。前歲十一月三日，日本近衛內閣發表聲明，謂『日本所望於中國者，在能分擔東亞新秩序建設之任務。』並於廣播中申述其意志，謂『日本之眞正希望不在中國之滅亡，而在中國之興隆，不在征服中國而在與中國協力。』並謂『日本認識中國之民族的熱情，承認中國之完成其爲獨立國家，實有必要。』復於十二月二十二日發表聲明，列舉所望於中國者爲善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並謂日本非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不吝進而考慮交還租界，廢除中國完成其獨立所必須之治外法權。日本政府有此聲明以後，中國方面瞭然知抗戰之不必繼續，和平之必當恢復，尤瞭然知中日兩國不僅當求消弭目前之戰禍，且進而根本除去過去糾紛之原因，重新確立將來之親善關係，於是和平運動漸次普及於

全國。去年八月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鄭重宣佈自今以後，易抗戰建國之口號爲和平建國，並鄭重宣佈以反共爲和平建國之必要工作。且鑒於個人獨裁之誤國，憲政實施之不容再緩。復鄭重宣佈，務於最短期間，結束訓政，開始憲政，使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議決者，得見之實行。數月以來，與日本朝野，披瀝誠意，根據善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之原則，使之爲具體的實現，務期兩方交受其益。復與國內各已成政權，各已成政黨暨賢智之士，悉心討論收拾時局之辦法，以一致之決意，爲共同之努力，由是有中央政治會議之組織，中央政府亦將緣是產生。自今以後，舉國人民皆在此統一而有力之中央政府領導之下，對外調整邦交，對內實施憲政，掃除歷年之紛爭與戰禍，而實現和平與幸福之新天地矣。關於對內實施憲政，吾人已訂立適合時勢之政綱與政策，務於最短期間完成此使命。關於對外調整邦交，吾人所釐訂之各種具體方案，全部公開，固有所待，惟吾人敢負責爲國民保證此等方案決不軼出近衛聲明範圍之外，且決不與其原則有所牴觸，於中國之獨立生存無所危害，於第三國在中國之正當權益，不惟無所傷損，且可因中國之和平恢復而得所保障，遂其發達。且中國恢復和平之後，除與日本爲經濟提攜外，並當依據建國方略之實業計劃，容納各國

之技術與資本，以求完成中國之建設，致東亞之繁榮，是則和平運動非惟中日之利，亦世界各國之利也。抑有爲國人言者，吾人之和平運動，當從切近方面與遠大方面同時探討。事變以來北平故都南京新都相繼失守，天津上海青島三特別市綏遠察哈爾河北山東山西河南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廣東廣西十三省會以次淪陷，將士死者數百萬，人民直接間接死於亂亡者數千萬，此眞宇宙之奇變，神州之浩劫，明亡以來未有之禍也。抗戰至今，兩年有半，所失據點，未聞有一處恢復，徒使孑遺之人民，日卽於淪胥，國民政府及中國國民黨同人負咎深重，雖粉身碎骨，不足以對國家對人民。苟危亡尤有可救，則挺身任過，與日本停戰言和，接受可以忍受之條件，以保存尙未耗盡之國力，收拾敗殘，重謀興復，實爲國民政府及中國國民黨同人應有之責任。誠不可把持權勢，脅迫民意，日日以抗戰到底，最後勝利自欺欺人，使國土愈蹙，國力愈耗，終至於不可救藥也。此就切近方面言之也。至於遠大方面：則此次之和平運動，不徒欲消弭目前之戰爭而已，必深求戰爭之原因，解除過去之癥結，重新建立將來之正鵠，使中日兩國得向於共存共榮之大道而攜手前進，中日兩國爲東亞之柱石，兩國相安，則東亞和平得所保障，而世界和平亦於以奠定其基礎。是故就切近方面言之，則救國家民族於

將亡，吾人不可不忍辱負重，以從事和平運動，就遠大方面言之，則致中國及東亞於復興，吾人尤當積極努力以從事於和平運動。兆銘服務國民政府，爲中國國民黨之一人，過去心力交瘁，對於不幸之戰事未能防止，及戰事發生以後，又未能挽回，撫躬省疚，日夕不遑，去年以來，竭其忠誠，向重慶同人致其呼籲，乃未蒙聽納，惟兆銘默察今日全國人民皆希望和平，了無疑義，所懷疑者，特和平之能否實現而已。用是不揣固陋，集合國民政府及中國國民黨同人，並聯合各已成立政權已成政黨暨賢智之士，同心協力，以担负和平運動之責任，務使全國人民所希望之和平能一一實現。茲因中央政治會議組織詢謀僉同，成立有期，爰以和平運動之真意及和平方案之要旨，昭告海內：自此以後，中央政府必以實心實力謀和平方案之實現以底和平運動於成功，所望全國同胞，咸喻此旨，同心同德，荷此艱鉅，並望重慶方面拋棄成見，立即停戰，共謀和平方案之實現，更能普遍而迅速。救亡復興，實基於此。血誠耿耿，惟共鑒之。

（二十九年三月十二日）

## 國民政府還都的重大使命

各位同胞，今天是兄弟回到南京之後，第一次同各位同胞說話，說話的時候，心裏頭有無限悲痛。想起過去，看到現在，心裏頭有無限的悲痛說不出來。不過我們對於將來，也有無限的光明。我們應該提起勇氣，把光明來天天擴大，這樣，我們從前的悲痛，才可以慢慢的減少，今天兄弟所講的題目，是『國民政府還都的重大使命』。這一回國民政府爲什麼要還都呢？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看得出來，從前各人就各地來做和平運動，現在統一起來做和平運動。和平運動，拿什麼做目標呢？就是實現和平，實施憲政。這兩個大方針，是和平運動最大的目標，也就是國民政府還都最大的使命。關於怎樣才能夠實現和平，在三月十三日早上我有一篇宣言，在報上登過，是要根據日本近衛聲明，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的原則，來調整中日的關係。我並且確實聲明我們所有的和平方案，不會超過近衛聲明的範圍，大概我們各位同胞，都已經看見過這一篇宣言了。同一天晚上，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米內有聲明，這個聲明裏頭的說話，也是一樣的意

思，也就是拿近衛聲明做中日調整邦交的基礎，大概各位同胞，也看見了。看見了近衛聲明之後，有米內聲明，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多年以來日本方面，關於中日和平運動是一貫的，中間並沒有什麼參差，並沒有什麼變更。再看見了前年十二月廿九日兄弟的豔電，以至於最近三月十三日的宣言，我們也就知道這多年以來，中國方面，關於中日和平運動，也是一貫的，沒有變更，沒有參差。這樣我們的路線是看清楚了，這樣就要走上這條路上去。因為有了路線，我們不去走是沒有用的。現在國民政府爲什麼還都呢？就是要來實現這種和平的主張，換句話說：就是要走上這條路線去。從前只是主張，現在却是實行了，要把裏頭個個字能夠實行，這就是關於實現和平一個大概的意思。關於實施憲政，中央政治會議，已經決議了，在國民政府還都之後，就設立憲政實施委員會，務要於最短期間，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一個實現和平，一個實施憲政，一個要來謀中日關係的調整謀東亞和平與秩序的建設，一個要來完成中華民國的建設。這兩件事情，都是很重要的。國民政府還都以後，一切對內對外的政策，都是根據這兩個大方針去做。國民政府爲什麼要還都，就是爲此。我們要把這幾年以來百姓的痛苦，國家的危險，能夠速除，就要靠實現和平，實施憲政。實現和平實施憲政能

否做到這一點，國民政府的同人，願意同我們全國的同胞，同心同德，往這條路上走去。關於實現和平實施憲政，這兩個大方針的內容，我們從前說過很多，今天只是這樣子簡單同我們各位同胞說一次。現在我們所要說的，是從今天以後，和平運動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了。因為以前和平運動是各地方做的，現在是統一起來，在國民政府領導之下做的，可以說是一個新的階段。從今以後，我們看見國裏頭，所有主張和平的人，都在一塊了，剩了少數反對和平的人，這種反對和平的人，我們盼望他們將來也一樣加入這個和平運動。我們天天在等他們，我們天天在想方法感動他們，就算他們對我們有什麼誤解，有什麼曲解，甚至至於污蔑種種，我們都不管，大家都是同胞，只要他們早一點過來，全面的和平，就早一點實現。他們的反對論調，說來說去，總是說我們如果在日本軍隊沒撤去的地方來組織政府，是沒有用的不會有力量的，這一句說話，好像是對的，實在是不對的。我們不能等到和平已經實現之後，才來組織政府。因為和平能否實現，要看我們能不能努力於和平運動，能不能努力調整中日關係，能不能大家走上新的光明的大路。所以我們必須組織政府，把實現和平的責任，擔負起來。這樣才有真正的和平，不然，和平是不會實現的。我們知道，我們的前途，一定還有種種

困難，我們知道，我們一定還有種種不能十分順手的事情。但是這種困難，這種不能順手，是那一個給我們的呢？就是這些反對和平的人給我們的。如果他們能了解和平運動的意義，能接受國民政府的命令，而受其領導，則全面的和平，自然可以實現。目前全面的和平不能實現，完全由於他們的阻礙，所以我們絕不能說全面的和平沒有實現，我們就不去做和平運動。這句話，是不通的。做了和平運動，全面的和平，才可以實現。不是全面的和平實現之後，再去做和平運動的。對於這一點，我想重慶方面唱高調的人，自己要想一想。我們始終都是誠心誠意，盼望全國了解和平運動的人來了解，盼望反對和平運動的人來贊成，當然我們不能等他，他不贊成，我們自己先做。我們在理論上說明白，給我們的同胞聽，我們還要努力在事實上做去，來給我們的同胞看。那麼，我相信和平運動一定能够發展，並且一定能够普遍。沒有什麼人，可以妨礙我們的國民政府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們老百姓心裏頭所盼望要做的，國民政府的心事，就是老百姓的心事，國民政府的使命，就是要把老百姓所希望的事情，能够實現出來。這一點盼望了解和平運動的人，多出一點力，多做一點理論，多做一點事實，不了解和平運動的人，也得要回心轉意，大家走上這條路上去。這一回國民政府的使命，是

要實現和平，實施憲政，這樣重大，所以關於國民政府的組織，我們商量了很久。我們現在盼望林主席早一點回到南京來，在他沒有回來以前，我們只好照着中央政治會議的決議，努力去做。關於國民政府的組織，和從前差不多的。關於行政院，各位已經看見所發表的組織的內容了，因為要容納各方面的人才，所以這一回機關，好像多一點，不過細細看去，就曉得並不是多。我們舉兩個例：一個是宣傳部，一個是社會部，社會部從前叫做民衆訓練部，關於工人農民商人學生婦女各種民衆的訓練事情，現在叫做社會部。這兩個部，從前行政院沒有的，好像我們現在添了兩個機關一樣，不過大家曉得，這兩個部，從前就有的了，不過從前是放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裏頭，中央黨部第一個部是組織部，第二個部就是宣傳部，第三個部就是社會部，這兩個部從前是放在中央黨部裏頭，現在移來放在行政院裏頭，這並不是多設這兩個機關。一方面來看宣傳是很重要的，是要全國的人民了解政策，了解主義，是很重要的，訓練民衆也是很重要的，從前放在中央黨部裏頭，也是有道理，不過那時候，百姓已經有一點感覺不便當，譬如一個商會，因為民衆訓練的事情在黨部，商會常常要同黨部接頭，同時還要向政府接頭，大家就感覺到好像多一層隔閡，現在直接交給政府，還要便當，這是一

個道理。還有一個道理就是現在國民黨打算放棄一黨專政，既然放棄一黨專政，把這宣傳部的大權，把這民衆訓練的大權，放在中央黨部裏，怎樣可以表示不是一黨專政呢？因爲這樣子，我們把宣傳部，把社會部放在行政院裏頭，一方面免除兩重政府的隔閡，一方面免除一黨專政的嫌疑，這是一個例。還有一個例，就是各種委員會，僑務委員會，振務委員會，邊疆委員會，從前是有的，至於水利委員會呢，好像我們又添一個新的機關一樣，不過水利委員會的設立，不祇不是添機關，倒是省去許多機關，因爲從前有導淮委員會是直屬於國民政府的，還有一個黃河委員會，也是直屬於國民政府的，還有一個廣東治河委員會，有時直屬於國民政府，有時屬於廣東省政府，還有一個揚子江水利委員會，則屬於財政部。先就水利一想，已經有四個了，導淮，黃河，廣東治河，揚子江水利。此外一時還說不盡，這樣東一個機關，西一個機關，南一個機關，北一個機關，幹什麼呢？從前我們要改革種種人事問題，解決不了，現在綜合起來設立一個水利委員會，不是添機關，是省機關，大家曉得的，現在水患很厲害，水利機關是不能不設立的。但是爲什麼不叫水利部而叫水利委員會呢？是因爲全國要治的水太多了，所以設委員會，多一點委員來共同負擔，而將來還要分派出去。不過機關是一

個，不像從前那樣子分做幾個，這又是一個例。綜合兩個例說來，表面上好像我們添了宣傳部，社會部，水利委員會，添了許多機關，實際上並沒有添，不祇沒有添，而且還省了。還有一點，我們於設立機關之後，打算機關的經費，努力使他減少，機關的事業費，努力把牠增加，就是人才我們固然要延攬，但是一切的日常經費，能够省多少，就要省多少，不要使國家有駢枝的機關，不要使機關之內，有浮濫的經費，這是政治上最要緊的。現在國家這樣危急，這樣困窮，地方這樣的分崩離析，人民這樣的顛沛流離，我們是不能够有一刻可以安心的。爲這樣子大家才不顧一切的困難，來担负這個責任。我們相信每一個國人，都是拿着廉潔勇敢的精神來替百姓服務，我們最大的希望，第一，是把全國普遍的和平實現起來；第二，是把中華民國的建設完成起來。我們要達到這重大的使命，我們只有拿着廉潔勇敢任勞任怨的精神來打破一切困難，我們打算一切的事情，如果有人來擔任的時候，我們都擔任起來，我們不管多少，要擔任我們就擔任，如果是好的人才，比我們好的，我們立刻退讓，請他來擔當。我們再說一遍，就是一切事情，沒有人來擔當的時候，我們挺身來擔任，我們絕不推諉。但是如果比較我們好的人才來的時候，我們立刻退讓，我們絕沒有一點留戀。例如海軍，

中國的海軍，是不堪言的，但是中國不能不注意復興海軍的，因此我們在這種破碎的時候，並建設海軍部，但是海軍部長的人選，如果一時不能確定，只好仿照各國內閣的例，由內閣總理暫時擔任，等到人選確定之後，後來讓賢與能，這不只兄弟一個人如此，兄弟敢說，我們這次出來，在國民政府服務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如此的。例如軍政部參謀本部，軍事參議院軍事訓練部，現在擔任的人，其資格其才力都是勝任的，但是他們都願意以次或副的地位來代理。一方面表示負責，一方面表示讓賢，這是我們同人共同的心事。還有一件，現在社會生活這樣的艱難，老百姓連米都沒有得食。一切的生意，都有許多的障礙，我們一方面要替老百姓解除痛苦，一方面要和老百姓共甘苦。我老實告訴大家：在政府的人，有時公式的宴會，是免不了的，但是我們盼望我們除了公式的宴會，我們的宴會愈少愈好。爲着大家有機會見面，多說話，也許我們在一起食晚飯也不定，但是我們盼望愈早愈好。我們唯有能够刻苦，我們才能夠廉潔，唯有廉潔，我們才能夠勇敢。不刻苦的人，不能廉潔的，不廉潔的人，不能勇敢的。我們同人時時刻刻以此自勉，以此共勉。我們要有這樣精神，我們才能夠把國民政府還都的重大使命來達到。今天所說的話，共總分四段：第一段國民政府還都的使命，在實現

和平實施憲政。第二段，我們盼望這和平趕快普遍於全國。第三段，說明白組織機關的理由，要有這種機關，才能够擔任這個使命。第四段，說明白我們在機關服務的人應該拿廉潔勇敢任勞任怨與老百姓同甘同苦，同生共死的精神做下去，我們才能够擔起國民政府還都的重大使命。

（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廣播演詞）



## 國民政府還都對日廣播詞

今日爲國民政府還都南京之日，鄙人謹代表國民政府同人，以滿腔誠意，告於日本朝野人士之前。中日兩國爲掃除過去之糾紛，建立將來之親善關係，不可不有共同目標，以共同前進。前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貴國前總理大臣近衛公爵聲明於前；今年三月十三日，現內閣總理大臣米內大將聲明於後，其所主張始終一貫，而貴國輿論對於此主張亦趨一致。蓋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其基本精神，在使東亞諸國家民族各得本於自由獨立之立場，以爲親愛和平之合作。所以貴國在此次戰爭中，毅然不以戰勝者自居，而提出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爲調整中日關係之原則；且對於中國剴切聲明，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不僅尊重中國之主權，且不齊進而援助敝國完成其爲獨立國家所必須之條件；如廢除治外法權，交回租界等等；蓋貴國所切望於敝國者，爲迅速完成其現代國家之建設，以分担保障東亞之責任，蓋必如是，然後中日兩國始得以共存共榮，而東亞之和平與秩序始得以確立也。敝國有志之士，自矜悉貴國朝野此種重大之主

張，深知中日兩國其於東方之道義精神，基於兩國人種上地理上歷史上文化上之種種關係，應向此共同目標，而共同前進。敝國有志之士經過深切猛省後，痛下決心，將過去容共抗日之政策澈底放棄，重新確立和平反共建國之政策。國民黨同人服務於國民政府者，先後退出重慶，聯合事變以來全國各處先後成立之政權，以及在野各黨派賢達之士，相與協力，成立中央政治會議。由中央政治會議議決，國民政府還都南京，以統一全國以內和平反共建國之運動。在此運動進行期間，得到貴國朝野熱烈之同情與援助，遂得到達於今日之新階段，鄙人於此，敬為中國前途，向貴國朝野表示深切之謝意。鄙人及國民政府同人，以後惟有繼續努力，使和平反共建國之運動更普遍於全國。鄙人深信此運動若底於成功，則中國之國家民衆得到解救，中日兩國關係因調整而得到共存共榮，東亞之和平與秩序得到永久堅固之基礎。鄙人等願以最善之努力，達到中日兩國之共同目標。鄙人等並願藉此機會，以滿腔誠意，祝貴國朝野人士之幸福。（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

## 和平反共

和平所指，是中日和平，因為中日和平，東亞纔得和平，而世界和平亦於此奠其礎石。

所謂和平，有兩方面意義：一是思想方面，必須有明確的正大觀念，日本爲欲求得永久的真正的和平，所以不以戰勝者自居；中國爲欲求得永久的真正的和平，所以雖然戰敗，却不是屈服，而是在保持國家主權之獨立自由範圍內，與日本共同致力於中日關係之調整，掃除過去之糾紛，確立將來之親善關係，使此兩大國家兩大民族得遂其共存共榮之發展；這不是一時的權謀術數，而是一種堅定的信仰，正確的主張，一般國民必須立此信仰抱此主張，永久的真正的和平，纔能實現，這有待全體國民之覺悟，尤有待於青年之覺悟。二是行動方面，所謂經濟提攜，就提攜二字望文生義，已可知道殘廢的人，不能講提攜，束縛着手足的人，也不能講提攜。所以獨立自由的立場，和精誠合作的表現，二者如表與裏，缺一不可。中國號稱以農立國，而米麥二者，尚須大量仰給於外國，故農村復興

，實爲一切復興事業之最先者。然中國必非以農業國爲滿足，須進而爲工業國，始能立足於世界；因此與日本經濟提攜，愈感必要。當本於互惠平等之精神，長短相補，有無相通，使人才資本資源三者，得到合理的調劑與發展，中國必須這樣才能脫離經濟落後的苦趣，拔出於次殖民地惡境而成爲現代的國家。

所謂反共，亦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思想方面，十餘年來，中國青年爲共產宣傳所陶醉，但是到了今日，應該豁然夢醒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連在蘇俄也不能實行，所謂新經濟政策，兩次五年計劃，離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已不知多少遠。至於所謂扶助世界弱小民族，解除壓迫，在瓜分波蘭，侵佔芬蘭兩次戰役中，更已粉碎無餘了。要救中國，救東亞，救世界，除了實行孫先生的三民主義更無別路；這是一般青年所應當注意的。一是行動方面，自從十六年以來，中國國民黨竭其全力從事剿共，到了二十五年十二月，共產餘孽快要淨盡了，忽然來一次西安事變，使他死灰復燃，再加上蘆溝橋事變以來，更給他一個發展的機會，他所謂遊擊戰，其實即是明末之所謂流寇。如此下去，民窮財盡，國亡種滅，是無可避免的。從前的剿共方法，有些可以照用，再加以新的方法，定能很迅速的，並且很經濟的，就可以將他滅絕。

（二十九年四月九日在北平廣播）

## 和平反共建國運動之新階段

去年八月九日，我在廣州曾經向各位同胞廣播，有以下的幾句話，『如果在前方後方的行政當局，以及帶着軍隊的人，能有贊成和平的表示，則日本軍隊必不會進攻；因為日本政府已有聲明在前，盼望中國有同憂具眼之士，出而收拾時局，以復興中國，以進而分擔復興東亞的責任。因此，日本軍隊決不會向着我們和平反共的地方及軍隊進攻的；現在我在廣州與安藤最高指揮官會晤，關於怎樣實現和平，彼此披瀝誠意，其結果使我確信，如果廣東方面的軍隊，有和平反共的表示，安藤最高指揮官，必能以極友好的考慮，實現以下幾件事，即是，不僅對於這種軍隊，立刻停止攻擊，而且更進一步將日本軍隊已經佔據的地方，所有治安警備，以及行政經濟，都從日本軍隊手裏，次第交還中國；因此我今日敢公開約束，如果廣東方面的行政當局和軍隊，能贊成我的和平主張，則我必能得安藤最高指揮官的同意，先在廣東做起部分停戰，而以次及於全國，使全國和平得以完全恢復，尤其是對於廣州市民，我敢說在最短時間，必能以廣州市還之廣州

市民之手，使廣州市成爲比較去年十月以前更有秩序，更有幸福的地方；」假使當時，那些人肯聽從我的話，則到如今，在廣東方面的和平運動，定然有很大的進展，像南甯那樣戰事，毫無意義的，犧牲了無數的國力民力，而得不到一點代價，那更不會有，如今想起實在痛心；但是這些人想做和平運動的障礙是不可能的，和平運動隨着人心局勢的必要而日益進展，到了最近，全國各處的和平運動，已經統一起來，在國民政府還都之後，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了，由這階段以至成功，是必不遠的。況且廣東在歷史上是革命的根據地，更應該由廣東先就和平反共建國運動做出一個模範來，日本當局的意思，直至今日，並沒有一點改變，尤其使我們覺得在廣東做出一個模範，在短期間必能實現：我此次再到廣東，爲的是向大家說的這種用意，我如今就和平反共建國運動，提出以下三點：

（一）和平反共建國運動，要組織化，和平兩個字是有內容的，從思想說，是睦鄰友好；從行動說，是經濟提攜；至於反共，從思想說，是打破馬克斯的共產主義；從行動說，是防制共產黨的擾亂，至於建國，從思想說，是信仰三民主義，從行動說，是要完成現代國家的建設；這樣說來，責任何等重大，每一個民衆，應該負起這責任，就應該參加和平反共建國運動的組織，每一個民衆，必須知

道和平反共建國運動，是切己的利害，小之是一己，大之是國家民族，都要靠這個運動成功，方有出路。自從去年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標出了和平反共建國的口號，並且聯合全國各黨各派，無黨無派，向着這共同目標而共同努力，這是替民衆打開一條出路；但是這條路之光明燦爛，必有待於民衆之參加，必須民衆各個都成爲這運動之一員，然後這運動才能充實而有效。

(二)和平反共建國運動，要有訓練，我們從事和平反共建國運動，首須有明確之認識，其次須有精密之訓練，舉個例來說，經濟提攜是以兩利爲目的的；如果只是一方有利，便無所用其提攜，認定經濟提攜，是兩方有利，這所謂明確的認識，已經有了認識。如何能使這認識實現呢？這便不能不有待於訓練了。有些人因爲沒有訓練，不能實現經濟提攜，因此便懷疑於經濟提攜之不能實現，這是不對的。我們儘可找幾件經濟合作的事情來做模範，使兩方的人知道合作是兩方有利的。但是兩方的長處要彼此知道，兩方的短處也要彼此知道，發現長處便要互相引重，發現短處便要互相修改，這樣合作事業才能發達，才能兩方有利，這是不待勉強的。但這是非有訓練不可的，沒有訓練，無從實現經濟提攜，不但經濟提攜如此，即一切軍事外交文化等等，亦莫不如此。

(三)和平反共建國，要有宣傳，我們相信現在全國的人，沒有一個不想和平的，但是同時沒有一個不懷疑和平之能否實現的，這裏頭有待於事實的證明，同時有待於宣傳，尤其是廣東因為僑民遍於美洲南洋各地，僑民的言論行動，往往與內地人民以影響，而僑民本身，一來受當地惡意的利己的宣傳，二來受了重慶方面自欺欺人的宣傳，以至矇蔽事實，對於和平反共建國運動，曲解誤解，實在不少；所以我們要創造事實，同時要本於事實作忠實的宣傳。

以上和平反共建國運動在組織方面，訓練方面，宣傳方面，應該注意的所在。現在為和平障礙的，除了自欺欺人的抗戰到底的論者外，還有兩種：第一種是生成搗亂的脾氣，在抗戰的陣線裏，竭力搗亂抗戰；在和平的陣線裏，便竭力的搗亂和平；這種人比起自欺欺人的抗戰到底論者，罪惡實在相等；第二種是生成悲觀的脾氣，對於抗戰動不動搖頭說沒有出路，對於和平也動不動搖頭說沒有出路，這種人最高等的，只有自殺，此外便只有閉門。

在國破家亡的時候，竟會忍心害理的說，不問時事，尤其下流的便索性逃到外國，躲在租界裏去，須知道中國到了這步田地，我們不能不替國家民族，找一條出路，抗戰到底的自欺欺人，如今已到了不唯不能欺人，並且不能自欺的地步

了。那麼，除了和平找一條出路，還有什麼辦法？我們知道現在全面的和還沒有實現，我們也知道和平反共建國的前途，還有種種的困難；但是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是日本所標示的調整中日關係的基本原則；日本的希望，不在滅亡中國，而在使中國興隆，俾能與日本共同負擔復興東亞的責任，這是日本對於東亞新秩序的主張解釋，這些已成爲日本的國策，日本的輿論，我們決不能加以漠視，加以曲解，我們也要定一種國策，也要做成一種輿論，以謀與日本合作。和平反共建國的主張，是從此而來的，國民政府還都南京，是爲貫徹此主張的，我們要救中國於滅亡，要復興東亞，捨此實在沒有第二條路；兄弟此次在國民政府還都之後，在百忙中來到廣州，爲的是向廣東父老子弟，諸姑姊妹說明這種用意；這種用意，和去年八月九日廣播的說話是一樣的，我們站在廣東人的地位來說，要復興廣東；站在中國人的地位來說，要復興中國；站在東亞人的地位來說，要復興東亞。

（二十九年四月十三日在廣州廣播）



## 實現和平實施憲政

本日兄弟來到武漢，承各界同胞如此歡迎，實在十分感愧；因時間短促，不能一一接見，特借廣播機會，和各界同胞說幾句話。當三月二十日中央政治會議，在南京開會之際，何省長前來參加，表示同心協力，完成實現和平，實施憲政兩大工作。兄弟在國民政府還都南京之後，前來此處，也爲的是向各界同胞，表示同心協力的最大希望；想起二十六年十二月國民政府由南京移至武漢辦公的時候，德國大使會傳達日本政府，關於和平的條件，其詳細情形，兄弟在舉一個例文中，曾經說過，當時如果做到，和平已經開始，中日兩國保全了許多人力物力，到了現在，全面的和平，早已實現；并且中日兩國人民，早已享到和平的幸福了。想起來實在痛心，過去是挽回不來的了，對於現在，對於將來；加強努力，以期和平之早日到來，實在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所謂和平，最大意義是在思想上，及行動上之改造，所謂善鄰友好，是掃除過去兩國間之猜嫉，本於共存共榮的原則，重新改造出一種誠信親睦的關係；所謂經濟提攜，是掃除過去兩國

間之懷疑隔閡，本於互惠平等的原則，重新改造出一種有無相通，長短相補的關係。而所謂共同防共，則是達到以上兩大目的之必經途徑。兩國人民，認真如此做去，定能使東亞現出和平幸福的新天地，所謂調整中日關係，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皆是從此出發的。我們應該以積極的，樂觀的精神，共同前進，武漢是全國東南西北交通的一個重心，武漢民衆的思想行動，其及於全國的影響，至深且切；兄弟此次到來，無多說話，第一是希望武漢民衆對政府同心協力，掃除和平的障礙，其掃除的方法，最好是依照國民政府還都宣言，各前線的軍隊，必須即日停戰，以待後命；散在各處的游擊隊，必須聽候政府點驗收編；這樣才能使地方安靜，共匪無所憑藉，自然容易消滅了。第二是希望武漢民衆，和政府同心協力，奠定憲政的基礎；現在國民政府，已有明令設立憲政實施委員會，要在最短期間，召集國民大會實施憲法兩件大事，籌備完成，政府既有此決心，所需要的是民衆的了解，和擁護以上兩個希望，兄弟願與武漢民衆，以最大的努力，共同達到。

(二十九年四月十七日在漢口廣播)

## 罪己的精神

——全國民衆慶祝國民政府還都擁護和平大會撰文——

怎樣纔能担负起和平反共建國的責任呢？扼要一句話，要有罪己的精神。

關於和平運動，一般人所熱烈要求的：是收回主權，完成國家之獨立自由。這誠然是必要的，而且是這一次和平運動之真實意義。但是這要求如何纔可以達到呢？扼要一句話，要有罪己的精神，纔可以達到。

罪己的精神，與傲慢不同，與卑屈更不同。

何以說與傲慢不同呢？如今重慶方面還有人說：『這一次的戰爭，日本是侵略者，中國是被侵略者，所以只要日本撤兵，就一切完了。』這是徹頭徹尾的傲慢精神。釀成這一次的戰爭，中國方面全然沒有責任嗎？『中國是被侵略者』，中國何以會被侵略呢？因為中國積弱。中國何以會積弱呢？因為中國之內，軍閥縱橫，共匪猖獗。中國何以會軍閥縱橫共匪猖獗呢？因為中國政治沒有修明，經濟沒有發達。這樣，中國能說沒有責任嗎？中國以前因為傲慢，弄到這步田地，

如今傲慢精神還不除去，恐不至國亡種滅不止。

何以說與卑屈不同呢？有些人說：『中國因為軍事失利，眼見得抗戰到底最後勝利是無望了，所以不得不低心下氣，講求和平，以求苟延國家民族生命』。這是卑屈精神。這種卑屈精神是懦弱的，是苟且的，懦弱苟且的人，是不能負起和平反共建國的責任。

然則罪己的精神是怎樣呢？我舉出以下兩點：

第一，要有深切的反省。我們如果肯將孫先生的大亞洲主義細心研究，便可知道，中日兩國只可爲友，不可爲敵。我們如果肯將事變以來日本方面建設東亞新秩序的主張，細心研究，從日本政府所宣布的國策，以及日本全國的輿論，一一探討，便可知道日本確具有排除中日兩國以往糾紛，重新建立將來親善關係，共存共榮，復興東亞的大決心。我們如果肯將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的原則，細心研究，便可知道根據這些原則以定出合理的方案，俾中日兩方皆受其益，並非不可能。我們經過了這種研究之後，應該恍然大悟，從前沒有及早想到此著，以致弄得兵連禍結，民不聊生。我們應該拿着古人所說：『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的精神，重頭幹起。

第二，要有深刻的責任心。一種主張到了實行的時候，必然會發生種種窒礙，種種困難的，尤其今日在全面和平沒有達到的時候，種種窒礙，種種困難，更不能免。我們經過深刻反省之後，我們便應該先責己後責人。例如收回主權，日本曾經屢次聲明，爲要中國能够分擔建設東亞的責任，日本不但尊重中國的主權，並且還要援助中國完成其爲獨立自主國家所必須之條件，所以收回主權，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中國不要只知道盼望日本交還，中國必須知道，怎樣纔能使得日本放心交還，怎樣纔能使得日本樂於交還。中國每一個人必須提起全副精神，每一件事，都從改善中日兩國關係復興東亞着想，使得每一件事都能表現出一種新精神，這種新精神，足以使中日兩國很迅速的很穩實的走上共存共榮之路，那麼，日本自然放心交還樂於交還的了。這是中國收回主權的第一要義。總而言之，中國必須盡其在我。古人說：『責己重以周』，又說：『重以周故不怠』，這是至理名言，我們不可不確切做到。

我親愛的同胞！我在全國民衆慶祝國民政府還都擁護和平的日子，提出罪己的口號，爲的是鞭策自己，並互相鞭策。從前兩國交戰，戰敗的國家，要担负賠款割地的義務，於是或者垂頭喪氣，偷生苟活，或者腐心切齒，立意報仇。如今

我們所要担負的，不是這種義務，而是另一種義務，這種義務不是等閒，即是要中國與日本共同担負復興東亞的責任，這種責任真不是等閒的。我們常常聽說『中日協力』，我們不止慚愧，而且着急，我們的政治力量，經濟力量，文化力量，軍事力量，能講得上和日本協力嗎？但是我們慚愧無用，着急無用，我們只有鞭策自己，加倍努力，以求繼續不已的進步，進步的結果，使日本覺得中國是復興東亞的一個最良的伙伴，一個不可缺少的伙伴，那麼，中日兩國相依爲命的關係，便做成了，共存共榮的基礎，便奠定了，而三年以來，兩國因爲戰爭所受的種種犧牲，也就得到莫大的代價了。這是每一個從事和平反共建國的同志，都應該時時刻刻放在心裏，而以之爲一切行動之準繩的。

最後，我還有幾句話，告訴重慶方面對於和平運動抱着反對的見解的人。我深深知道，中國以內，除了共產黨及其走狗以外，沒有不想望和平的。他們所以反對和平，無非懷疑和平之不能實現。他們認定中日兩國不能共存，『及汝偕亡』實爲其一切政治軍略之出發點。如果中日兩國可以共存，那又何必走向『及汝偕亡』之路呢？二十七年一月十六日，日本會聲明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同年十一月三日，日本又會聲明日本的真正希望，不在中國之滅亡，而在中國之興隆，

能與日本分担東亞的責任；並且聲明，如果國民政府能放棄其抗日容共的政策，爲人事的更迭，則日本必不拒其重新建立。如今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發表宣言，闡明政策之後，日本政府使節及國民使節到來了，卽此一端，可以知道和平必非不能實現，而且和平的第一步已經有事實的表現了。來罷！勿再爲和平之障礙，勿使全面和平因你們的反對與懷疑而有所阻滯。和平之實現，有待我們全國民衆努力，如果努力，和平方案只有更好，如果不努力，和平方案雖好，亦徒託空言。我們於慶祝國民政府還都擁護和平之際，格外想念你們，願意你們共同努力，向着和平反共建國的光明大道勇猛前進！

（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 蔣介石的磁鐵戰

我們所以獻身於和平運動，根據以下三個理由：

第一，中日兩國，只宜爲友，不宜爲敵。

第二，中日兩國雖因一時不幸，至於爲敵，仍然應該時時刻刻覓取爲友的途徑，一經得到途徑，立即轉而爲友，並且爲永久的友。

第三，近衛聲明，已經給與中國以轉敵爲友的途徑了，自從近衛聲明以來，日本政府的方針，輿論的趨向，已經漸漸一致起來，不但此也，已經漸漸形成中心勢力，統一全國的勢力，現在所期待的，是中國政府，及中國人民，都一齊堅決的走上這途徑。

以上三個理由，是我們所以獻身於和平運動的根源，我們根據第一個理由，即使和平一時不能實現，我們也甘爲中日爲友的前途而犧牲，何況第二個理由及第三個理由，尤使我們明白和平運動已漸漸的走向實現的方面。

在這時候，我們時時刻刻期待着我們舊日的伴侶，回心轉意，和我們一齊努

力。雖然他們日日在咒罵我們，污蔑我們，我們不願生氣，也不願灰心，我們只有齧着牙齒，禽着眼淚，來期待着他們。

然而不料在這時候，蔣介石仍然演說他的磁鐵戰，於是迫得我不能不再說幾句話。

蔣介石的磁鐵戰其大意不過如下：中國有的是『廣土衆民』，日本來攻擊的時候，只要把自己的主力軍隊保存着，便不怕甚麼，因為保存着自己的主力軍隊，便可以駕御廣土衆民，不虞紛散，同時並可以驅使廣土衆民，與日本軍隊久纏不休，甚麼長期戰，焦土戰，游擊戰，什麼日本軍隊只能佔領『一點』與『線』，而不能佔領『面』，說穿了不過如此，而磁鐵戰的最大效能，也不過如此。

但是我要問一句，這個戰法能得最後勝利嗎？不能的。那怎麼辦呢？一，期待國際援助，二，期待日本經濟之枯竭與崩潰。國際援助，看見最近歐戰情形，大概可以付之苦笑。日本經濟之枯竭與崩潰又如何呢？常常說道：『中日戰下去，只有兩敗俱傷』，這話不完全對的，中日戰下去，日本不免於傷，中國則只有死而已。中日戰事已經三年了，有些人看見中國公然能支持戰事至三年之久，便以爲這是奇蹟，其實大謬不然，我們試看一看歷史明朝亡國的時候，由崇禎十

七年即西歷一六四四年，清兵入關起至永歷十六年即西歷一六六二年永歷帝被殺止，前後共十八年，以前清兵的連年廝殺，與以後的台灣仍然奉明正朔尚不算在內，至於宋朝的亡國，其時間却更長了，由高宗的偏安，至祥興帝的蹈海，足足一百十五餘年，由此看來，區區三年，何足爲久。然則我們因此而羨慕偏安麼？那更大謬不然，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比起近代工業國家，精神中樞是沒有那麼集中的，大凡愈高等的動物，精神中樞愈集中，因此平時活動力強，然因此一個致命傷，也就可以了事，在低等動物則不然，精神中樞散漫，譬如田雞，你將他斬成幾塊，每塊仍然會跳動的，但是這有甚麼用處呢？上次大戰後的德國是爲什麼恢復得如此容易，就是因爲德國是一個高度的工業國家，一切精神物質容易集中，容易統一，所以受打擊雖大，而恢復也快。至於中國，雖然『點』與『線』被人佔領了，因爲精神散漫，不大覺得，而『面』的凌遲碎剮，總須費些時的，似乎不妨苟延殘喘，却不知亡得慢，恢復得也慢，宋亡之後，百年而始恢復，明亡之後差不多三百年而始恢復，宋亡明亡，祇是亡于軍事，不是亡於經濟文化，如今非宋明時代可比，不亡則已，一亡則經濟文化亦隨以俱亡，那麼不但恢復無期，而且所患者，不只亡國而且滅種了！

如此說來，我所說『中日戰下去，日本不免於傷，中國則只有死而已』，是不是危言聳聽呢？以上的說話，不但從前沒人說過，我自己亦沒說過，因為實在不忍說，但是現在却不忍不說，譬如『父母將死』卻有一班殺人不眨眼的醫生，在旁邊信口胡柴說什麼金木水火土，你不由得不着急，不忍說的話，也說出來。

我們舊日的伴侶，自從戰事開始以來，大約連日本的雜誌也懶得看了，須知道中國在講究長期抗戰的時候，日本也在講究長期征服，日本早就有人知道滅中國是要十年二十年以上的，早就講究怎樣的長期征服的方案了，然而日本也知道如果這樣幹下去，中國必死，而日本也不免於傷，所以纔有近衛聲明以來的大轉變，日本人不忍其國之傷，中國人難道忍其國之死嗎？

我將焦土戰游擊戰比喻做吃砒霜餵老虎，這是確切不過的。現在不是天天鬧米貴嗎？米貴的原因在那裏呢，中國號稱以農立國，而每年糧食不能自給，麥米兩項卻要仰給於外洋，而且仰給的數目字，只有年年加大，如果時局得到安定，在政治上，及科學，技術上一齊着力，謀生產能力之提高，或者還可挽救，不知出此，而出於焦土戰游擊戰，須知以農立國的國家，其根本全在農村，焦土戰游

擊戰一展開，農村便根本摧毀了。這不是吃砒霜是什麼？吃砒霜的人，是必死的，吃了吃砒霜人的老虎，卻不是必死的，或者嘔吐一場，壞了胃口，仍然可以活着，試問是誰損失的大？

如果日本不給與中國以『轉敵爲友』的途徑，則凡是中國人，只有出於吃砒霜的一法，如今日本已給與中國以轉敵爲友的途徑了，古人有言，『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我們不惜自己的死，但我們不能不求國家之生，我們不但不願見中國之死，我們也不願見日本之傷，日本維新以來，提心吊膽，慘淡經營，致此富強，大非容易，中國幾十年來，爲國民革命而奮鬥，無數先烈的血，也不應當使之白流，我誠心誠意呼籲於舊日的伴侶之前，我不願門口，我只願摸摸良心，說幾句老實話，負些責任。

（二十九年六月十五日）



## 再呼籲於同胞之前

米天天貴起來了，政府固然要用盡方法以謀救濟，然而根本的解決，是有待於全面和平。

同胞餓得耳要聾了，實在不忍再說什麼話，然而也不再呼籲幾句。

幾年以來，我呼籲着，「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如今所要再呼籲的，還是這幾句。

幾年以來戰事上的諱敗，說起令人慚愧，然而有些人，原諒的說，『這是不得不然』。是的麼？請看法國戰敗，就老實說戰敗，不會向世界及自己國民滿飾一句。因爲，肯說老實話，所以肯負責任，一個在上次世界大戰得着勝利榮譽，被稱爲護國之神，被稱爲陸軍之父的八十四歲老頭子貝當元帥，挺身起來，擔負戰敗的責任，要從戰敗後謀國家民族的保存。他不會像中國的軍事領袖那樣，每一次喪師失地，要逼老百姓祝捷放鞭砲。他不會像中國的軍事領袖那樣，長沙未丟，就放一把火燒個精光，廣州臨丟的時候，還要把來燒成白地。他把巴黎整

個保存着，除了地底鐵道之外，不會自動破壞一點。他更不會像中國的軍事領袖那樣，口口聲聲拿國際援助來給老百姓望梅止渴，畫餅充饑，他原來有英國比肩作戰，他知道救不了法國，就毅然單獨向德國要求停戰講和，他並且有美國的物資援助，他知道這不過等於看鬥牛的人怕疲倦了看不盡興給一杯白蘭地喝，給一點糖吃吃，這尤其救不了法國的，所以絕不因此而對於停戰講和有所躊躇。法國軍人有此精神，說老實話，負責任，縱然法國自此以後，事未可知，然而我敢斷然的說，法國必能從多災多難之中，覓得一條出路。

法國軍人如此，法國一般國民又如何呢？他們不會和中國一般，自命爲文化界的人們那樣由早到晚張着嘴扯謊，最近襄陽荊州沙市宜昌，以次失陷了，却說『好得很又多了一條泥腿』。他們不會那樣的『雙眼望英美，一身靠蘇聯』，他們不會對於貝當元帥的要求停戰講和七口八舌的奉以賣國賊漢奸等等不入耳的污言穢語。我在上次歐洲大戰時是同情協商國的，及至看見了凡爾賽條約之後，就轉而同情德國，一直這幾年，我同情德國的論調未嘗變過，我的文字可以覆按，可是如今又同情法國了。法國人民的愛國心比中國人深，對於國家的盡力比中國人多，相形之下，我人只說不盡的感激。

凡爾賽條約，種下今天的禍根。以德國人的聰明，必然看到，當不致以凡爾賽條約一類的東西，還之法國的。此因我想起去年六月到東京的時候，平沼首相對我說，我們東方人不要蹈襲西方人那些功利思想，不要玩凡爾賽條約那一套。這話到如今，恰恰一年了，我因此再呼籲於同胞之前，我們要說老實話，負責任。

(二十九年六月十八日)



## 民族意識與建設東亞新秩序

——對教育行政會議出席人員訓話——

和平反共建國，爲一切施政方針，亦卽教育方針，教育界諸君於此，應謀青年心理之改進與改造，其最扼要之點，在溝通民衆意識，使與建設東亞新秩序意識相合一致。蓋過去有兩種顧慮，其一，以爲中國若不能得到獨立自由，則建設東亞新秩序云云，不過爲澈底的消滅民族意識之一代名詞，其二，以爲中國國民若不能了解建設東亞新秩序之意識，則其民族意識，不過爲一種狹隘的利己排他之工具，以上兩種顧慮，應及早使之消滅。中國國民若不能愛其國，安能愛東亞，中國若不能得到獨立自由，則無分擔建設東亞新秩序之能力，此理之明者，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自二十七年十一月三日近衛聲明，至今年三月米內聲明，闡述各民族各本於獨立自由之立場，向於共同目的而共同努力，此決無抹殺各民族之民族意識之意，且正欲各民族之意識能健全發達，以致於共同目的之充分達到。反之，各民族若不能向於共同目的而共同努力，則其民族意識雖極堅強，適足

爲利己排他之觀念所利用，馴致相爭相殺，其於共存共榮，相去益遠，此又理之至明者。由此言之，民族意識與建設東亞新秩序意識實相一致，教育家宜認定此點，努力於兒童及青年正確觀念之養成，東亞諸民族熱心攜手，共同掃除百年來經濟侵略之流毒，共同肅清二十餘年來共產主義使人類相互以盡之毒辣思想，東亞始可得安寧與幸福之新天地也。

(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 對於事變三週年之感想及期望

在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前，不能防止事變之發生，在事變發生以後，又不能使此事變得以早日結束，蹉跎三年，坐使全國如水益深如火益烈，撫今思昔，曷勝感慨！

依照國際慣例，兩國不幸至於失和，至於發生戰事，其唯一的恢復和平之方法，不外停戰協定與講和條約。當此之際戰勝國每以酷虐不堪之條件加之戰敗國，而戰敗國則每以暫時隱忍之態度謀他日之報復。惟此次日本則以毅然之決意，打破此窠臼，不以戰勝國自處，而惟以先進國之風度，指示出東亞各國家各民族所必由之途徑，俾得各本於自主獨立的立場，重新建立親愛和睦的關係，以共同擔負東亞復興的責任。自一方面說，日本不以戰敗國的責任課之中國，而自又一方面說，日本以較大的責任課之中國。這較大的責任是什麼？是復興東亞。日本因為要中國能够分擔復興東亞的責任，所以不肯以戰敗國的條件，加重中國的壓迫，削弱中國的力量；不特此也，日本且將援助中國完成其為獨立國家所必需的

條件。此所以增加其力量，促進其發展，使之能够分擔東亞復興的責任。

如此說來，中國目前所謂恢復和平，並非以屈辱爲和平的代價，而是具有一種活潑進取的意義，這種意義越是青年越容易了解；因爲青年的精神體魄都是活潑進取的，與這種意義適相吻合。然則全國青年都應該一致來擔負這新的責任，貢獻新的努力；然則爲什麼直到此時還會有遲疑觀望的呢？

第一，對於復興東亞的意義，還沒有十分認識和了解。其實百年來經濟侵略的毒害，孫先生在『民族主義』，『大亞洲主義』，『中國存亡問題』裏，已經痛切說明了。中國若不能解脫經濟侵略的桎梏，則將永淪於次殖民地的地位。從前中國多數青年爲英美學風所蒙蔽，對於孫先生的指示，至少口是心非；至於二十餘年來共產主義的毒害，則孫先生生時所不及見的，青年又未免爲第三國際宣傳所蒙蔽。加之蘆溝橋事變以來中國一般青年所戒慎恐懼的，更在彼而不在此。因之經濟侵略及共產主義更有爲淵驅魚爲叢驅雀之樂。如今只要中日關係由黑暗轉到光明，則以上兩種蒙蔽自然容易解消，何況經濟侵略到今日已成罪惡貫盈，而共產主義的猙獰面目到今日又已底蘊畢露呢！

第二，對於和平雖有熱烈的期望，但又懷疑着此期望之終歸於泡影，因此徘徊

徘徊觀望久而不決，這種人要算最多。我們只靠宣傳是不夠的，必須在力所能及之範圍以內，做出事實來給他們以一個樣本。事實宣傳相為因果；宣傳可以促進事實，事實可以證實宣傳，我們必須兩方面同時努力。但是這種人也要知道，如果儘這樣的徘徊觀望下去，整個國家民族會斷送於徘徊觀望之中的。

第三，對於中日共存東亞復興的遠大的理想，沒有懷疑，但是眼前一兩件事實不如意，便灰心喪氣起來，甚至走入歧途中去，這種人也不少。全面和平一日沒有達到，不如意的事實一日難免；我們固然要盡力的消除這些不如意的事實，但是消除的方法是要研究的，不是可以着急得來的；着急已經無用，若因此而灰餒起來，甚至橫決起來，那就是對於遠大的理想背棄了，對於原來的目的不忠實了，這不是和平反共建國同志們所應有的態度。

以上三點，舉以為例；我們只要把精神氣力集中起來，時時刻刻矯正缺點，猛向前進，則和平反共建國運動由普及而成功，是無疑的。

（二十九年七月七日）



## 田 鷄 與 蝗 蟲

『日本軍隊只能佔領我們的點與線，不能佔領我們的面』，這句話最初是從共匪口中說出來，以後漸成爲抗戰到底的一種論據。

這種說法，無以名之，名之曰蝗蟲政策。

中國是不是以農立國呢？無論何人不能不說「是」。那麼，便應該知道中國國家的元氣，民族的生命，全寄託在農業上面。中國如要造成一個現代國家，第一步要將農業改進，第二步要以農業爲基礎，漸進於工業的階段，由輕工業至重工業，以次發達，纔能成爲一個現代國家。所以中國在平時要將大部分心力物力用在農業上面，如何改良農民生活，如何改進農業生產，在戰時要謀農民的安全，謀農業之不至於破壞，因爲這是國家元氣民族生命之所寄託，一了百了，不得不以全力從事。

「點」與「線」是什麼？是都會，是重要城鎮，是交通孔道。這些地方自然與農業不無關係，但究竟是官吏自由職業者工業者商業者的根據，不是農民的根

據。至於「面」呢？是農地所在，農村所在，概括二句，是農民的根據。一切農民的生活，農業的生產，全部在內。如此說來「面」是應該如何的愛惜與保存，可是抗戰到底的作法，兩軍交綏的時候，將「點」與「線」隨隨便便的就拋棄了，以爲這是不重要的，佔領了去，沒有甚麼關係。至於「面」呢，却認定是絕妙戰場，在這裏展開游擊戰焦土戰，於是乎農地農村便由此摧毀了，農民的生活便由此無所依託了，農業的生產便由此無可維持下去了，而國家元氣民族生命也便由此斷送了。

如此說來，除了說是蝗蟲政策還有其他適當的名稱沒有？蝗蟲政策之最惡毒的要算是焦土。本來堅壁清野是相輔而行的，能堅壁然後清野，纔能發生效用。如今壁是根本不要的，更說不上堅了，而野則惟恐其不清。至於焦土則不惟清而已，而且焦，換句話說，放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頂好的例子，是火燒莫斯科。可是莫斯科的火，是燒拿破侖軍隊的，而我們的火，卻是燒自己的，莫斯科的火是燒俄國的一「點」，而我們的火卻是燒中國的全「面」。

老實說罷，不用將火燒莫斯科，來做幌子了，火燒圓明園本來正是我們同胞的祖傳心法。大家總知道圓明園不是英法聯軍燒的，而是我們同胞燒的。咸豐皇

帝往熱河一跑，老百姓便向圓明園一闕而入，這是有名的祖傳心法，叫做「趁火打劫」，起先是搶，隨後是燒，搶得了的東西便搶，搶不了的東西便燒，這很有些大快人心似的。然而對圓明園既然如此，對其他的房子自然也好如此，於此英法聯軍未入北京城，而北京城內已一處處的起火了。這是我們同胞的祖傳心法，亡國時候搬演出來的拿手好戲。你看見燒長沙時候的嗎？一班放火的同胞，轟轟烈烈的，大房子燒，小房子也燒，索性走不動的老人家女人小孩子也燒在內，甚至傷兵也燒在內。你看見燒廣州的時候嗎？比狗還不如的余漢謀吳鐵城，自己直著尾巴溜了之後，留下一個號令，「燒」。於是乎一班放火的同胞，轟轟烈烈的一家一桶煤油，最繁盛的商店最先燒，燒的時候火雜雜的，似乎很有意思，而不知不覺之中，已有一大批人手到拿來的發了無數「國難財」了。

可憐長沙廣州還是他們所謂「點」，不是他們所謂「面」，他們所謂「面」只是些農地農村，當然沒有這麼大觀。然而這些農地農村零零碎碎的燒個不了，也不怕國家元氣民族生命不歸於罄淨。說到這裏，我的熱血直湧上來，我們同胞如不將此劣根性拔出來，不但會亡國，而且會滅種。至於自命爲領導者人們，不注意拔去我們同胞的劣根性，而反去利用，反去煽揚，這是全無心肝，非把他們

的狗頭一起砍下來不可。

焦土是蝗蟲政策之最惡毒的如上所說，至於游擊戰呢，似乎比焦土戰好些。因為他們既然要游，總應該留點水纔行，乾且不可，何況於焦。因此他們便會發明種種方法，如勒收行水等等，連殺人不眨眼的共匪也曉得這手戲了。可是這與焦土不過只有緩急之分，正如水滸傳裏李逵所說，你要快快死，老爺偏要你慢慢死。總而言之，焦土死得快，游擊死得慢，如此而已。須知道，「點」「線」「面」是相連的，沒有「點」「線」則「面」不能久存。他且不論，即如交通，就算是農業社會，也非有交通不行。農民要將種出來的穀去換別的必要東西，這非有交通不行的。如今將「線」斷送了，即使能將農地農村都保存着，而這些農地農村也只好由零零碎碎的分割，而歸於零零碎碎的消滅。這正如血脈斷了，肌肉一時雖不致消失，而其生存的運命，已經注消了。所以游擊戰與焦土戰，其為蝗蟲初無二致。戰爭時候，人民是要為國家而犧牲的，可是自命為領導者的人們，却要時時刻刻注視着犧牲的效用如何。從前談財政的人們有一句蠢話，『中國有四萬萬人，一人出一塊錢，就是四萬萬塊錢』；如今談抗戰的人們，又有一句話，『中國有四萬萬的人，就算死了四千萬，還有三萬六千萬，何況如今還死不到

四百萬』。這一句話，不止蠢，而且狠。我告訴你們，你們如果再這樣的把『面』來糟蹋，農地以次荒廢，農村以次彫敝，則中國的生路便斷絕了，四萬萬人都會死在你們手裏。

但是這些全無心肝的人們，不是可以言語開導感化的。我們只有當他們和蝗蟲一般，將他們撲滅。同時我們應該有一句口號，『甯爲田雞，勿爲蝗蟲』，因爲田雞是食害蟲，有益於禾稼的，而蝗蟲則與禾稼不兩立，尤其是有綏靖任務的人，於此要加倍注意。

(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 中日文化協會成立大會訓辭

剛才聽到原發起人褚先生的談話非常高興，非常愉快，中日文化協會是中日兩國有識之士所組合的，以強力的合作，遠大的計劃做長久的的工作。我們要認定孫總理的大亞洲主義，以及日本東亞新秩序的建設，都要在這中日文化協會以最大的努力去實現。兄弟發出豔電嚮應近衛聲明，以共同防共，經濟提攜，善鄰友好三原則來謀中日永久和平，但這永久和平的實現，積極方面一定要在兩國教育上樹立強有力的團體，來完成這共同理想。文化這個名詞，就是文明開化，文明是物質方面，開化為精神方面，總稱為文化。中國的文化在東亞，在世界上都有超特的地位，而日本文化也有其特殊的地方，吸收中國及世界文化的精華，才創造今日之燦爛文化。這一點我們應當特別注意。中日兩國必須要結合起來，以謀東亞的文化發揚光大，這我們須十二分誠意認定目標去做。中日文化協會不是一個泛泛的協會，是有它的目的，要聯合兩國文化去實現大亞洲主義的。我們對於中日文化協會成立的今天，以十二萬分的熱忱，祝其永久的發達。

(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 對政治訓練班訓辭

總理致力國民革命，創立國民革命軍，注重於國民革命軍之政治訓練。總理逝世之後，國民政府秉承遺教，成立之始，即設立政治訓練部，第一任部長，就是現在領導各位的政治訓練部長陳公博同志，各位在一位這樣經驗豐富的部長領導之下，來做政治訓練工作，必然能使和平反共建國運動，日益普及，日益進步，以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

如今要同各位說的，第一是和平反共建國的根本意義，須知道『抗戰到底，最後勝利』，不過是自欺欺人的話。『抗戰亡，不抗戰亦亡，與其不抗戰而亡，不如抗戰而亡』，這纔是一般人民的中心思想。可是日本已經聲明，日本之目的，不在中國之滅亡，而在中國之興隆了，日本已經聲明準備與中國攜手共同保障東亞了，那麼抗戰的必要，已經不存在了。中國現在所必要的，是如何與日本協力，將過去的糾紛，根本的予以解除，重新建立將來的正當關係，中國能否完成其國民革命，獲得自由平等，全在於此，東亞能否得到永久的和平，也全在於此。

，這是和平反共建國的根本意義。第二是當前的現實，現在全面和平，還未達到，中日戰爭，仍然繼續，因之我們的理想，往往未能一一實現，我們不但不要因此而灰心，我們並且要因此而加倍努力，我們要有克服困難的勇氣和毅力，我們方纔能擔起和平反共建國的責任。以上兩點，是一般同志所應當深切體會的，而武裝同志，尤其應當有深刻認識，勇決的實行。我今天在這莊重典禮舉行的時候，以滿腔誠意，祝各位武裝同志的健康，盼望各位武裝同志完成和平反共建國的重大使命。

(二十九年八月十九日)

## 民權主義前途之展望

一個國家，如果沒有一個中心勢力以運用一切，這個國家，不但不容易進步，並且不容易維持。然則中心勢力之存在，與民主政治有沒有矛盾呢？我們且來看看近世所謂民主政治。近世所謂民主政治，其形式不外兩種；其一，是直接民權，這只有小國如瑞士方纔可以實現，其二，便是代議政體。

代議政體的特質是國會議員，人民選舉，國會一切議案由取決於多數，這種代議政體，是否即為民主政治之極則呢？早就發生了不少疑問，代議士由人民選舉，人民從何而知其人之賢不肖呢；從何而知其人之適於為代議士與否呢？因此人民之間，必須有一種組織，就是所謂政黨。由政黨運動選舉，競爭選舉，其運動競爭之方法，最光明純潔的，是將政黨的政治主張，告訴人民，人民相信某一黨的政治主張，就選舉某一黨的候補人為代議士，這是最光明純潔的方法。至於其他黑暗污穢的方法，如行賄等不必說了。然即以光明純潔的方法而論，其能達到政治之最高目的與否，仍然沒有把握，為什麼呢？其一，政治主張，不是容易

了解的，一般人民不是個個都有政治頭腦。那麼，要他能了解，並且能判斷能決定某一黨的政治主張是對的，某一黨的政治主張是不對的，這不是強人所難的事情麼？其二，各政黨的政治主張不是相同的，在國會裏互不相下，其結果只有取決於多數，然而多數主張未必即好，少數主張未必即不好。反之，一種極好的主張往往為少數聰明卓絕的人所堅持，而為多數糊塗的人所排斥，即使這少數的人能苦心孤詣繼續努力，能漸次取得多數同情，然往往時機已過，徒喚奈何，此類事情，伊古以來見得多了。尤其現在的世界，因科學的進步，即以機器而論，速度增加不止萬倍，汽車汽船的速度，不是馬車帆船可比，飛機的速度，又不是汽車汽船可比，物質機構的速度增加，人事機構的速度，也就得隨而增加方才可以適應，如果你有一種極好的主張，要慢慢取得多數，然後可以見諸施行，只怕多數通過之時，這種主張，已成爲歷史的陳跡，使人於事後而歎其先見之明罷了，於國家民族間之生存競爭，不會發生影響的，這不是很使人短氣的事麼？以上兩種，是代議政體無可補救的缺點，早就有人指摘。至於現在，滿世界都是這個國家和那個國家拚個你死我活的時候，即使勢均力敵，也要眼明手快爭取先著。這種慢慢的取得多數的方法，無怪乎更使人不耐煩，甚至於認爲不知死活了。

同是一樣採用代議政體的國家，其制度亦有不同；例如法國的國會，是小黨林立的，沒有一個內閣可以取得絕對多數，因之沒有一個內閣，不是靠着拉攏各黨各派來支持。這種拉攏是極不堅固的，隨時可以拉攏，即隨時可以撒手，所以法國內閣，在世界上最稱短命，有二十四小時即換一個的。第三共和以來，靠着這種彈性緩和了國內激烈的政爭，然對於外則牽掣太多，建樹太少了，這種破綻，上次大戰時候，已經發露，因為僥倖戰勝，所以仍得維持；到了這次大戰其崩潰遂不可免。一個國家沒有一個中心勢力以運用政治，在平時雖可勉強維持，在非常時期必然發生裂痕，何況現在世界各國性命相搏的時候，根本便沒有所謂平時。又如英美，則是標榜兩黨主義的，甲黨執政，乙黨從旁監督，兩黨迭為進退。英國近來政治，稍有演變，實際上已不止兩黨，然大體上仍是兩黨對抗，與法國之小黨林立不同，所以英美的政治比較穩定，這種政治，是否最合理的民主政治，雖然還沒有定評，但有一點是不可忽視的，這種政治缺乏一個中心勢力，甚至可稱為二個以上的中心勢力，如果國家社會的基礎沒有鞏固，勉強仿倣，很有陷於分裂危險。日本維新，比中國成功大而且快，雖然有種種原因，然其中有一最重要的原因，即是日本國家社會，以天皇為中心，有此中心舉國一致，容易做

到，中國的滿州帝室，不能做中心，以致非革命不可，而革命之後，中心勢力不能咄嗟造成，以致蹉跎復蹉跎，把無數時光拋撇了去，說起來實在痛心之至。民主政治，是我們所信仰的，獨裁政治是我們所反對的，然則防止民主政治之流弊，使不至於散漫，而又不致蹈獨裁政治之武斷，有甚麼辦法呢？我以為應該以一個黨一個主義爲中心而聯合其他各黨各派，以共同負荷國家社會的責任。這裏仍然採用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即所謂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有了一個黨一個主義做中心，則不致散漫。而且因組織訓練的種種努力，使這一個黨日臻於紀律化，這一個主義日臻於普及化，則可以常常得著多數，以運用一切，所謂築室道謀費時失事的毛病，可以掃除，有了其他各黨各派存在，雖居少數，而意見常被尊重，沒有掣肘的壞處，而有補偏救敝的好處，較之獨裁政治一味武斷，做好事固然可以專美，做壞事絕對沒有方法可以矯正，其是非得失之相去，不待言了。

今日的世界，是拚命的世界，而今日的中國，又正在危急存亡繫於一髮的時候，既需要一種同心協力的精神，更需要一種能適合此精神運用此精神的政治制度，以一個主義爲中心勢力，而聯合各黨各派以共同負荷責任，我認爲是比較最

合理的。這種原理，總理孫先生在民權主義裏，早已指示我們，我們應該認定方針，猛向前進，既不可蹈民元二年假民主之覆轍，尤不可聽重慶方面黑暗獨裁之制度繼續存在。

(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 對中央大學職員訓詞

此次中央大學復校，很不容易，我希望他能够恢復到戰前的狀況並遷回原址，但這事恐怕一時還辦不到，所以只好暫在建鄴路前中央政治學校舊址上課，將來全面和平實現，自然可以遷回。所以中央大學的發展，實與中日和平前途相應，現在可以乘便一談近日和平談判的狀況，有人說中國有抗戰和平二派，但我以為是沒有的，因為抗戰派的最後目的也是和平，不過他們希望和平的條件更有利一點更合理一點而已，現在一般人所疑慮的，無非說我們所訂的條件不合理，但是假使我們不用抗戰的方式，而能得到合理的和平，豈不更好。我們的和平大約可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就是現在正在和日本調整國交，第二階段就是簽訂和平條約，中日兩國互換和約，並正式承認我們的政府，第三階段，就是和平條件的履行，日本撤兵，全面和平實現。目下第一階段已漸過去，第二階段即將完成，第三階段也並非全是理想，到那時，中大自可遷回原址。和平工作原很艱難，我會把他比作北極探險一樣，成功固是很好，失敗也不失為一種有價值的舉動

。我們如果能爲國家覓到合理有利的和平條件，那是我們成功，否則便是失敗。失敗原也沒有什麼關係，抗戰已經犧牲了幾百萬人，爲和平而犧牲這一小部分的人，還算得什麼呢？關於中大學生訓練，我想特別提出來說幾句話，過去的大學生喜歡參加政治活動，把學校當做個人活動的場合，學生做了野心家的工具；他們看到好多人因爲善於活動，便在政治上得到重要的地位，於是以為讀書是沒出息的；紛紛來幹組織，作活動，這種錯誤的思想，實在是在大學教育上的重大危機。我們要救國家，第一件緊要的事，便是糾正青年的思想和行動；我們要使每個大學生，不但有愛國之心，且有愛國之術，過去蔡子民先生辦理北大，專鼓勵學生幹革命行動，那時爲了打倒北洋軍閥，所以那種活動是合理的，現在我們已不需要那種活動，是要切切實實的去求知。孫先生所說『知難行易』好多人發生誤解，其實是不明白孫先生的本旨，原來孫先生覺得好多人在那裏盲動，所以要人先求知，然後再動，才算合理，假使是不難的，我們又何必要由小學中學直到大學，經十數年的學習呢？目下我們訓練學生最要緊的，便是要使他們眞知力行養成愛國救國的眞實本領，絕對不許作盲目的政治行動或從事各種組織，尤其是共產黨最善於利用學生作行動工具，學校必須嚴防。總期青年埋頭讀書認識了和平

反共建國的眞意義，養成和平建國的眞本領，我想一二年之後，必有良好的成績表現。

此次中大招生，最好重質不重量，集中精力財力，訓練有用人才，原不在求其多而無當。聞此次投考學生前來請託通關節的極多，應該一概不理，完全以成績爲本位，錄取優秀學生，庶可達到爲國育才之目的。

（二十九年八月十一日）



## 因紀念『八一三』而展望全面和平

有人問我道：中國的抗戰派與和平派，何時始能合一呢？全面和平何時始能實現呢？

我答道：中國沒有什麼派，只有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爲國家民族求生存獨立共同意見，祇有極少數的共產黨，是被擯於此共同意見之外。然而這些共產黨，久矣夫不是中國人了，是應該被擯於中國人之外，那麼，中國沒有什麼派，只有一個爲國家民族求生存獨立共同意見。

這共同意見是什麼？是好的和平條件，詳細些說，是有益於中日兩國，有益於東亞的和平條件，如果這好的和平條件能得到呢？中國絕不會再有所謂抗戰派。反之，不能得到呢？則所謂和平派歸於失敗，這所謂失敗，不過是目前的失敗，不是永久的失敗，因爲中日合作，復興東亞這條大路，遲早兩國總要共同走上

的。

由此可知，全面和平之能否實現，視乎好的和平條件之能否獲得，好的和平

條件獲得越快，則全面和平實現亦越快。

然則我們將如何獲得好的條件呢？

好的和平條件，是中國人所共同希望的，至於如何獲得好的和平條件，則中國人所採的方法，未見得盡同了。我如今舉出兩個最要不得的方法如下：

其一，以爲單獨與日本講和平，是不容易得到好條件的，必須加上某某國，方纔能得到幫助，以折衷至當，這種打算是最要不得的，我們必須認定，所謂中日合作復興東亞，不是一種門面話，而是一種有真實性的主張，不是一種權謀術數，而是一種有絕對性的信仰，如果中日兩國不能相見以誠，而欲以縱橫捭闔的手段，得到外交上的效用，眞所謂弄小巧成大拙。

其二，以爲日本既欲結束戰事，則中國正宜利用之，使戰事延長，因而獲得更好的和平條件，這種打算，尤其要不得，戰事越延長，則消耗越多，補償之必要越加甚；只有使和平條件更不好，豈有使和平條件更好之理。以上兩者，不但淺薄而且乖戾，然而重慶方面，往往發生此種論調，恬然不以爲怪，是何故呢？一，由於懷疑好的和平條件之能否獲得，二，由於恐懼好的和平條件之不能獲得，而其懷疑與恐懼之來源，則在對於中日合作復興東亞的意義，始終沒有認識清

楚，始終以爲這不過是一種門面話，一種權謀術數。殊不知立國於現世界，很少能孤立的。不惟弱國不能孤立，強國也不能孤立。固然爲國家打算，不可輕易與他國發生連帶關係，以致牽掣了行動的自如，然而在天然關係上，如地理，人種，在人爲關係上，如道德觀念，經濟條件，兩三個國家聯合起來，各自保障，並且互相保障，實在是必要的，所以日本看得在睦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的原則上面，與中國合作，復興東亞，比較藉戰勝之威，使中國屈服，更來得重要。中國如果明白此層，則用不着懷疑，用不着恐懼，只有打疊起全副精神，加倍的努力，如我在四月二十六日所講，『罪己的精神』，使日本覺得中國實實在在是復興東亞的一個最良的伴侶，則和平條件，斷沒有不好的，因爲這所謂好，不但於中國好，於日本也好，於東亞也好。

（二十九年八月十三日）



## 沈次高先生行狀

自余於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發表呼籲和平通電後，在重慶之共匪及其工具，遂組織殺人公司，斂錢買兇，專以刺殺余及余之同志爲急務。於是二十八年一月十七日同志林柏生在香港被狙擊幾死；三月二十一日同志會仲鳴在河內被刺死，其夫人方君璧重傷，並傷其他同志三人，八月二十二日同志沈次高在香港復被刺死。軍興以來，同胞同志爲抗戰而死者，先後相望，至於爲和平而死者，以會沈兩同志爲嚆矢。中日兩國，義應爲友，不應爲敵，戰爭則兩傷，和平則共存，此爲真理，久而愈明。爲真理而死，雖死猶不死，自會沈兩同志死後，同志益奮發，前仆後繼不絕。會未踰年，和平運動已大盛於中日兩國之間，蓋不徒將化戰爭爲和平而已，且將本於戰爭所獲得之教訓，於破壞中求建設，盡掃中日兩國間過去之糾紛，重奠將來之基礎，以蘄致於中日共存，東亞復興，然則爲和平而死者，其所流之血，實爲沃真理而發其光華也。嗚呼！真是所謂死猶不死矣！會仲鳴同志之死，余會爲作行狀。今復爲沈次高同志作行狀，余誠不勝後死之愧，

余尤以後死爲憂，蓋能盡其責，則死猶不死，不能盡其責，則不死之可憂甚於死也。

沈同志諱崧，廣東番禺人，父諱藻，清學者稱孝芬先生。近數十年，廣東學者皆出於陳蘭甫先生之門，或親炙，或私淑。陳慶笙先生者，蘭甫先生之一高才弟子也，治經學爲同輩冠，而孝芬先生則慶笙先生之高才弟子也，治史學，尤精四史，好學不倦，老而彌篤，娶汪氏，余第三姊也，生子女共六人，第三子早殤，餘皆長成，且皆能致力於教育，以繼父志。次高行二，幼而穎悟，從父學，通經史，既而肄業於廣東公立法政專門學校，爲高才生，畢業後，爲社會服務，刻苦勤勉。余長廣東教育會時，引與共事，時爲民國十年一月也，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之役，余方奉大總統孫先生命赴天津，回至上海有電報至廣州，命次高轉呈孫先生。電報至時，變兵且已作，孫先生脫險出城外登永豐軍艦，事起倉猝，傳聞異詞，變兵且譁言孫先生已遇害，次高置電報懷中，徑詣大總統府求得消息，既至府已爲亂兵縱火，衛隊悉力拒之，戰方酣，槍彈如雨，次高出入其間，爲亂兵以刃傷其背數處，仍不輟，卒偵得孫先生所在，負創登艦，完其使命，孫先生盛稱其勇，撫其背，視其創，並口授密令，傳答於余，次高復力疾詣上海，與余

偕歸謁孫先生於黃埔軍次，其受知於孫先生自此始也。十二年二月孫先生歸廣州，開大元帥府，命次高襄廣州警政。十四年三月孫先生逝世於北京，其年七月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東江南路以次克復，命次高爲東江行政委員，整理戰後行政財政，尤有起色，既而繼甘乃光爲南路行政委員，自是以後，十餘年間與余戮力，艱難險阻，無役不從。二十六年七月中日戰起，十一月杪余將由南京赴武漢，命次高赴廣州。次高受知於孫先生，餽聞大訓，又與余共事，久知余志，至其平日議論主張，以爲中日不幸出於戰爭，欲謀和平非無其道，然共匪不去，必爲和平之梗，而共匪工具不去，則轉相勾結，必至於淪胥以亡，在廣州見當局闕茸無能，對於事勢心知其危，而不敢有所可否，心滋痛憤，屢以書抵余極論之。及二十七年十月廣州當局棄廣州去，且縱火焚街市殆盡，次高益憤不可制，聞余在重慶數建議，皆被格不得行，乃規余以書曰，吾舅既知共匪之終不可感格，共匪工具之終將斷送國家民族而無所恤，乃猶依違其間何也？豈孔子去魯遲遲而行乎？然則如披髮纓冠之義何？余得書深愧其言，然余之去志亦已決矣。及余既離重慶赴河內，開始和平運動，次高則盡其最大之努力，日夜奔走擘畫，窺伺雖衆，慨然不以爲意，七月九日余在上海廣播，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次高

自香港來謁余，旋先赴廣州，余亦於八月九日在廣州廣播實現和平之方法，和平運動至是遂進入一新階段，而羣凶之阻撓破壞至是亦益亟，知次高謀勇，且於廣東事尤嫻習，必欲死之而後已，八月十五日，余自廣州回上海，次高復至香港，二十二日夜爲兇徒數人狙擊於道，傷重遽卒，年僅四十有五，傷哉！夫人張氏能相其夫無子，余既痛次高英年摧折，又無以塞吾老姊之悲，覩茲寡弱，尤不可爲懷，故久未能執筆詳敘其事，然次高死矣，而其救國精神，凜凜然未嘗死，且無數同志方以同一精神致同一之努力，務使救國大業卒底於成，是則余之悲雖無窮，而次高之目亦可稍瞑矣乎，噫！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汪兆銘謹撰

## 向美記者闡明國府之施政綱要

美國記者伊本尼士夫人 (Mrs. Ibanes)，下午四時，晉謁汪主席，會對國民政府之施政方針，及中日美三國友好關係之確立，與汪主席作懇切之問答。原詞如後：

問 先生所努力以求實現之理想何在，以先生所處獨特之地位，必然對於國家及人民之前途，具有一種信念，願聞一二。

答 吾人遵 孫先生遺教所努力以求實現之者，一為奠定中日兩國之永久和平，以建設東亞之新秩序，一為完成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之建設。中日兩國土壤相接，種族相同，文化相通，和平相安，有其自然與必要。吾等之所為致力和平者，蓋中日兩方，皆知中國之最後勝利不可期，而日本欲達其吞併目的亦不可得，戰則兩敗俱傷，和則共存共榮，兩方皆知之，且洞知之；故基於平等互惠互相尊重主權之原則，以謀和平之實現，實為勢所應然。至於三民主義之實行，則所以求民族之獨立，民權之發達，民主之改善，使國家權力依於民主之正軌，得以

確立，不復爲獨裁者利用之，以便其私圖，尤爲建國必經之途徑。

問 先生將以何種綱領實現此理想？

答 國民政府施政方針，俱見於本年三月所頒布之政綱，如尊重各友邦之正當權益，調整其關係，增進友誼，聯合各友邦以防制第三國際之擾亂陰謀，創立國防軍隊，打破獨裁制度，實施憲政，發達產業，安定金融，復興農村，及以和平反共建國爲教育方針，提高科學教育，掃除過去浮囂空泛之學風，皆其鞏鞏大者。

問 爲實施兩種綱領，當務之急，果何在乎？

答 爲實現上述政綱，吾人首當基於平等互惠互相尊重之原則與日本調整邦交，尤願美國人士，對於吾人努力於太平洋和平之確立，爲之尊重而加以諒解。孫先生一生致力於中日友誼之增進，深冀由此進而求日美關係之改善，良以中日兩國友好關係，實爲中日美三國真正友誼之先決條件，中日之友好合作，一日未確立，則中美，日美之友誼，猶未能謂已具有鞏固而適當之基礎。

問 從民主思想之觀念以視美國人，吾人能否爲先生有所助力，對於具有同情且有識見之美國人士，先生有何言相告？

答 誠然，美國人民具有眞確民主理想，使能承認和平運動之原則，卽爲奠定東亞永久和平之原則，其所助於吾人以達到所抱之目的者，良非淺鮮，邇者美總統羅斯福之祕書會謂：『歐洲，美洲，亞洲三國家，應各自聯合處理其本洲之領土問題，』此言適與孫先生之大亞細亞洲主義相脗合。孫先生確信此實爲保障太平洋永久和平之惟一基礎，深望美國愛好和平諸人士，推己及人，美洲和平既繫於門羅主義，則東方之和平，亦繫於孫先生之大亞洲主義，事同一體，初無二致。今則孫先生之主張，亦爲日本有識之士所讚同，近衛聲明，其尤著者也。

(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 紀念孔子的意義

國民政府紀念先師孔子誕辰，所采儀節，具有折衷至當的意義，自前清末造及民國以來，國人對於先師孔子的觀念，具有兩種的意義：其一，看見西方有耶教，尊崇教主，便想尊崇儒教，以孔子爲教主；殊不知宗教的特質，是於現實世界之外，尙有理想世界超於其上，如所謂天堂等等。儒教則不然，『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可見儒教所重端在現實世界，儒教雖有祭祀，但其意義爲報本，如所謂『雖蔬食菜羹必祭』，至今鄉下猶存此俗。儒教之所謂教，非宗教之教，乃教育之教，中國尊崇孔子爲先師，不尊崇孔子爲教主，尊崇其啓導中國民族之道德智慧，視爲萬世師表，不視爲上帝化身，這正是中國的光榮。其一，所謂世界主義國際主義，將東西洋文化比較結果，任意誣蔑儒教，詆毀先師，這種思想荒謬絕倫，世界上無論何種文化，皆是隨時代以進步的，不責後人不肖，却責先民沒有好好的留貽，真是荒謬絕倫。儒教說，『過則勿憚改』，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說『進德』，沒有一句

不責人自新，勉人進步。而他們却說什麼，『祖宗罪孽深重不自隕滅禍延子孫』，他們這種論調，自矜爲客觀，其實不過獻諛歐美，唾棄自己的國家民族。這種論調，猖獗起來，可以使一般青年習於忘恩負義，其結果斷送國家民族而不恤，眞可痛心。由前之說，不過模倣歐美，忘却本來；由後之說，則直淪中國民族於忘恩負義，禽獸不如。國民政府爲要矯正這種思想，所以頒布紀念先師孔子誕辰辦法，既不如耶教聖誕日之鋪張揚厲，而又切實從喚起中國民族的自覺着想，先師孔子教人以道德，其方法是日日新又日新的，其原理却是萬古不易。例如仁字，是人生最高尚最廣大的道德，實行起來，積極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消極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豈不是萬古不易的原理。至於導人以智慧，我們知道中國一切的典章文物，無不源於先師孔子，無先師孔子，便無所謂中國文化，我們於先師孔子誕辰舉行紀念，一方面在道德上發生猛省，一方面在智慧上發生勇猛精進的決心。

說到時局，『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此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此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日從事和平運動者，切須牢記此言，我們從事和平

運動，係因爲和平可以救國，決非偷生苟活，反之；從事和平運動的人，都決心爲和平運動而犧牲，『孟子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如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則凡可以避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避患而有不爲也』。這種『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的精神，是儒教的真精神，有了這種精神，方纔談得上經濟，軍事，我們從事和平運動的人，於紀念先師孔子誕辰，更應該發生猛省，勇猛精進。

（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 憲政實施委員會成立大會致詞

實現和平，實施憲政，爲國民政府還都後之最大方針，亦即國民政府同人最大努力所在。憲政實施委員會之設立，係國民政府爲集思廣益起見，於政府負責人員之外，並延聘國內在野賢達之士，共襄大業。憲法草案二十五年五月五日已由國民政府宣布，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復加以修正，並定於同年十一月十二日提交國民大會。而國民大會組織法，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亦由國民政府修正公布，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則於二十五年五月十四日由國民政府公布，同年七月一日施行，同年七月四日，九月十七日，十二月二十三日及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復迭有修正。如無戰事發生，則三年以來，憲法久已公布，憲政久已施行。今者，以重加審議之權，付之憲政實施委員會，一方因爲虛心與誠意之表示，以徵集各方面之意見，期於折衷至當，一方亦甚願憲政之進行不因之而遲滯。至於國民大會未召集以前，是否應先行成立國民參政會，憲法未公布以前，各級地方民意機關，是否應先行成立？亦有待於憲政實施委員會之研究討論。由此以言，憲

政實施委員會所負之使命，至爲重大矣。抑有言者，最近世界潮流，對於政治機構及政治權能，其思想之變遷，爲有目所共覩。然無論如何，民爲邦本，此理萬世不易。必民力充實，國力始能擴充，必民生安定，民力始能充實，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之能生存獨立與否，視其人民心力物力之集合與運用如何以爲斷。中國今日戰後疲敝，而全面和平，猶未能實現，危急存亡，間不容髮，所望憲政實施委員會能針對時局，起死回生，務使民生得所保障，民力得以發展，國民政府同人暨全國民衆拭目俟之。

（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 調整中日國交會議閉幕後重要談話

中日雙方爲締結互尊獨立自由之條約，曾經兩月之交涉，始告成功，當此會議於八月卅一日圓滿結束時，汪主席特發表如下之談話：

此次中日締結條約，歷時兩月，前後正式會議十六次，非正式會談交換意見力求融洽，爲數尤多。雙方認定中日兩國，應掃除過去猜嫌，確立現在及將來之親善關係，政治上互奠獨立自由，經濟上以互惠爲基調，實行提攜，同心戮力，以建設東亞新秩序，一方面杜絕共產主義的新毒菌，一方面肅清百年來經濟帝國主義的舊污。雙方因爲有了這個最高的共同目的，所以交涉時候，都能誠心誠意，從遠大處着想，使這次條約，在中日的新關係上，奠定了基石。

這是基石，同時又可稱爲樣本，爲什麼呢？因爲這次中日締結條約，並非是已經全面停戰之後，纔來開始交涉的，是一方面仍有一部份人在主張抗戰到底，因之全國以內仍不免繼續戰爭的時候，便開始交涉的，這是此次中日交涉的一種特質。我們鑒於和平途徑已開，繼續抗戰應即停止，所以盡心盡力製成可爲和平

基石的條約，給一般懷疑和平的人以一個極明顯的證據，使之消釋疑慮，促成全面和平，故說又可稱爲樣本。

基石有了，樣本有了，我們從此應當一致努力，加倍努力。

(二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 和平運動殉難同志追悼大會獻辭

去年今日，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發表宣言，鄭重說明和平反共建國之重大意義，在宣言發表以前，已經有爲和平運動而犧牲的同志，在宣言發表以後，進行愈猛，犧牲的同志亦愈多，後死同志，特於今年今日開這一個追悼大會，兄弟謹將和平運動之意義，及這些同志爲和平運動而犧牲的原因，以及犧牲所得到的代價，概括報告。

中日不幸，出於一戰，陣亡的將士，殉難的人民，血繼續不斷的流著，及至和平有了希望了，第一要緊的是結束戰事，實現和平，把決開了的血口，堵塞住了。戰爭是破壞的，和平的責任，是在破壞之後，建設起來。這所謂建設，決不是恢復舊的，而是創造新的，將過去造成戰爭的原因連根拔起，把將來和平的基礎，重新奠定，必須如此，方纔能使已流出來的血不致白流，必須如此，方纔能把決開了的血口，永遠堵住。

主張抗戰的人，所謂『最後勝利』，連他自己也知道是扯謊的，只有所謂『

抗戰亦亡，不抗戰亦亡，與其不抗戰而亡，不如抗戰而亡，『這纔是一般從良心上主張抗戰的根本所在。日本是要滅亡中國嗎？日本只有滅亡中國的一條路嗎？日本的明治維新，從何而起的呢，是因爲看見歐美的帝國主義殺到來了，不能不急起自保，然而從世界大勢看來，單是保日本，是保不住的，要保日本，就得要保東亞，東亞第一個鄰邦大國是誰呢？是中國。有人以爲日本想與歐美各國瓜分中國，這是絕對不會的。因爲如果這樣，則瓜分中國之後，歐美各國的勢力，在東方與日本平均角逐，人種的偏見，是不能抹殺的，結果必至歐美各國的勢力，聯合起來，將日本毀滅然後已，所以有人以爲日本想與歐美各國瓜分中國，這是絕對不會的。日本只有兩條路，一條是以獨力滅亡中國，一條是與中國協力共保東亞。

日本到底要走那一條路呢？這不但要問問日本人，而中國人首先要問問自己，如果中國依然積弱不振，日本只有繼續不斷的將中國滅亡爲止，斷斷不能坐視中國滅亡於歐美各國，予歐美各國以憑藉，使日本跟着滅亡。即使中國想發奮自強了，然而發奮自強的方針，是與日本爲敵的，甚至要借歐美各國的勢力，以與日本爲敵的，那麼，日本也只有更加繼續不斷，趕快將中國滅亡爲止。日本滅亡

中國可能的嗎？但是日本迫於必要，即使冒著極大的危險，也非進行滅亡中國不可。

以往的事實，日本說，中國妄想以夷制夷，依存歐美，抵制日本，這是日本所萬不能容忍的。中國說，日本要滅亡中國，所以中國只有尋求與國，希冀得到國際的援助。這些互相責難的話，在知識上，是忘卻了互為因果的定律，在道德上，是違犯了責己厚責人薄的教條，中日兩國，就這樣的戰爭起來了。

自從中日戰爭起來之後，中國創鉅痛深，越發以為日本是非滅亡中國不可的了，以弱敵強，中國知道沒有僥倖的，只有把定了『抗戰亦亡，不抗戰亦亡，與其不抗戰而亡，不如抗戰而亡，』的念頭，咬緊牙齒，抗戰下去，

中國的決心，日本曉得了，二十七年十一月三日的近衛廣播，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近衛聲明，其實質是什麼？是日本大聲疾呼的向中國說，日本並不是要走滅亡中國的那一條路，而是要走與中國協力共保東亞的這一條路。

中國的和平運動，就是這樣起來的，每一個和平運動的同志，平日服膺總理遺教，明瞭民族主義與大亞洲主義的關係，明瞭中國的生存獨立與東亞的和平秩序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在這次中日戰事未起以前，時時刻刻的，想消弭戰事的

發生，在戰事已起之後，時時刻刻的，想挽回戰事，使之中止，一旦得到日本這種表示，知道和平的曙光，已經現出來了，所以一致起來，發起和平運動。

和平運動的最大意義，是中日協力，共保東亞，所謂善鄰友好成立一個共保東亞的軸心，所謂共同防共，是防止共產主義之荼毒東亞，所謂經濟提攜，是防止經濟帝國主義之侵蝕東亞，有人以為這只是日本侵略中國的門面語，其實如果了解日本維新以來的國策與輿論，便知道這不是門面語，有人以為日本正在要滅亡中國，豈肯如此便休，其實日本若走滅亡中國的那一條路，在中國固然遭殃，在日本亦是冒險，其結果與瓜分中國的危險，會差不多，所以如果有中日協力共保東亞這一條路可走，日本決不會走向滅亡中國那一條路。

日本既然沒有滅亡中國的心事，那麼，『抗戰亦亡，不抗戰亦亡』的論點，失其存在了，『與其不抗戰而亡，不如抗戰而亡』的判斷，也就失其存在了，中國現在所要努力的，是如何與日本協力，如何把中日之間過去糾紛的原因，連根拔起，如何把將來正當的關係，重新釐定，如何使中國之生存獨立，與東亞之永久和平，得到保障。我們從前說過，『戰難，和亦不易，』如今更應該說，『為敵難，為友亦不易，』我們應該將全國的心力物力，動員起來，聚集於和平反共

建國這一重點之上。

和平運動的最大意義，是如此的，全中國的人，應該沒一個不贊成，沒一個不贊力的，爲什麼直到今日全面和平還沒有實現呢？

我們很沉痛的說，中國的抗戰思想，早就變了質了，如果抗戰思想純粹是爲中國的，那麼，不得不戰則戰，可以和則和，是一種極自然的事。爲什麼中國以內，會有人聽見和平，就立刻叫罵起來呢？因爲抗戰思想，含有非中國的質素在裏頭。共匪向來提倡工人無祖國的，向來提倡階級觀念超於國家觀念的，但是自從受第三國際的訓令，要他們改變口號，將無產階級革命戰爭改變爲民族統一戰綫，以促成中日戰事，一方面使日本疲敝，一方面使中國崩潰，以便共匪得乘間發展其勢力，以便第三國際得把中華民國改爲中華蘇維埃。共匪接受了這訓令，立刻改變面目，更從西安事變中，抓住了不少的工具，盡情運用，中日戰事，遂一發而不可收拾。共匪之抗戰目的，與中國人之抗戰目的，完全是兩樣的。中國人之抗戰，爲本國而戰。所以其結論自然是不得不戰則戰，可以和則和，共匪之抗戰，爲第三國際而戰，其目的在使日本疲敝，使中國崩潰，所以其結論自然是抗戰到底，和平兩字，休要提起。共匪是另外一副心肝的，不足爲怪，所可怪的。

，是那些做共匪工具的，到底是全無心肝呢？還是已與共匪同樣的另外有一副心肝呢？

抗戰思想，既然變了質了，對於和平運動，自然格格不入，可是和平運動是很容易就普及於一般中國人的心中的，共匪及其工具，不得不發急起來，就不得不把最卑劣最陰險的手段使出來，這就是暗殺，所有爲和平運動而犧牲的同志，都是死於這種暗殺的，這種暗殺，其目的在戕害和平運動最有力的同志，在摧折和平運動，在使中日兩國無止無休的打下去，替第三國際做機會，在使中國因游擊戰焦土戰更成赤貧，以便共匪得所憑藉，製造無產革命，在使中國的人力物力消耗盡了，以便共匪不費吹灰之力，便把整個中國捏在手中，送與第三國際。總而言之，這種暗殺，是共匪及其工具整個的亡國滅種大陰謀。

我們今天在追悼大會，想起爲和平運動而犧牲的同志，想起從前在一處工作，而今一死一生，永遠不能再相見，我們禁不住湧起無限的悲哀，然而這不是悲哀的時候，這些同志的血，是爲和平運動而流的，我們要使這些同志的血，一點一滴，都滲入和平反共建國的進程上，成爲堅固的基石，成爲平坦的大路，我們要把悲哀的心情，變爲勇壯，我們高呼以下的口號：

爲和平反共建國而犧牲的同志精神不死！

我們要繼續努力完成和平反共建國的使命！

我們要實行 總理的大亞洲主義以謀中日永久的和平！

我們要掃滅和平建國的最大障礙物共匪及其工具！

我們要完成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之建設！

（二十九年九月二日）



## 對中央黨務訓練團訓詞

中央黨務訓練團各位同志：總理領導我們努力國民革命，目的是一貫的，然而時代却是不斷變化的。我們要認清楚時代的要求，領導民衆向着我們最後的目的不斷的進步，這樣才能使國民革命臻於成功。如此說來，我們同志第一，要認清楚時代的要求，第二，要能擔負時代的使命，第三，要有一致的言論，一致的行動，才能擔負起這時代使命。這一致的言論，一致的行動，從何得來呢？從訓練得來。這就是中央黨務訓練團所以設立的原因。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總理是自己在指導我們，訓練我們的，總理逝世之後，時代還是不斷的變化，我們同志，還是想使這時代在不斷變化之中，能夠不斷進步，達到國民革命的本來目的。這一次時代的使命是什麼？國府還都以後，已經說明白了。實現和平，實施憲政，就是時代的要求，也是我們同志對於這個時代所應該擔負的使命。我們先講實現和平，中日兩個國家，如果不會合作，和平不會實現的。中日兩個國家，如果沒有合作的可能，弄到非兩敗俱傷不可，那就不用說了。如果想到一個

方法，使中日能够合作，這個是中國所必要，也是日本所必要的。我們現在已經找到中日可以合作的一條路。這條路，就是實現和平的一個根本的原因。如果中日不合作，實現和平這四個字是做不到的。各位同志如果把總理遺教從頭到尾看一遍，就知道總理對於中日合作很決定的。總理遺教裏頭也有批評日本在某階段的政策的不妥當，例如在實業計劃裏，就有這些批評。然而根本思想仍然是要中日合作。這種根本思想，在總理遺教中，沒有一點搖動過的。不只是總理逝世前年在神戶所講演的大亞洲主義爲然，我們試看看民國六年總理所著的中國存亡問題，我們現在看起來，更覺得驚心動魄。

各位同志：把總理遺教細心看看！從頭到尾有過一句根本反對中日合作的沒有？可以斷定是沒有的。所以我們現在主張實現和平，是總理遺教中的一個重要部份。所謂實現和平，就是中日合作，這是總理遺教中的一個重要部份，請各位注意！這個是信念，現實的方法怎樣呢？如今中日交涉條約已經做好了，可以說中日合作的共同基礎是有了，但是這裏頭有一個頂困難的問題，就是全面和平還沒有做到；中日合作共同的基礎固然是已經有了，但是中國還沒有做到全面和平。我們沒有方法使重慶放棄抗戰，也就沒有方法使日本停止戰爭。在這個時間之

中，我們是很苦痛的，我們的工作是很困難的。各位同志：你們已經遭受了困難，我可以決定將來也遭受困難，總而言之：在全面和平沒有實現之前，我們不能夠有完全自由。我們要協力，非協力不能夠實現全面和平，非協力不能夠實現中日合作，既然目的這樣遠大，環境又這樣困難，如果我們同志行動不一致，言論不一致，拿什麼方法去擔負這個使命呢？要求我們同志有一定的方針，有一定的步驟，大家一致去做，就得要受訓練，這是關於實現和平。至於實施憲政呢？有人以為現在在中國還不必講實施憲政的，這句說話是過去的了。因為五全大會宣言，已經明定了實施憲政，六全大會的宣言，又是明定了要實施憲政，這不可以失信的，所以說現在不是實施憲政的時候，這句的話，是已經過去了的。現在所需要的是如何實施憲政，詳細一點說，我們同志在實施憲政的時候，怎樣能夠使中國國民黨成爲中國的一個中心勢力，來實行三民主義，及總理一切的政策？如果我們大家同志能夠努力做成中心勢力，憲政實施之後，還是能夠實行主義，實行政策的。反而言之，我們同志不努力，不能夠做成一個中心勢力，就算是一黨專政，還是空的，所以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同志如何實施憲政的問題，我們同志如何在實施憲政的時候，使中國國民黨的主義政策能夠成爲全國的中心勢力的問題

。這個問題的複雜困難，同實現和平也差不多的，也要有一定的方針，一定的步驟。這種一定的方針，一定的步驟，從那裏得來呢？也是要訓練才能够得來的。

總而言之：訓練才能够擔負時代的使命，訓練才能够適應時代的要求，訓練的重大意義在這裏。至於實現和平，實施憲政種種的道理，種種的內容，我們很有時間大家來討論。今天兄弟還有一句說話：就是總理『知難行易』四個字。譬如實現和平，實施憲政，應該怎樣呢？我們有小組討論會來討論，我們有座談會來交換意見，所有小組討論會，座談會，都是求知。知是很難的，所以我們要努力去求它。同時我們的行動能否紀律化，我們行動能否組織化，就是行。行是比較容易的，我們不用去求，可以立刻做到，如果我們以爲有了小組討論會，座談會，大家研究就夠了，而對於自己的行動不能夠遵守紀律，不能夠遵守組織所規定，那麼我們根本不是知難行易的信徒。我們如果以爲這一回的訓練，光是求知的，那就錯了！我們這一回的訓練上，不只要滿足大家求知之欲望，尤其要使大家對於實行上能够一致。換一句話來說，不只在我們思想上要訓練，我們行動上也要訓練。所以各位同志，如果要求知，就要在平常一切行動上紀律化組織化，否則知還沒有求到，行已是完全散漫了。我們訓練團，不只注重知識，尤其注重

行動，不只注重訓練思想，尤其注重訓練行動，這是知難行易的信徒應該遵守的。今天很簡單的對各位同志說幾句話，因為將來我們大家討論研究的時候還有很多，我們認定了時代的要求，認定了我們要擔負的時代的使命，因此我們在這個時候來做言論上行動上的訓練，要來達到我們擔負時代的使命，適應時代的要求，這個重大的目的，今天各位同志對兄弟致深厚的祝辭，兄弟非常的感激！謹以誠意，說這幾句簡單的話，末了，祝我們各位同志，對於國民革命的成功！祝我們各位同志的健康！

（二十九年九月十五日）



## 關於團訓『誠明廉毅』的解釋

——九月二十一日對中央黨務訓練團訓話——

各位同志今天所講的是關於團訓的解釋，在前幾天，我們同志，要兄弟定四個字的團訓，當時兄弟很踟躕，因為四個字很不容易概括，尤其是團訓，用四個字，就想把各種要點概括下去，是更不容易的。後來想想，用四個字，固然不能把所有要點都概括了去，却是最少也可以舉出幾個最重要點，使我們同志一看見就想起，因此兄弟後來還是寫出這四個字的團訓來。現在要把這四個字的內容舉出來，使各位同志明白這裏頭有重要的意義，『誠明廉毅』這四個字，固然不能說概括一切的要點，却是總可以說把最重要點舉出來了。

先講『誠』字，世間的現狀，有善有惡，我們所做的事，所說的話，有是有非，我們心裏知道是就做，知道非就改，然而有一個先決問題，就是老實不老實。這個『誠』字解作『老實』兩個字還不夠的，然而我們說慣了，就用『老實』兩個字罷，如果老實，才有是非可言，不老實就根本不必講是非了。因為如果不

『老實』，他所說是的，他自己根本就不會以為是，他所說非的，他自己根本就不會以為非，那還有什麼是非可說，更提不到遷善改過的話了。所以一切的道德如果不從『誠』字着手，是不行的，有了誠，纔有所謂是非，有了是非，纔有所謂遷善改過。我們要做一個人，就要從『誠』字做起。我們要做現在中國的一個人，現在存亡危急中的中國的一個人，更要從誠字做起。說到這裏，兄弟想介紹歐美人同日本人批評中國人的壞話，固然也有批評中國人的好話，我們今天不必說了。我們單把歐美人同日本人批評中國人的壞話，介紹一些。歐美人批評中國人怎樣呢？說中國人說話含糊，不明確，每一個中國人，你問他一件事情，他總是含糊糊糊答你，不肯實實在在說的，這是歐美人批評中國人的話。這個批評，似乎很輕，實在却是很重，爲什麼呢？因爲歐美人從古就有一種道德是『老實』，心裏恨你，口裏也恨你，如果心裏恨你，口裏不恨你，這就叫做卑怯；卑怯是人家最看不起。中國人說話爲什麼要含糊不明白說呢？就是恐怕說出來要得罪人，換一句話就是恐怕說出來要負責任；因爲不敢負責任，所以含糊糊糊，使得你這樣解法也可以，那樣解法也可以。一個人弄到不敢負責任，那也無所謂是非善惡了，根本對於是不敢負責任，對於非也不敢負責任，對於善不敢負責

任，對於惡也不敢負責任，這還成一個什麼人呢？歐美人批評中國人，說中國人說話含糊，不明確，我們認爲他批評得很輕，殊不知這就是說中國人不敢負責任，所以故意說含糊的話來不負責任。日本人批評中國人怎樣呢？兄弟可以告訴各位，隨便拿一本日本人批評中國人的書來看，總有一句話是中國人只曉得愛面子；兄弟可以告訴各位，如果將日本人批評中國人的書都拿來看，決沒有一本不說中國人愛面子的。這愛面子，似乎也是很平常的事，殊不知只曉得愛面子，而把一切實際的利害看得比面子還輕，那麼，便不惜將他拿做面子的犧牲品，於是乎國家興亡，民族存亡，都是等閒的，只要面子不傷就可以過得去了。這個是要亡國的，要滅種的。中國人爲什麼只曉得愛面子呢？因爲沒有想到『誠』字，明明白白是如此，故意說不是，因爲面子的緣故；明明白白不是如此，故意說是，因爲面子的緣故，『誠』字便沒有了。現在日本人簡直把『面子』兩個字，來做『音讀』認爲這便是中國人第一樁要緊的事。歐美人批評我們，說我們說話含糊，這話怎麼講呢？就是不負責任的意思。日本人批評中國人愛面子，這句話怎麼講呢？就是不講實在的意思。這兩樣都是『誠』字的反對，這兩樣都可以亡國，可以滅種。就時局來說，總理民族主義裏，會說某某幾個國家在幾天以內，就可以

亡中國，這句話，在『九一八』以後，蔣介石辭國民政府主席職的時候，還引用過，到五全大會的時候，還引用過；當時已經有許多人說，這話說出來，很難過，所謂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其實這句話是頂老實的話。我們只要把民族主義看看，總理把國家的危急，民族的危急，沉痛的說出來，人家說中國是半殖民地，總理說不夠，是次殖民地，這樣說法難道不怕給人家翻成英文法文給歐洲人笑嗎？不管，因為『老實』。民國二十三年，日本有一本海軍雜誌，裏面有一篇文章，說到如果英美兩國的海軍聯合起來，以數學來計算，十七分鐘之內，日本艦隊完了，這句話也是老實話，他是以數學來計算的；如果英美海軍聯合一起，十七分鐘日本的海軍完了，爲什麼日本不禁止他說這句話呢？以『老實』話告訴國民，這樣，他的海軍永遠不會讓英美的海軍能夠聯合，永遠不會讓英美的海軍能夠集中；英美海軍沒有集中以前，他就會想方法把他們各個擊破了。這種方法，由於說『老實』話，所以能一息不懈的想出來，不然，就會糊塗的拉倒了，而事情便終於出來了。我們開仗以來有說過一句『老實』話沒有呢？我們如果將要丟一塊地方一定說：『轉移陣地』，已經丟了這一塊地方之後，一定說：『已經取得相當代價了』，臨丟的時候，一定說：『巷戰』，已經丟了，並且走得遠遠

了，一定說：『取遠勢包圍』。從前兄弟在武漢在重慶的時候，不曉得同多少宣傳的人嘔了多少氣，因為這樣是不得了的，大家連實際的情形都不知道，如何能想出適應這情形的方法來呢？然而他們說要安軍心，不得不如此。怎樣安軍心呢？這種安軍心有用沒有呢？在徐州打仗的時候有這樣一段事：日本的飛機來了，那個領隊的人就告訴他的士兵說：『這些是我們的飛機，趕快迎前去』，這是什麼意思呢？是要安軍心。但是飛機來還是來，炸還是炸，這樣安軍心有什麼用處？當時大家以爲凡是戰爭的時候，都不免要如此宣傳的。自從歐戰以來，我們看看歐戰的各當局，這樣的宣傳有沒有呢？對於應該祕密的事情，最多不說，沒有歪曲來說的，我們看看歐洲的戰報，當然各方都有祕密，然而祕密和『老實』不會矛盾的，祕密是不說而已，不是胡說。有些時候對於敵人還可以用『兵不厭詐』，但是對於自己國民却不能詐，因爲詐的結果，會使自己國民受騙，一個政府，使自己國民受騙，這是何等危險的事情！我們試將歐戰的各當局來比較一下，法國人說『老實』話，英國人也說老實話，法國人怎樣說『老實』話呢？他看見德國的軍隊衝破『馬其諾』防線知道自己兵力不行了，『老實』就告訴國民兵力不行，立刻就去講和，什麼停戰條件他都受，爲什麼呢？他不是發狂，他是比較

過的兵力已經破了。現在最要保存的是什麼呢？就是財力了。一個國家要有兵，要有財，兵力已經破了，不能支持了，趕快講和，使財力保得住，法國是一個農業國家，『馬其諾』防線打破以後，北方的工業的地方也打破了很多，而南方農業的地方還沒有打破，立刻講和可以保存自己的農業，這樣他還有一點立國的基礎。有人說，這是沒有用的，將來德國還是要吃你的啊！保持就有用嗎？將來是將來的事，將來有將來的應付方法，也許將來德國真是把法國食光，但是將來是將來的事，一步一步有應付，在這一階段之內，兵力保持不住，立刻保持財力，這是一個爲國家民族求生存的方法。但是他爲什麼能够轉得這樣快呢？是講『老實』話。他並沒有騙老百姓，自從甘茂林他們從前線打敗了之後，我們看一看萊諾，各人所說的話，有瞞住老百姓，說沒有打敗仗沒有？他們不瞞的，他們沒有說『愈戰愈強』，他們不說這些話的，因爲他們『老實』。須知道國家民族到危急的時候，對敵人可以僞裝，對國民不能僞裝的，這兩句說話我盼望各位同志注意一點。自從蘆溝橋事變以來，軍事當局一直的對國民僞裝，半句『老實』話不說，這樣，爲什麼不弄到國民這樣糊裏糊塗呢？因此遠離祖國的華僑，唱高調唱到不得了，唱到連甲午年的思想都有，這是那個的罪惡呢？是軍事當局僞裝的罪

惡。政府對國民偽裝，使國民不明白真相，所以把中國弄到今天，法國一收就收得轉，我們弄了兩年多，沒有方法收得轉，就是這個緣故。有人說，你不要單把這樣講和的來講，你要講誰繼續抗戰的。英國不是繼續抗戰嗎？然而英國也是很老實，因為一直到現在德國的軍隊，還沒有打到他的地方。法國是長驅直入連心臟都已經給人拿了，所以他看見兵力不行，趕快保持財力；英國呢，現在還有兵力，他還有海軍，他還有空軍，德國的軍隊不過佔領到他沿海的幾個小島，還沒有佔領到英倫的本土，爲什麼他不強硬呢？法國講和是『老實』，英國繼續抗戰也是『老實』，絕不是中國這樣，中國爲什麼會弄到這樣，誠然是國民已經有一點不好的性格，的確只曉得愛面子，的確說話含糊。可恨的是軍事當局，不去矯正國民的弱點，反去利用國民的弱點。中國國民黨是一個革命黨，應該領導着人民向前走，不應該跟着人民尾巴走的，應該做人民的一個忠實的朋友，時時刻刻矯正人民的弱點的，不應該利用人民的弱點。既然知道我們的國民有不誠有只曉得講面子有說話含糊的毛病，這種毛病會弄到不負責任，會弄到亡國滅種，我們如何不想法子去矯正他，免致他一直沉淪下去。所以這個『誠』字，兄弟今天不是來同各位像道學先生似的講什麼理性的話，是現在存亡危急關頭，所以不能不

要說的話，我們大家非有一個『誠』字不可，無『誠』字，非但不能認識清楚現狀，即使認識清楚之後，亦不敢說出來，這樣必至大家糊裏糊塗，國亡種滅，還不曉得。宋朝明朝都是這樣斷送了去的，現在我們提出這個『誠』字，不只是爲個人修身之用，我們若要對於整個國家整個民族負起責任，我們不可不從『誠』字做起，所以團訓第一個字就是『誠』。

第二講到『明』，中國古代說『誠則明矣』，這話是不錯的，就是剛才所說，現狀有善有惡，我們做事有是有非，如果不『誠』，就無善惡是非之可言。所以『誠』字有了，纔能講到『明』字，明字是用以辨別是非善惡的，須知道現狀之善惡，事情之是非，不是容易曉得的，從古到今，莫不皆然。哥柏尼發明地動，而大家把他拿去燒了，達爾文發明物種由來，而大家迫到他連倫敦都住不得，要跑到鄉下去，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向來這些最先知先覺的人，總是給那班半知半覺，不知不覺的人糟蹋到死；死了之後，多者一千幾百年，少亦一百幾十年，大家方想起他的話來，所以知是不容易的。總理的『知難行易』的學說，正是有見於此，兄弟跟隨總理久了，曉得總理內心的經過，他的內心，痛苦到極點了，一般人以不知爲知，以一知半解爲全知全解，把中國弄到這個樣子；所以總

理很痛苦的說：『知難』，他這個要大家知道知是難的，必須用全副精神去求知才行。並不是叫大家不必去求知，廣東有一句話叫做『半桶水』，用來形容一知半解的人，總理常常引用這句話，這與江南江北的所謂『半瓶醋』，差不多。舉個例來說，有些人以為三民主義要加一個哲學基礎，這句話從那時候起的呢？我記得從民國十五年共產黨喊出來的，是馬克斯主義有哲學基礎，孫先生的三民主義沒有哲學基礎。哲學基礎有沒有呢？當然是有，但是現在是不是我們講哲學基礎的時候呢？據兄弟想，如果講起來也可以，不過一定引起黨裏頭許多辯論，許多紛擾，你一個哲學基礎，我一個哲學基礎，幾時纔能得到結論呢？我們在這時候，與其討論哲學基礎，不如將水深火熱中的老百姓救出來，要緊得多，可憐我們的老百姓，聽見我們的宣傳，已經十多年了，却沒有看見我們做成一件事實，所以現在還是趕快做一點事情要緊，如果把這個放下却去討論哲學基礎，這太把『知難』看做知易了，我們還是從『行易』著想，趕快把建國大綱，實業計劃，實現出來，救救老百姓要緊，再舉個例來說，上一個例，是就總理遺教說，這一個例，是就時局說，有許多人，對於和平運動，以為和平那個不想，所難得的，是合理的和平，即如經濟提攜，說來好聽，其實比賠款還要利害，所謂經濟提攜

，名爲什麼都不要，其實什麼都要，我們寧可賠款，你要我多少，我賠了去，賠剩了的，還是中國的，不致於名爲什麼都不要，其實什麼都要，這句話似乎很有道理，各位同志大概都聽見過，有人這樣說法。各位同志，這是「明」字的關係了，照現在軍費的情形，即使打了勝仗，也不能向戰敗國要賠款的，不是不想要，因爲要不到，各位同志只要看看民國八年巴黎和會的經過，就可以知道，當時法國傾了全力，纔得勝仗，不說別的，北方二十多省殘破之後，就難以恢復，他滿心想向德國要到賠款復興法國，後來經一班專門財政家經濟家計算調查，纔知道德國是賠不起的，沒有方法賠的。這個消息一來，法國那種痛苦，像再打一個敗仗一樣，後來雖然硬把賠款數目定了，然而弄到德國一個郵票要幾萬馬克，一件衣裳要幾十萬馬克，終於沒有方法賠，這是一件人所共知的事實。何況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不是一個工業商業發達的國家，更從何處有這樣的款來賠呢？庚子那年賠款四萬萬，到現在四十年了，還沒有賠完，現在日本的軍費，照日本說，用了一百多萬萬到二百萬萬，我們算算，四萬萬要賠四十年，四十萬萬就要賠四百年，何況二百萬萬，那不是要賠一二千年嗎？賠的人固然賠不起，要賠的人也等不得罷！還有一層，賠款是要有抵押的，庚子年的四萬萬，拿關稅鹽稅來做

抵押，關稅鹽稅是中國收入最大部分，如果我們說寧可賠款，不要經濟提攜，那麼試問這些賠款拿什麼做抵押？恐怕我們連一絲一粟都要拿來做抵押品。如果說經濟提攜沒有了自由，難道這樣的連一絲一粟都做了抵押品，就有了自由嗎？那麼寧可賠款不要經濟提攜的說法，從那裏成立呢？然而這些說法，不是從平常人口中說出來，而是從財政家經濟家口中說出來，各位同志，知之難如此。所以我們不提「明」字則已，提到明字，最少要做到以下三樣工夫，第一自然是求知，惟其難也，所以要求，第二是力行，知是難的，只曉得求知必終於不知，有許多事是行然後知的，所以力行即是求知，第三，知與行之間要有一個連繫，這連繫是什麼，是起信，因為人無論怎樣沒有全知全能的，縱的方面，自己所知，不如人之所知之高且深，則要信，橫的方面，一人所知不如各人所知之多且廣，則也要信，單是知不夠的，必要信纔能對於萬事萬物各得安排，以上三樣工夫做到了，「明」字就有相當把握了。「誠」字是要有認識善惡是非的誠意，「明」字是要有分別是非善惡的知識，善的是的就做，惡的非的就不做，既能分別，又能擔負，則庶幾乎够得上做個人，够得上在這危急存亡的時局中做個人，所以團訓第二個字就是「明」。

第三講到『廉』，關於「廉」字，副團長陳公博先生已經發表過一篇文章，主張廉潔政治，各位同志大概已經看過。本來對一個做官的人說『你要廉潔』多近於侮辱，譬如對新婚夫婦說：你要貞潔，這不是過於唐突嗎？不是多少近於侮辱嗎？因為不貞潔連人都做不成了，不廉潔何嘗不是一樣。如今兄弟解釋這個「廉」字，不只要有廉潔的操守，同時要有廉潔的制度。所謂廉潔的制度是怎樣呢？兄弟舉一個先烈的例給各位聽，廖仲凱先生在民國元年時候做廣東財政廳長，那時候廣東庫裏頭是空空的，等到民國二年，只有一年，他臨交卸的時候，庫裏頭存得現銀有四百萬了。那時候正是討袁失敗，大家預備亡命預備再舉，覺得留這四百萬給龍濟光，是很可惜的，不如提出來為再舉之用，於是找到仲凱先生來說，請他想個方法把這四百萬即刻提出來。仲凱先生皺了眉頭，說我沒有方法的，我的命令發不出去，因為財政廳長沒有權力這樣隨隨便便的調動一筆錢，財政廳長沒有法律根據，是不能發命令的。大家問他何以如此。他說從支錢的人，到管錢的人，有許多級，不依着法律一級級的經過，就是財政廳長，也拿不到錢。各位同志，這是什麼？這就是廉潔制度。大家後來又問他，有其他通融方法沒有呢？他說只有打一個電報給總理，總理如果回一個電報要這筆錢，我就有法律

根據了。於是乎打電報給總理，不幸得很，總理已經被上海的租界當局，受了袁世凱的囑託，逼他離了上海，去大連了。於是一個錢沒有動，四百萬都被龍濟光拿了去，後來大家都笑仲凱先生說他是一個馱子。但是這個馱子是什麼？是廉潔制度的表現。單是有廉潔操守不中用的，要有廉潔的制度才行，各位同志將來都是回去管理黨部，或者管理其他行政機關，免不了經手各種財政的，各位同志要預備有廖仲凱先生的精神。不錯他不能拿這四百萬來做以後革命的用，他自己也很痛心，然而他另外有一個用處。這用處是什麼？是替中華民國留下一個廉潔制度，替中國國民黨留下一個廉潔精神，這個效果是很大的。然則當國家存亡危急的時候就只這樣的『板板六十四』一點應急的方法都沒有嗎？這却不然，應急的方法是應當有的，是應當特別以法律規定，許其有行動的自由，除此之外，就只有『板板六十四』，一點不能通融，一點不能含糊了。我們必須以這種精神樹立這種制度，我們才好講民主政治，不但要這樣我們才好建國，而且要這樣我們才好做人，要這樣我們才配是廉潔，廉潔不只是精神，廉潔不只是人，廉潔是制度，廉潔是使人人雖欲不廉潔而不能，那才是真廉潔，如果我要廉潔就廉潔，要不廉潔就不廉潔，那斷斷乎不是真廉潔。像從前中國所謂清官，實在不過是糊塗虫

，因為只知道自己做清官而不能樹立一種制度，使他的僚屬，他的同寅，雖欲不廉潔而不能。那麼他一個人做清官有什麼用處呢？還有一層，廉潔制度，存在於廉潔風氣之中，從來任事的人，不只要任勞尤其是要任怨，一個管財政的人，這樣的『板板六十四』是不會得人喜歡的，這在本人主觀上，固然要有任怨的精神，而在一般人，却要設身處地於這些『板板六十四』的人子以瞭解予以尊重，這樣才能做成廉潔的風氣。總而言之，廉潔要從操守上制度上同時着力，使得自己廉潔，人人一樣廉潔，這是政治道德的基本條件，所以團訓第三個字是『廉』。

第四講到『毅』字。毅字是怎樣呢？古人說，『無欲則剛』，能廉潔才能勇敢，所以『毅』字跟着『廉』字，『毅』就是勇敢，毅字包括得勇敢，勇敢二字却包括不得毅。因為毅是有恒的勇敢，這勇敢是一直的勇敢下去，不會間斷的，不會有始無終的，不會做一下子就沒有興趣的，這才叫做毅。無論什麼事沒有恒心是做不成的，尤其是現在和平反共建國的工作我們不曉得要多少時候，我們的困難不曉得有多少，我們碰到不如意的事情不曉得有多少，我們如果看見一些現狀不對，就灰心了，看見一件事情不順手，就灰心了，那就不行。自從和平運動開始以來，有些人中途離去的，我們不願意再提這些人的姓名，這些人可分兩

種，一種是看見現狀不對，立刻灰心，灰心之後，索性反動，這不用說他了。還有一種呢，看見現狀不對，立刻灰心，灰心之後，不肯反動，只知一味悲觀，一味消極，甚至以自殺了事。他的心事以爲當時覺得抗戰有望，所以主張抗戰，及至抗戰無望，以爲和平有望，所以主張和平，如今和平也無望了，反動麼，是不來的，除了消極有什麼法子呢？這一種人比起反動，自然好得多，但是國家民族到了如此緊要關頭，能以消極付之不聞不問嗎？即使一死，然一死就可塞責嗎？這樣弱志薄行也不行的，所以要有一個『毅』字？兄弟對於和平的觀念坦白對各位同志說，在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發表豔電的時候，原希望重慶採納的，希望快快採納的，有人以爲發表得早一點，但是不發表豈不等於以前在重慶說話一樣，一般同志一般人民永遠不會聽見的。及至二十八年一月一日，聽見重慶那種蠻橫決絕的態度知道採納沒有指望了，全面和平不知何時才得到來，却是我雖然知道困難正多我並沒有一點灰心，因爲我認定中日兩國，除非有一個亡了，要不然，只有我這條路，這條路是不錯，我便放心前進，即使豔電發表以後，我立刻死，也無妨的，一定繼續有人向這條路走，我自己不死自己做下去，自己死了，有別人做去。有困難沒有呢？有的。有危險沒有呢？有的。然而不相干，只要這

條路不錯，就算我們指示出中日兩國國民所要走的一條路，除非要亡，如果不要亡，就只好走這條路。我們一方面要感動中國人，一方面要感動日本人，起初很難的，後來漸漸容易些了，可以說希望有了，然而這個希望還是很微的，魔障重重荆棘重重，不如意的事情不曉得多少，如果爲這樣子搖動了自家的心，那就什麼都完了。『毅』就是什麼。是有恒，只要道理對了，就依着去做，做個不休，就是『毅』的作用。這作用是很大的，因爲做到一半就灰心下去，氣餒下去，那就等於不做，且比不做更糟。還有一層，我們對於這個『毅』字，不使之成爲一個人的『毅』，而成爲整個團體的『毅』，整個團體蒸蒸日上，使樂觀材料天天增加，悲觀材料天天減少，這是必要的，養成這個『毅』字，要有辦法的，不只要意志堅強而已，還要行動穩健，一個人要行動，意志才能堅強，纔能把悲觀材料減少，把樂觀材料增加。記得前幾天，有一個同志，到各處攷察回來了，兄弟問他，你對於和平前途悲觀還是樂觀呢？他說也悲觀也樂觀。旁邊有幾個同志笑起來說你這個豈有此理。他說不然，因爲我所看見的悲觀材料也有，樂觀材料也有。兄弟覺得他的話很對，我們只有努力使悲觀材料減少，樂觀材料增加就是了。大概一個革命黨人，有兩種養心的方法，第一，我們革命黨只要有一個信仰，

如果覺得我們的道理對，我們便什麼都不怕；第二，我們革命黨勇於實行，認定道理對了，便依著做，世界上只有做纔能得到樂觀的材料，古人所謂『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其源皆在於此。總而言之，所謂有恆不是勉強得來，而是越工作越增加興趣，從苦得甘，從危險得安慰，這是一切事業成功之母，所以團訓第四個字是『毅』。以上對於團訓誠明廉毅四字的解釋，雖不能說賅括一切要點，然而最要的幾點，已經指出，『誠』纔能有擔負是非善惡的責任的決心，明纔能分別是非善惡，『廉』纔能爲善去惡，爲是去非，『毅』纔能爲之不倦，各位同志，在這危急存亡的關頭，抱着和平反共建國的使命，願相與本此四字同甘共苦，同生共死，一直到成功爲止。

11111

## 國慶日感言

吾人每逢國慶日，追念總理孫先生締造之堅苦，諸先烈就義之勇烈，輒不禁生無限敬仰，而撫時感事，建國大業，未臻完成，國家民族，存亡危急，且不絕如縷，後死責任，至重且大，尤不得不深自儆惕。

現在全面和平尙未實現，國步艱難，民生憔悴，傷心蒿目，絕無慶賀可言。惟中日新關係已經調整，此新關係之建立，蓋中日兩大民族，於此次不幸戰爭中，同時反省，下最大之決心，爲最大之努力，根本掃除過去之糾紛，重新奠定現在及將來之親善關係。此兩大民族，自此以後，各本於自由獨立之立場，向於共存共榮之目的，并力前進，不惟中國之建國工作，將藉此以臻於完成，總理所懷抱之大亞洲主義，亦將由此以實現。吾人矚目於此光明之前途，於還都後之國慶日，實有無限慶賀之忱，願掬以相示者也。

日德義同盟成立，實爲東亞滌除帝國主義之餘毒，中國自拔於次殖民地之良機，吾人若深自策勵，早日團結，求得全面和平，以從事戰後之休養與建設，則

必能不使此良機逸去。惟吾人必宜猛省，非自助不能得人之助，吾人惟有盡其力之所能至，以蘄致於成功而已。

謹以此意，爲今年國慶日之祝辭，願吾同志，暨吾同胞，集中意力，向此光明之前途，勇往精進，建成莊嚴燦爛之中華民國。

（二十九年十月十日）

## 附錄——近衛聲明

日政府業於本年再度之聲明，宣布決以武力徹底消滅抗日國民政府，而與華方眼光遠大之人士攜手，努力建設東亞新秩序。現今中國各地更生氣象澎湃而起，建設之機運甚高，因此日政府特欲闡明調整日華關係之根本方針，使中外明瞭帝國之真意。

日滿華三國將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為共同目的而結合，以期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之實現。是則中國應首先祛除原有之偏見，拋棄抗日反滿之墨索。換言之，日本甚望中國能自動與滿洲國建立完全之國交也。

東亞之天地斷不容許共黨勢力之存在，故日本認為以日德義防共協定之精神而締結日華防共協定，實為調整日華國交上所最緊要者。且鑑於中國之現狀，為獲到此項防共目的之保障計，在該協定期間內，要求在特定地點，允許日軍駐紮防共，及指定內蒙為特殊防共地域。

關於日華經濟關係，日本固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佔，亦非欲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際之利益，而僅欲要求日華之提攜與合作，以期收獲實效。換言之，即按照日華平等之原則，要求中國承認帝國臣民在中國內地居住營業之自由，以促進日華兩國國民之經濟利益，且鑑於日華間之歷史，經濟關係，應予日本以便利，俾得在華北及內蒙地域開發利用資源。

上述大綱，即係日本之所求於中國者，苟能明瞭日本之所以調動大軍之真意，則知日本之所求於中國者，既非區區之領土，亦非軍事之賠償；日本實欲要求中國以建設新秩序之分担者之資格，而於實行其職務時所必須之最少限度之保證耳。日本非但尊重中國之主權，抑且不吝進而考慮交還租界，廢除中國完成其獨立所必需之治外法權。

(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 勘誤表 (一)

頁	行	錯	誤改	正
(目錄)三	九	志深勇沉	智深勇沉	正
二五	九	虛之矯足以誤事	虛矯之足以誤事	
四四	二	對於中國爲野心	對於中國的野心	
一一〇	二	列舉我來	列舉出來	
一二四	一	眞和誠意來和中日	眞是誠意來和中國	
二三五	(第五行起首應低二格)			
一三七	(十三行與十二行應連接不分段)			
一三七	一三	準備北伐。	準備北伐，	
一四一	四	一段	一段	
一四一	五	三段	三段	
一六七	一	階段	階段	
一六七	二	階段	階段	
一六八	一三	階段	階段	
頁	行	錯	誤改	正
一六八	一五	階段	階段	
一六九	一四	柱。	柱，	
一六九	(十四行與十三行應連接不分段)			
一六九	一四	內政統一	內求統一	
一七三	四	目的明	目的可明	
一七五	一	不但要拿	不但要拿	
一七七	一〇	就要有分担	就要有分担	
一七七	一三	力量與反共	力量與反共	
一七九	一	爲是	爲的是	
一八一	一三	今日民困窮，財困盡	今日民困窮，財困盡	
一九一	一	志深勇沉	智深勇沉	
二〇八	一三	重要	重要	
二二一	一	新階段	新階段	

# 勘誤表 (二)

頁	行	錯	誤	改	正
二三七	五	神精		神經	正
二三七	六	神精		神經	正
二三七	八	神精		神經	正
二三七	一一	神精		精神	正
二三八	四	信口胡柴說		信口胡說	正
二四一	一二	要		還要	正
二六一	六	一切議案由		一切議案，	正
二六二	一〇	要慢慢取得		要慢慢取得	正
二六七	五	的狀況		的狀況。	正
二六七	一〇	互換和約		互換大使	正
二七六	九	民國十年一月也，		民國十年一月也。	正
二七九	一三	民主之改善		民生之改善	正
二八〇	三	俱見		具見	正
二八〇	四	增進友誼		增進其友誼	正
二八〇	八	兩種綱領		此種綱領	正
二八一	三	亞洲三國家		亞洲之國家	正
二八七	一〇	一方因為		一方因為	正
二八九	六	互奠		互尊	正
二九九	(十一)	行末「我」字起應改為另行起			正
三〇〇	(八，九)	兩行應連接不分段			正
三〇一	六	就得要受		就得要受	正
三〇一	(六)	行自「至」字起應改為另行起			正
三〇五	三	各位同志		各位同志，	正
三一〇	一	過的兵力已經破了。		過的，兵力已經破了，	正
三二一	(五)	行第十字自「以」字起應改為另行起			正
三二五	一〇	第三國際之利益		第三國之利益	正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初版

汪主席和平建國言論集

實價每冊國幣肆角

編輯者 宣 傳 部

出版者 宣 傳 部

發行者 中央書報發行所

印刷者 新中印刷公司

3/11/38

